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新建設

第四卷 第二期

紀念五四特輯

「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 …… 陶孟和
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 葉蠖生
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 李何林
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 …… 孫伏園
關於「中國通史簡編」 …… 范文瀾
偉大歷史工程底偉大哲理 …… 何思敬
學習「實踐論」，克服經驗主義！ …… 王思華
大學課程「中國語文概論」的一個教學總結 …… 黎錦熙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定義 …… Д·И·威斯蕭科夫 沈志遠譯
「實踐論」與新法學（座談記錄） ……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
關於呂著「中國民族簡史」中的幾個問題（書評） …… 馬學良
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新書介紹） …… 梁純夫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許字二一九號
北京市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專著

紀念五四

「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陶孟和（一）
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的地位……葉蠖生（四）
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李何林（一一）
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孫伏園（一七）
關於「中國通史簡編」……范文瀾（二〇）

學習「實踐論」

偉大歷史工程底偉大哲理……何思敬（二五）
學習「實踐論」，克服經驗主義！……王思華（三一）
「實踐論」解說（三）……李　達（三三）
大學課程「中國語文概論」的一個教學總結……黎錦熙（三八）
國語語法綱要（中）……趙元任（四二）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中）……蘇・Н・Г・蘇達里可夫（四五）

學術討論

孔墨底唯心論？唯物論？……楊柳橋・馮友蘭（四九）
關於公共收入和租稅的發生……任林圃・周伯棣（五〇）
研究古代中朝關係的一個新證據……常元敬（五一）

譯文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定義……Д·И·成斯諾科夫 沈志遠 譯（五三）

新編哲學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 譯（五七）

座談記錄

「實踐論」與新法學……中國新法學研究會（六二）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六七）

學術問

「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有什麼不同？「治外法權」是不是包括「領事裁判權」？（陳體强答）……（七〇）

中國私有制起源於何時？當時的生產關係怎樣？（尙鉞答）……（七一）

生物爲什麼要有雌雄之別？（不要用染色體的差別來說明雌雄之別，請用進化觀點來處理這問題）（方宗熙答）……（七二）

書評

關於呂著「中國民族簡史」中的幾個問題……馬學良（七三）

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新書介紹）……梁純夫（七五）

學術文摘

中國人民大學的教研室工作……成仿吾（七八）

蘇聯科學如何與實際結合起來……蘇·托布契也夫（七九）

「實踐論」與文藝創作……何其芳（八〇）

學術簡訊

編後記……（八一）

專論

「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

陶孟和

在今天，三十二年以後，我們來看「五四」運動，來明確的認識它，來探討它的意義，來估計它的重要性，可以說是最合時的。三十二年的工夫已經提供了一個歷史的遠景，特別是五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偉大的解放運動和它的輝煌的勝利，這一事實更充分加強了我們對它的認識。

「五四」運動於一九一九年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在它以前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現在試舉出一九一九年以前歷史行程中的幾個重大事件。在國內，我們經歷了辛亥革命（一九一〇）、袁世凱的專政（一九一〇——一九一五）、日本帝國主義奪佔我山東半島及膠濟鐵路（一九一四）、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要求（一九一五）。在世界舞台上，則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和平宣言（一九一七）和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這些事件曾或多或少的也互爲影響。對於「五四」運動的迸發，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這些連同其它若干歷史事件所形成的那個時代，大體上決定了「五四」運動的出現。

「五四」運動的主要人物，大多屬於知識分子。因此，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中國知識分子——教員、作家、新聞記者，特別是青年學生——的覺醒。在「五四」以前，在短短的二十年間的知識界裡，曾前後相逐的展開了三次新的思想浪潮。用最富有代表性的刊物來說，先是梁啓超、蔣智由等所辦的新民叢報，介紹給國人愛國思想及歐美思潮。其次爲同盟會的孫中山、章太炎等所辦的民報，鼓吹了民族革命與民主政治。最後便是陳獨秀、李大釗等所辦的新青年，倡導了文學革命及個性的解放。這三大思潮雖然是帶有半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性的，然而它們對於以後「五四」運動的形成，却不能不說是起過一定作用的。反動的、反革命的思想，在今天當然不應該予以讚揚歌頌，然而它們在當時，在社會發展過程的一定階段上所起的作用，却不能完全加以抹殺的。在「五四」前夕的知識分子便是，依年齡的不同，分別在這三種相聯接的巨大的思想浪濤裡哺養長大的。

另外一個不應該忽略的重要因素，便是北京大學。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而領導這個運動的大部分的人士，則爲北大的教員學生。因此，北大便成爲「五四」運動的核心。北大的發展開始於一九一六年蔡元培長校。蔡元培自從到北大以來，便一改往日作風，添聘教員，擴充院系，提倡學術思想自由，將過去一向腐化的製造官僚的北京大學，變爲一個生氣蓬勃的文化思想中心。這在中國教育界思想界，還是一個空前的現象。

北大所提倡的新文化的思潮，影響了北方的學校，也影響了全國。蔡元培和他的同事在北大任職的三年裏，在不知不覺之中，給「五四」運動造出了一個強大充沛的動力，和一個廣大堅強的基礎。

還有一個具有絕大重要性的因素，大家到後來才認識到它，這便是工人階級的壯大。中國主要的勞動者本來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由於進行經濟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中國都市才漸漸出現了近代的產業工人。歐戰時期，因爲物資的缺乏，尤其因爲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壓迫的一時放鬆，中國的民族工業便得到了一個發展的機會。這個發展，雖然在歐戰結束後馬上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可是它所產生的一個比以前更爲廣大的工人階級，却做了「五四」運動和以後政治運動的中堅分子。

一九一〇年的革命（辛亥革命），絲毫也沒有滿足我們人民的需要與願望。它既沒有革除中國傳統的腐敗專制的統治，也沒有解除半世紀來帝國主義列強所加給我們的壓迫。相反的，新的統治者却集了過去統治階級暴行的大成，完全爲保持私人的權利地位，不惜屠殺人民，出賣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則乘着這樣統治者當權的時候，對我們人民，對我們的經濟利益進行有加無已的、日益深入的掠奪榨取。第一次大戰發生，歐洲列強開始忙着從事它們的生死存亡的鬥爭。日本以輔助協約國家參加歐洲戰爭爲藉口，先佔領了膠東和膠濟鐵路，這個行動顯然是協約國家所支持的。它又乘歐洲列強自顧不暇而袁世凱進行稱帝的時候，向他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協約國家則要求我們派遣工人補

充它們戰時所迫切需要的勞動力，它們又用種種的威脅利誘，要求我們向德奧聯盟國家宣戰。始終依附帝國主義以圖自存的中國統治者對於列強的這些侵略與要求，只有俯首答應。可是，中國人民，特別是那些有血氣的、有民族意識的、思想覺醒的人們，對這些是絕對也不能容忍的。

在歐洲大戰期間，有些人還懷着一種幻想，以爲協約國家如它們所宣傳的，是爲正義而戰的，協約國家的勝利將開闢一個新的和平的世界，它會保證中國至少在國際上可以得到更公平的待遇，可以收回已經喪失的主權。他們不知道這種戰爭乃是帝國主義間利益衝突的必然産物。美國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宣言，更加深了這些人的幻想，他們把誘勸德國投降的宣傳文字，認爲實際執行的政策，他們更把帝國主義所慣於行使的欺騙，認爲可靠的諾言。關於威爾遜的十四點，曾經廣大的有力的傳播到世界上的每個角落，也確乎在世界的廣大人口中發生了相當巨大的影響，當虔誠信從這帝國主義者的謊語的人們覺悟到他們自己受騙的時候，他們的失望、沮喪、憤慨是可想而知的。在過去，對於帝國主義宣傳的欺騙信仰越深的，等到事實促使他們覺醒以後，失望與憤慨的情緒，當然就越大了。

偉大的十月革命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出現，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無可置疑地是有莫大的意義的。蘇聯對當時的中國人民，至少提供了兩條富有極大意義的啓示：第一，它退出帝國主義强權的戰爭，它既不參加它以前所屬的協約國家集團，它也不加入聯盟國家的集團。它脫離國際鬥爭的漩渦，去建造自己的幸福的庭園。第二，它不單推翻了一個世上有數的獨裁專横的帝制，並且勇敢而富有自信心的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去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意味着進入人類歷史發展上的一個新的階段。這兩大啓示，——脫離帝國主義集團，自己放棄了資本主義——就深深的印入了中國人民的腦筋。可是，當時蘇聯在革命之後，還正在全力忙於鎮壓國內反革命的活動與抵抗帝國主義列强的圍攻。它還正在爲自己的新國家進行英勇的鬥爭，還沒有能够正式開始它的新的經濟文化的建設。因此中國人民當時還只能以嚮望的心情，注視着蘇聯的進展。無論如何，一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對於蘇聯的出現和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寄予殷切的期望，乃是必然的，而此後蘇聯偉大的經濟建設給中國人民以莫大的鼓舞與啓發，也是必然的。

這就是「五四」運動爆發前的基本情況。因此，當覺悟了的中國人民大衆知道了巴黎和會祇是帝國主義者的分贓會議，並且知道了爭取中國領土完整的希望已經完全變成幻影的時候，這空前偉大的「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便轟轟烈烈的爆發起來了。

關於「五四」運動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特點，我們也應在這裡予以指出：第一，它是徒手羣衆對於統治者所進行的一種公開的革命性的反抗行動。徒手羣衆公開反抗地方統治當局（例如罷市的事件）在中國雖然素見不鮮，可是在首都對中央政府公然予以抗拒，却不是一件平常的事。然而，這次羣衆的革命行動居然勝利了，並且成功了。由於這次的實際行動，由於它的成功，羣衆開始認識了自己的力量，開始對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它做了以後多少年來在中國政治上担任重要任務的學生運動、羣衆運動的先鋒，它給予了它們至可寶貴的啓示與鼓舞。

第二，在「五四」運動以前，知識份子的思想情況不一，前進的程度各異。他們對於本國統治階級的賣國與無能和帝國主義的壓迫雖然同樣的憤恨，然而他們政治的分野却還沒有發展成爲清楚的、確定的形式。可是兩年之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訂出了正確的革命綱領，這才有了鮮明的政治號召和行動，它是與「五四」運動直接有關的。在「五四」時代參加運動的人們，大體上仍可歸屬爲三大類別。毛主席論「五四」運動時說：「在共開始是共産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當時各政治集團的大概情況，而它們的聯合與統一，也可以說是開以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先河。

第三、「五四」運動的開始，是由知識份子發動領導的，並且最初僅限於北京、天津等處。然而，「五四」運動力量的眞正偉大，眞正强壯，對於民族前途眞正發生重大的影響，則在於：（一）它很快的展開爲全國的運動；（二）它引起了廣大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及其它的羣衆運動，乃至發展成爲有相當規模的中國廣大人民運動。「五四」運動隨着時間的進行，在質量兩方面都有進展。中國知識分子與工農大衆相結合的運動，意味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覺醒與奮起。

第四、「五四」運動在一方面看來，本來是一個政治性的運動。可是它的出現，却由於思想學術的革新。「五四」運動不能說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性的東西，因爲它與新文化、新思想的發達是分不開的。「五四」運動不單是政治上的革命運動，同時也是思想上、學術上、文化上的革命運動。（下轉30頁）

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葉蠖生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是澈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羣衆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卽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同志在這個科學的歷史論斷裡，給我們對五四運動的認識，指出了三個主要關鍵：第一，這個運動的社會根源，是國內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偉大十月革命的影響。第二，這個運動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運動。第三，這個運動的歷史地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準備階段。我們就根據這三個關鍵，作一些簡單的說明。

一　五四運動的社會根源

（1）帝國主義大戰中中國民族工業的生長

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國家，在這個國度裡面發生的民族工業，好像在大石下面生出的植物，被壓得拳屈黃瘦，任憑怎樣努力，總是生長不起。自從一九一四年以後，帝國主義列强忙於世界大戰，再沒有從前那樣多的工夫來壓迫中國。這株被壓抑的嫩芽，遇到了一線生機之後，便不顧一切地生長起來。在短短幾年中，中國的民族工業，以空前的順暢姿態發展了起來。

帝國主義列强，從侵略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中，得到壓迫中國民族工業的兩件有力武器。一件是協定關稅；外貨進口，按值抽稅百分之七點五後便可行銷全國。國貨却是凡經過一次關卡都得抽稅一次。這樣使得國貨成本增高，無法和洋貨競爭。另一件是內地設廠；外商憑着雄厚的資本和熟練的技術，到中國內地來開設工廠，利用最便宜的中國勞動力，三者結合起來，也很容易打敗中國廠家。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歐洲的帝國主義列强，不得不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當時的英、法、德、奧、俄、意、美、日八個帝國主義强國中，只剩下日美兩國還能在中國趁機發展，其他六國在華勢力是劇烈的衰退了。為着更易於明瞭，請看下面兩個簡單統計表：（第一、二表）

正如這兩個表中統計數字所顯示 ， 在大戰中洋貨輸入逐漸減退了，日常用品，如洋紗、洋布、顏料、西藥、火柴等等都馬上感到缺乏，尤其是德國出品更到了完全斷絕的地步。例如本來賣幾個銅元一支的德造大號縫衣針，竟漲到幾角小洋，而且還爭購不到。為着填補市場的需要，民族工業就大大發展起來了。

第一表

歐洲主要對華貿易國家大戰時期貿易昇降表

年份		英國	俄國	德國
1912	價值	90,755	66,429	35,469
	百分	100%	100%	100%
1913		113,257	67,074	54,327
		125%	101%	128%
1914		127,784	66,054	28,760
		141%	99%	81%
1915		103,493	76,425	160
		114%	115%	45%
1916		105,272	91,209	24
		116%	137%	6%
1017		78,079	60,965	——
		86%	92%	
1918		75,155	20,993	——
		83%	32%	

（單位海關千兩）

（以1912年為百分基數）

第二表

大戰時期中國出入口商船噸數表

1913	93,335	110%
1914	97,984	104%
1915	90,663	97%
1916	88,020	94%
1917	86,907	93%
1918	80,248	85%

（單位千噸）

（以大戰前一年為百分基數）

在工業基礎十分貧乏的中國，首先發展起來的只能是輕工業，在大戰時期短短幾年中，各種各樣民族資本所經營的輕工業，都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我們試以輕工業中最主要的棉紡織業作例，來看一看它的發展情形。

中國有機器紡織工廠，是從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開始的。三十年中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十五年是開創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共創辦了近二十個廠，有了五十多萬枚紡錠。創辦人都是滿清的大官僚李鴻章，張之洞等一類人物。雖然投下許多資本，成績却是很壞。辦理成功的主要是外人（英、美、德、日）在華所設各廠。第二期十年是受到外商成功的鼓舞，民間資本逐漸加入，平穩發展時期。第三期五年是在大戰空隙中，民族工業空前發展時期。請看第三表所顯示的情況。第三期的發展。達到了上一期的二倍半。

第三表

棉紡織業三十年中發展情況表

年分	紡錠數	每年平均增加數	增加率
1890—1904	565	37.7	
1905—1914	970	40.5	108%
1915—1919	1468	99.6	264%

（單位千枚）

（以第一期每年平均紗錠數為一百）

由於新工廠不斷的建立和舊工廠的生產力的隨時擴充，棉紡織品的出入口貿易也起了顯著的變化。如果以戰前一年為基數，便可看到在大戰中，棉紡織品的出入口貿易，是向着兩極方向發展的，就是出口上昇，入口下降。情況如第四表：

第四表　大戰中棉紡織品出入口貿易表（單位海關千兩）

年分	入口	指數	出口	指數	差額(—)入超
1913	182,419	100%	2,945	100%	(—) 179,474
1914	178,259	98	2,301	78	(—) 175,958
1915	150,004	82	3,500	119	(—) 146,504
1916	136,679	75	4,375	149	(—) 132,304
1917	158,950	87	5,576	189	(—) 153,374
1918	151,380	83	5,605	190	(—) 145,775

這裡須要解釋一下的是：入口下降很和緩，是因為日貨的增加抵補了歐貨輸入的大量減少。中國棉紡織業雖然有了迅速的發展，但直到大戰終了，全國所有紗錠還不足一百五十萬枚，比起全國的實際需要來，還是很不够的。但是對外輸出上昇速度很大，為什麼供給國內還很不够，却要努力外輸呢？這是因為國內市場受到日貨的排擠，新興的紡織業不能不向南洋華僑中尋找市場而形

成的。爲了把情形弄得更顯明一些，我們再來看一看另一種統計：

第五表

大戰時期美日對華貿易變化表

年份	美國 歷年貿易值	對各年指數	對本年總額指數	日本 歷年貿易值	對各年指數	對本年總額指數
1912	71,248	100	8.5	146,279	100	17.3
1913	73,077	103	7.5	184,891	126	18.9
1914	81,445	114	8.8	191,736	131	20.7
1915	97,622	137	11.2	197,126	135	22.7
1916	125,905	176	12.6	213,413	187	27.4
1917	155,747	219	15.4	327,441	224	32.2
1918	135,820	190	13.0	402,252	275	38.7

（單位千關兩）

從第五表中所看到的日美兩國對華貿易，在大戰中都有極大的發展；不但絕對數字上昇一倍左右，而且相對值也同樣上昇，這就是其他帝國主義的勢力，被日美搶去了的指標。這裡面，美國的發展還趕不上日本，原因是一方面日本有地理上的便利，另方面美國的主要注意力這時候還放在歐洲方面。日美兩國輸出品的性質也有很大的差別，日貨主要是棉紡織品，美國則是以機械，鋼鐵等重工業產品爲主。所以，當時和民族工業利益正面衝突的，不是美國，而是日本。

我們試看另一統計，大戰中麵粉輸出入的統計。機製麵粉也是輕工業中一個較重要的部門，但這個部門在大戰中帝國主義的束縛差不多全部放鬆了，不像棉紡織業還有日帝國主義那個勁敵，所以這兩者發展的情況便全然不同了。

第六表　大戰時期麵粉輸出入表（單位担）

年份	入口	出口	差額 出超(一) 入超(十)
1912	3,202,501	637,484	(一) 2,565,017
1913	2,596,812	139,206	(一) 2,457,615
1914	2,197,241	87,041	(一) 2,110,200
1915	158,273	216,225	(十) 57,952
1916	233,464	289,747	(十) 56,083
1917	678,849	789,031	(十) 110,182

用第六表和第四表比較來看，帝國主義傾銷力量，對於民族工業的壓迫是最明顯的，解除了外力壓抑的機粉業便從入超一變而爲出超。受到日本勁敵所壓迫的棉紡織業則保持了大戰以前的入超額，始終無大變動。所以，在大戰空隙裡生長起來的中國民族工業，完全以帝國主義的桎梏放鬆的程度爲定。帝國主義列强忙於大戰的軍火生產，輕工業首先被放鬆了。因而，中國的輕工業中如：棉紡織、麵粉、捲烟、火柴等等部門，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還談不到，建設工廠的機器還得向外國去買。雖然，在大戰中美國曾向江南造船廠定造一萬噸商輪五隻，使當時頗爲轟動，認爲是中國重工業中的一件大事；實際上原料還是美國運來的，不過是利用中國低廉的人工罷了。不澈底打倒帝國主義的束縛，民族工業便不可能得到獨立自由發展的前途。

（2）大戰結束前後帝國主義在中國操縱封建軍閥的鬥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起了很大變化。歐洲列强無力東顧，中國成爲日美兩帝國主義角逐爭雄的場所。在第一次大戰時候，美國的力量還不十分强大，對侵略中國有利條件上，無論是歷史的，地理的那一方面，都比不過日本。所以在角逐中美國常是落後於日本的。一九一七年初美國對德絕交，並勸告中國和它一致行動。中國接受這一勸告，對德提出抗議時候，日本馬上警告北京政府說：此等大事，不先告知日本，甚爲遺憾。以後如外交上有所行動，請中國政府注意。另方面，取得英法俄意四國秘密協定，承認日本將來繼承德國在山東所强佔的一切權利，作爲日本准許中國對德宣戰的條件。這樣日本便把借參戰爲名以操縱中國軍閥的機會，從美國手中搶了過去。

挑動內戰，從中取利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老辦法。日本更是個中能手，它以援助中國參戰爲名，和皖系北洋軍閥緊緊勾結起來。在短短一年半時期中

(一九一七年六月至次年年終)借給皖系軍閥數萬萬元日金巨欵。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得到日本的支持，把持中央政權，大事擴充武力，製造分裂中國的南北混戰。日本曾從這個賣國政府手中得到許多特權。其中最爲全國人民所反對的幾項：一個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以反對蘇聯爲目的而訂立的中日共同防敵協定。從這個協定中，日本取得在東北及外蒙駐兵和參與中國國防秘密的特權。另一個是同年九月交換的山東問題換文，日本在換文中提出佔領青島和膠濟鐵路辦法，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復文中代表北京政府表示「欣然同意」。使日本强佔行爲獲得合法根據。

這個時候美國自知無力打敗日本，祇好採取帮兇手段，從傍分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日美公布石井藍辛協定(日本赴美特使石井菊次郎與美國務卿藍辛所簽訂)，在這個協定中，美國承認日本侵略中國的特權，日本也允許美國不受歧視的共同侵略中國。這個時候，美國還只能以日本的帮兇地位自居。

到了大戰將近結束時候，情形就不同了。在大戰中，美國大發其戰爭橫財，從負債國一變爲債權國。大戰中獲勝的英法勢力又重新回到遠東。以美國爲首的美英法帝國主義勢力，聯合起來打擊日本，再不容忍它獨佔中國了。

殘酷的世界大戰剛剛過去，號召和平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在中國，受到皖系軍閥武力進攻和壓迫的各系軍閥，都把要求和平作爲反對自己敵人的手段•剛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也覺得和平有利於自己市場的擴大。美國馬上抓住這個武器來打擊日本操縱中國的武力統一運動。一九一八年十月，美總統威爾遜致電北京政府，勸以息爭謀和；駐廣州的美國領事，也把同樣的勸告送給南方的軍政府。同時英法也警告北京政府，責備它從事內戰，參加歐戰不力。受到美英法聯合壓力的日本，宣告停止對南北政府的借欵。隨着日本主人一同軟下來的皖系軍閥，表示贊成和平。於是素來以殺人爲業的軍閥，挑撥戰爭爲生的政客，一下子都變成了和平天使，各發通電，大談和平。混戰就這樣停了下來，一九一九年春在上海開了南北議和會議。可是誰也沒有和平誠意。在美英支持下的南方代表，借着和會講台打擊日本，提出取消一切中日密約，解散參戰軍等條件。受日本操縱的北方代表，對這些條件自然拒絕，和平會議祇能以破裂終結。和議一告破裂，美國馬上邀集英法意日駐華公使，向南北政府再提勸告，要他們繼續謀求和平，駐京公使團也通知北京政府，在中國內戰未停，全國未統一前禁運軍火來華。更由美國提議，將一向爲日本所把持的三國銀行團改組，加入美國，成立美英法日四國銀行團，包辦一切對中國的借欵，以打擊日本獨佔對華投資的優勢。這一切的設施，都在强烈地限制日本勢力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被迫不得不暫時停止了向南中國的前進，把它卵翼下的段祺瑞的參戰軍改爲邊防軍。轉向外蒙古方面活動去了。不澈底打倒帝國主義的爪牙——封建軍閥，中國人民就不能獲得自由、民主與和平。

(3)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影響

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建立，大大地震動了整個的世界。一方面是千百萬的勞動人民受了它的感召鼓舞，起而進行革命的鬥爭。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强却驚慌失措，手忙脚亂地組織了對蘇聯的武裝進攻，並且造謠誣蔑，隔絕封鎖。中國的北京政府也跟在後面搖旗吶喊，充一名反蘇的馬前走卒。蘇聯政府建立之始，馬上和北京政府談判，願意放棄一切帝俄侵略中國所得的權利，和中國建立平等友誼的邦交。可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北京政府不但沒有胆量接受這個友誼的建議，反用一切方法封鎖消息，不讓中國人民知道。接近官方的報紙雜誌，還竭力宣傳過激黨(這是從日本傳來惡意中傷共產黨的名辭)的行爲如何殘忍可怕。因此當五四運動前夜，這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對於中國人民的影響，却還是模糊淡薄的。

但是，隻手終不能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在高等知識分子中間，終竟從外國的書報雜誌中了解了一些蘇聯的眞情實況。這就大大刺激起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研究，所以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這一年中，報紙雜誌上介紹和討論社會主義和蘇聯情況的文字漸漸多了起來，不過內容都還膚淺蕪雜，各種各樣的反動的社會主義，也和馬列主義一同被介紹過來。在這種啓蒙的萌芽時期中，却有一個獨具卓識遠見的先覺者，宣佈了他對於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傾其全力去宣揚傳播，那便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李大釗同志於一九一八年舉世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時候，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的一篇論文。他明確地指出；這次大戰的勝利者不是帝國强盜羣中的協約國而是勞工階級的勝利，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不是什麽英美法的大總統、大皇帝、大元帥們的功勞，而是馬克思、列寧的功勞。他熱情地，遠見地指出；「由今而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塞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塞維主義的凱歌之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前夜正是如此情況呵！重新回到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各系軍閥、買辦、官僚、地主、舊傳統的封建道德等這一些統治中國的

勢力，外貌雖然還很強大，實際上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中，他們已注定了必然沒落的失敗的前途。另一方面，新興的工人階級，民族資本，社會主義運動，這一切，雖然還很微弱，但因合乎歷史發展的要求，具有必然發展勝利的前途。只有一個眞正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才能從微弱的，萌芽的新事物中，認識到歷史必然發展的前途。

二　愛國運動中統一戰線的發展

（1）文化革命統一戰線的前期運動

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前夜，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如上節裡所講過的，處在新舊對立的激烈的矛盾中。一方面，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逐漸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它還是很微弱的，但在當時，它是一種新生的向上的力量。另一方面，封建經濟還佔着重要的統治地位，但它已是腐朽沒落的，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一向佔統治地位的買辦經濟，因爲帝國主義忙於大戰，在中國的勢力減弱了，但個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却乘機發展，以更兇暴的方式擴大了對中國的侵略。這一切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會的上層建築，思想意識裡去。觀察力極深刻的李大釗同志有一段話，反映了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對這種矛盾的痛苦心理：

我前歲在北京過年，剛過新年，又過舊年；看見賀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跪拜，有的脫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門首懸掛國旗，有的張貼春聯。因而起了種種聯想，想起黃昏時候走在街頭，聽見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響，看見的是站崗巡警的槍刺耀耀的亮。更夫是舊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有巡警，何用更夫？又想起我國現已成了民國，仍然還有什麼清室。吾儕小民，一面要負担議會及公府的經費，一面又要負担優待清室的經費。民國是新的，清室是舊的，既有民國，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來民國？又想起制定憲法，一面要規定信仰自由，一面又規定以孔道爲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舊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謂信仰自由？又想起談論政治的，一面主張自我實現，一面鼓吹賢人政治。自我實現是新的，賢人政治是舊的，既要自我實現，怎行賢人政治？若行賢人政治，怎能自我實現？又想起法制習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許納妾的習俗。禁止重婚是新的，納妾習俗是舊的，既施刑律，必禁習俗；若存習俗，必廢刑律。」

看到這種種矛盾現象之後，他歸納起來指出：

「中國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的現象，舉國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這種矛盾的生活，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靈。」（新的舊的．新青年四卷五號）

這段話正代表了受到資本主義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滿舊傳統，要求打破這種矛盾現狀的強烈的呼聲。這些反抗舊傳統的知識分子，環繞在新青年雜誌社的周圍，形成了領導文化革命的主力，展開了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激烈運動。

在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創辦了定名「青年」的雜誌，第二年就改叫「新青年」。在「新青年」上，他開始提出了反對舊傳統，要求接受資本主義文化的思想。這個雜誌漸漸成爲團結前進青年知識分子的中心。到了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的校長，他竭力主張學術思想自由，容納各種不同的學說在北大自由講授。他把陳獨秀聘去當北大的文科學長（等於今天的院長）。這以後，受到資本主義文化教育的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易白沙，周作人，胡適等人，都集結到「新青年」雜誌方面來，成爲當時文化運動的一支主流。這一時期鬥爭的情形，可以用陳獨秀一段話來作爲簡單的說明：

「本誌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却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不用說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成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他們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義），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來無罪，只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二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六卷一號）

（2）五四愛國運動前一階段的發展

巴黎和會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操縱下帝國主義強盜分贓的會議。所以允許中國代表在這個會議上提出日本強佔山東權利的問題，僅僅是美國爲着和日本分贓時借此作爲討價還價的本錢，等到日本在別的方面對美國讓步時，美國就站到日本一邊，主張把中國的主權作爲禮物送給日本了。中國代表受了美國僞

善言辭的欺騙，妄想依靠美國強盜的幫助收回主權，結果上了圈套，落了一個徹底的慘敗。北洋軍閥政府，完全屈服在帝國主義淫威之下，企圖簽訂這個辱國喪權的和約。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愛國運動，打破了帝國主義及其爪牙北洋軍閥政府的幻想，迫使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不得不違抗政府的意旨，拒絕了簽訂這個喪權辱國的和約。

五月初，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的要求完全被拒絕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北大、高師、法政等校學生在五月二三兩日各自開會討論辦法，並派出代表聯絡各學校，準備在五月七日舉行大示威。後來因爲時機緊急，提早舉行，北京十三個學校的幾千個同學，在五月四日上午舉行了震動世界的大示威。北洋軍閥政府對於羣衆的愛國行動，打算嚴加鎭壓，當天就沿途逮捕了北大、高師、中大、工專、匯文五個學校的學生三十二人。後來看到各地反抗的聲勢很大，改取了緩和辦法。一面准許保釋被捕學生；一面在保釋後又發表了一個明令，要內務部將「所有當場拏獲滋事學生，由警廳送交法庭嚴辦，」又「着該部查明此次滋事確情，呈候核辦，並隨時認眞督察。」這就是說，這回對你們總算從寬處理了，下次再敢生事，定要嚴辦，想借此來恫嚇愛國青年。一方面溫語挽留羣衆要求嚴加懲辦的，引咎辭職的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而對學校有關官員，北大校長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却迫使辭職。

五四青年學生大示威的行動，馬上得到全國各界的響應。五七紀念日全國各大城都開了大會，紛紛要求制裁禍國害民的官吏，直接收回山東主權，拒絕簽訂和約，展開抵制日貨等活動。可是，直到六月三日爲止，運動還只限於學生和市民這個範圍，運動的方式也以請願爲主。希望帝國主義爪牙北洋軍政府起來反對主子，當然是一種幻想。曹陸章三個被指出的賣國賊，不過是重要的從犯，主犯還是北洋軍閥政府的頭子袁世凱，段祺瑞等人。曹汝霖一段個中人語，正說出了當時羣衆所沒有認清楚的賣國眞像。他說：「中國經手外債不止曹姓一人，而且主張借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是扶助的一人，怎能指爲賣國賊？不過我深悔當時聽從段合肥以武力統一中國政策，以致生此後果！」打破羣衆這種幻想，迫使中國代表拒絕簽字的是：六三以後發展爲有工人階級參加的廣大的羣衆運動。

(2)五四愛國運動後一階段的發展

五月十九日北京專科以上十八個學校宣佈罷課，提出四項請求：一、賣國賊務須懲辦。二、山東交涉不能簽字。三、挽留傅增湘、蔡元培。四、繼續南北和議。各地學生立刻起來響應。北洋軍閥政府於二十五日下令禁止集衆游行演說，散佈傳單。這種高壓手段，招到了強烈的反抗，六月三日北京學聯分派五十人爲一隊，四出作愛國宣傳。警察廳拘捕了愛國學生一千多名押送北京大學拘禁。在外省，武漢，南京等處也發生了同樣暴行，武漢並且打死一人。這種暴行馬上遭到全國各地各階層聯合的反抗。罷工，罷市，罷課在各大城市裡紛紛爆發。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次開始了政治罷工，加入這個愛國陣線。在上海和北方罷工的範圍從國營企業京奉鐵路，滬寧鐵路，江南造船廠直到私營企業的機器、紡織、印刷、市政、海員、捲烟、火柴、造紙各業工人以及手工工人，店員工人都參加進去了。北京的銀行界聯合警告北洋軍閥政府說：「如今日不解決，明日即無法維持。」在全國羣衆運動的壓力下，北洋軍閥政府不得不讓步了。六月七日釋放被拘學生，十日下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十一日北洋軍閥政府傀儡總統徐世昌送了一個引咎辭職咨文給參衆兩院說：「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惟有重視英美法日各國之意見，毅然全約簽字，以維持我國際之地位。」然而，「國內輿論，拒絕簽字，如出一轍。」他想「經情措理，旣非服從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爲從違，而熟籌利害，又不忍坐視國步之顚躓。」便只好引咎辭職了。這些人又向帝國主義宣告，無論人民怎樣反對，我北洋軍閥政府是不會俯順民意，干犯了主人帝國主義的利益的。然而，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在人民威力壓迫之下，却不得不違反了他們政府的意旨，拒絕簽字。六月二十八日中國代表發出一個申訴苦衷的通電說：「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云云。豈知至今日午時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整及前途安危，關係至鉅。祥等所以始終不敢放鬆者，固欲使此問題留一線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祥影響。不料大會專斷至此，竟不稍顧我國纖微體面，曷勝憤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就是用這樣專斷，這樣不留纖微體面來對待中國代表的。但是專斷的帝國主義者，意想不到他們這種蠻橫行爲，竟激起中華民族的奮起，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鬥爭序幕。

三 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工作的開展

(1)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對中國影響的擴大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從它剛剛誕生的時候起，便宣佈願意廢除帝

俄時代侵略中國取得的一切特權，取消它和中國及其他國家所訂立的一切奴役中國人民的秘密條約，並和中國政府討論恢復中蘇兩國平等友誼的外交關係。但是蘇聯這種正義的要求，被受着帝國主義指使的中國反動政府嚴密地隱蔽起來。中蘇恢復邦交的談判，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帝國主義脅迫中國政府，並重賂中國官吏與報紙，使中國政府和蘇聯斷絕往來。可是，這種遮蔽中國人民耳目的陰謀，終於被蘇聯紅軍反對外國干涉者戰爭的勝利衝破了。一九一九年七月，蘇聯紅軍已經解放了西伯利亞，便直接向中國人民發出通知，宣佈蘇聯政府願意廢除帝俄時代一切對華的特權和密約，揭破了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阻絕中蘇兩國建立友誼的陰謀，號召中國人民自己起來恢復中蘇兩國的友誼。這個正義的友好的通告，雖然被反動派壓抑了半年多，不讓中國人民知道，到了一九二〇年春天，終於隱蔽不住了，中國報紙在四月間將這個通告的全文披露，馬上在全國各階層人民中得到熱烈的響應。工人，學生，工商界，新聞界，以至國會議員等各種各樣的職業團體和羣衆團體，都起來熱烈答復這個正義的友好的建議，表示感謝並願和蘇聯人民恢復友誼，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比較開明一些的報紙，也都紛紛發表社論，督促中國政府接受蘇聯的建議，早日恢復中蘇邦交。中國人民的正義的要求，雖然被反動政府拖延不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態度，却因此傳播全國，起了偉大的影響。

（2）文化革命統一戰線的分裂與新發展

文化革命的前一時期，是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來進行的。經過六三以後廣大羣衆愛國運動的推動，經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不斷勝利的推動，這個統一戰線再不能停留在原來地位上了。在前一時期，運動還限制在反對國內封建傳統的意識形態，經過五四愛國運動，尤其在六三以後有工人階級參加的廣大羣衆運動之後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被提到運動的重要地位上來了。經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和推動，統一戰線中前進的知識分子，再不能滿足於僅僅吸收資本主義文化，僅僅擁護德賽二先生了。在五四以前，仰望社會主義革命，歌頌布爾塞維克勝利，還僅限李大釗同志那樣個別的先覺者。在五四以後，想去研究共產主義眞理，想去了解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是前進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的現象了。所以，在五四以前，只能在極少數進步刊物上有人談到共產主義和蘇聯。在五四以後，許許多多新的週刊，旬刊，月刊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各種報紙上也多增設了副刊。不管是贊成的或是反對的，是正面介紹的或是反面批評的，大家都爭着在這些刊物上談論共產主義，介紹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了。反對帝國主義問題，如何對待共產主義問題，已經是文化革命統一戰線中每一個人所面對着的現實，必須表示自己的態度，如何處理對於革命的向前發展，是迎接呢還是退却。

在現實的考驗中，代表不同階層的知識分子，就表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代表運動的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胡適這一流人，在革命面前退却了。代表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共中階層中前進的知識分子李大釗同志等人，勇敢地接受了革命任務，隨着時代前進了。這兩派人中間必然地發生了爭論以致於完全分裂。爭論的起點，是「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一九一九年七月，胡適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叫做「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文章，反對澈底進行革命，主張點滴的改良。李大釗同志接着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文章，批駁了胡適的錯誤，正確地指出中國解放的道路，必須是澈底的根本解決的革命方法，這個辦法，就是階級鬥爭發展到用武力來澈底改造社會制度的辦法。在達到根本解決以前，還必須進行相當的準備工作。從這個分化的標誌開始，這兩派人都向着不同的方向發展，胡適這一派人背着歷史發展的方向前進，一直墮落成爲反對祖國的戰爭罪犯。李大釗同志這一派人，順着歷史發展的方向前進，勇敢地担負起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工作的任務。

（3）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工作的完成

經過了六三以後羣衆運動的體驗，接受了國際革命經驗的教訓，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到不把前進的知識分子在共產主義下組織起來，不使共產主義理論與各無產階級羣衆相結合，就不能發動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後，他們和統一戰線中右派分裂之後，就認眞地做好這兩件工作。到了一九二〇年，國內幾個主要大城市中和國外留學生中成立了九個共產主義小組。這些小組並不是閉門讀書，僅僅在案頭上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他們深入工廠，礦山，和工人做朋友，辦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把共產主義理論傳授給工人，組織和領導工人進行鬥爭。經過實際鬥爭的勝利，教育了和團結了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工人運動大大展開了。在無數次鬥爭中，教育了無產階級，使共產主義眞理在無產階級中培植下深厚的信仰；在無數次鬥爭中，鍛鍊了無產階級，培養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骨幹。就這樣，完成了革命準備工作，準備了震動世界的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大革命的基礎。

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李何林

去年紀念五四時，北京各中等以上學校和各報上都展開了「誰領導五四運動」的討論；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爲領導骨幹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對於過去單以表面的數量上在五四時代佔優勢，而在質量上落後的資產階級思想或它的知識分子領導五四運動的思想，是澄清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資產階級思想在當時世界範圍內是早「已開始衰亡的東西」，無產階級思想「是正在產生（在中國）正在發展的東西」。後者在五四時代的量上雖然比較少，但在先進的本質上它是起着領導作用的；理由和例證大家都舉了很多，這裡不再重述了。

但是，去年的討論僅限於「五四運動」或「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誰領導的問題，沒有談到五四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或影響的情況。當然，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且是成績最好的一部分；新文化運動既然爲無產階級思想所領導，新文學運動當然也是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但實際的情況究竟怎樣呢？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的同志們，就曾經想得到一點具體的了解，我也曾作過一些粗略的解釋。本文的目的就在對於這一問題試作一粗淺的說明，因限於時間和手邊的參考資料以及本人的學力，錯誤或不妥是難免的。

一　「二七」以後無產階級思想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鮮明表現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九二二年香港的海員和搬運工人反英帝國主義的大罷工，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工人反封建軍閥的壯烈鬥爭：顯示了中國無產階級的社會存在和它的巨大的組織活動的力量；這種存在和力量，鮮明的反映在「二七」發生三個月後（即一九二三年五月）郭沫若先生所寫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和郁達夫先生的「文學上的階級鬥爭」裡面。郭先生說：

「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毒龍。
我們反抗不以個性爲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們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們反抗藩籬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們反抗由以上種種所產生出的文學上的情趣。
我們反抗盛容那種情趣的奴隸根性的文學。
我們的運動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魔宮。」

這雖然不純粹是無產階級的思想，但他反對「資產階級的根性」，「反抗資本主義的毒蛇」，要「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已顯然是無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鮮明表現；他三年後（一九二六年四月）發表的「革命與文學」，一般被認爲是「革命文學運動」（即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第一篇宣言書的，其中心思想亦即如此。

郁先生說：

「所以最後我想學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大聲疾呼的說：
世界上受苦的無產階級者，
在文學上社會上被壓迫的同志，
凡對有權有產階級的走狗對敵的文人，
我們大家不可不團結起來。
結成一個世界共和的階級，百屈不撓的來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確信『未來是我們的所有』。」

這篇「文學上的階級鬥爭」雖然也不純粹是無產階級思想，但僅就標題和

上面引的幾句看，已鮮明的可以看出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此外，據錢杏邨先生說：「在『新青年』上蔣光慈就發表過一篇『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在一九二五年於『覺悟』新年號上就發表過『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並且在一九二四年辦過一個『春雷』週刊，專門提倡革命文學。又他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所寫的革命歌集『新夢』和小說『少年漂泊者』，在一九二五年也就先後發行了。」

「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是否在「二七」以前發表？錢先生沒有說；「少年漂泊者」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寫完，一九二六年春出版的（根據作者自序）；「新夢」我手邊沒有，假使它是「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寫的」，而且內容確實表現出無產階級思想的「鮮明的」影響，那麽，我這一段的標題就應該改成「一九二〇年以後無產階級思想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鮮明表現」。它的「鮮明的」表現就應該從「二七」向前提早三年。

一九二四年以後，無產階級思想在新文學運動上的影響或「鮮明的」表現，就不用再細說了：除了上舉郭，郁，蔣三先生外，一九二五年四月魯迅先生發表的「燈下漫筆」，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先生的「革命與文學」，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仿吾先生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以至一九二八年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都一天天的「鮮明的」表現出無產階級思想對新文學的「影響」，「領導」，以至「主導」的力量。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無產階級思想對新文學的領導力量就更加强，更壯大了。

二 「二七」以前無產階級思想對新文學的影響

「鮮明的」表現既然在「二七」以後，而本文的題目是「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那麽，從一九一七年新文學運動開始，到一九二三年「二七」之間，這六年的新文學，從那些情況可以看出它是受了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或領導呢？我想從下列兩方面來試答這一問題：

第一，從這幾年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廣大傳播情況，來推定當時一部分文學工作者必在無形之中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或領導。

第二，從當時文學工作者所表現的不同思想情況，來斷定他們中的一部分是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或領導；也就是影響或領導着新文學運動。

現在就從這兩方面來看一看：

（1）從這幾年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廣大傳播情況，來推定當時一部分文學工作者必在無形之中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或領導

一九一六年九月李大釗先生在二卷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青春」一文，他說：「青年之自覺，一在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僵屍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進而縱現在青春之我，扑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爲世界進文明，爲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乘風破浪，迢迢乎遠矣。」「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于世者，不在齗齗辯証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這種勇猛的對舊社會戰鬥和對新社會嚮往的精神，已不是沒落的資產階級精神，而是新興無產階級的精神。

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又發表了「今」：「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着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時代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這種詞意磅礴的氣勢，表現了新興階級的樂觀戰鬥精神；這些語句，也顯示了初期辯證唯物論的思想。

這些精神或思想，也大致相似的表現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和一九一八年魯迅先生的「隨感錄」（見「熱風」）裡面。

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釗先生又在「新青年」五卷五期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他在「庶民的勝利」裡說：「這回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乃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由于「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爲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因此引起了「俄、德等國內勞工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他說「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他在「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裡面說：「對于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他說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主義，「就是

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目的，在于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一。「戰爭固爲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懼怕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于世界資本家的戰爭」，「他們將要聯合世界上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强的抵抗力，創造一個自由鄉土。」

應用無產階級思想觀點所寫的這兩篇文章，對于無產階級思想的傳播，作用很大。

一九一九年「新潮」上發表了李大釗先生的「物質變動與精神變動」，初步的介紹了經濟基礎與上層文化關係的唯物論的理論。一九二〇年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同年十二月他又發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原因」，同年又發表他的「五一運動史」。

一九一九年「新青年」出版了一期「馬克思研究號」，其中有李大釗先生的「我的馬克斯主義觀」，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重要方面，（階級鬥爭，剩餘價值，唯物史觀，社會主義）一個雜誌而能出版對某一種主義或學術思想的研究介紹專號，這表示這一種主義或思想瞭解它的人已經相當多，能有一些人爲它寫文章；另一面也表示這類文章有相當多的讀者願意看，或者希望看，也就是它有相當的社會基礎了。

同時，這種思想傳播或影響的普遍性，甚至使反動國民黨的宣傳員戴季陶、胡漢民也多少受了一些影響：戴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了「從經濟上觀察中國之亂源」（「建設」雜誌），胡發表了「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同前）。他二人都認爲「經濟事情是一個最重大的原因關係」。當然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是和李大釗先生不同的。而中國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代表胡適也說「胡漢民的唯物研究是我很佩服的」，他開始並不敢對馬克思主義採取公開鮮明的反對態度，也可見這種思想在當時的聲勢。

一九二二年「嚮導週報」出版，「共產黨宣言」也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譯出了。

無產階級思想這樣廣大的傳播，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組織活動創立了基礎：李大釗等在北京，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湖北，王燼美等在濟南，都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小組。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羅邁、李富春、王若飛、向警予等又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少年共產團。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無產階級今後有組織的活動，就一一的展開了：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大罷工，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開幕，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罷工，……

以上所述無產階級思想傳播的情況和中國無產階級有組織的活動，使當時的文學工作者不可能不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當然資產階級思想也在影響着他們，問題就在那一種思想影響他們最多最大，他們就形成爲那一種思想的知識分子。

但我現在可以推定：像李大釗、毛澤東等當時在政治思想和一般文化學術思想上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或領導一樣，當時的文學工作者也必定有一些人被同樣的思想所影響或領導。

（2）從當時文學工作者所表現的不同思想情況，來斷定他們中的一部分是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或領導

首先是胡適和陳獨秀的對比：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主張改良文學須從八事入手：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語俗字。（後來改成「八不主義」）

題目僅止「改良」，八項主張中又有六項涉及文學形式，其他二項：「不作無病之呻吟」也就是「須言之有物」；但問題不在「物」之「有」否，應在「物」之好壞。

以後他又發表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也僅提出了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和「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形式主義的主張。

這是在當時（以至現在）被資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或領導的可憐的「學者」，所表現出來的改良主義的和形式主義的軟弱的灰白色的文學思想！

陳獨秀就和他不一樣：他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他當時已經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子，（這是說他在「當時」，以後的叛變是另一事，）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胡適）之聲援。

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雖然還看不出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但它內容的革命精神，和一往直前的戰鬥氣氛，都不是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所能做到的。而陳獨秀在當時也確已受了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再過幾年，陳獨秀的初步的唯物論的文學思想也就鮮明的表現出來了。他在「科學與人生觀序」（手邊無原書，不能查出年月，記得仍在「五四時代」。）說：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以上是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胡適，和受無產階級思想影響的陳獨秀的對比。

雖然有程度之差，我們還可以從當時的文學界中舉出來有與胡適思想相類似的被資產階級思想所影響的周作人、劉半農、傅斯年、梁實秋、羅家倫、徐志摩、冰心、康伯情等等；有與陳獨秀相類似的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的魯迅、郭沫若、沈雁冰等等。前一部分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後一部分人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在無形之中或不知不覺之中被無產階級思想或多或少的影響着或領導着。

大家試把當時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周作人開始也多少受了一些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譬如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發表的「人的文學」裡面，對于人的理想生活，主張「應該各盡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不過這種思想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部分，）胡適的「嘗試集」，劉半農、傅斯年、梁實秋、羅家倫的論文，徐志摩的「志摩的詩」，冰心的「繁星」「春水」「超人」，康伯情的「草兒」等等，去和魯迅的「吶喊」和「熱風」及「墳」中一部分雜文，郭沫若的「女神」，沈雁冰的論文等等比較一下罷！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消極的或積極的精神，他們對人生社會的不同態度，他們思想的不同深度！

郭沫若在「女神」中高呼：

「爲自由而戰啊！
爲正義而戰啊！
爲人羣而戰啊！
最後的勝利總在吾曹！
最高的理想只在農勞！
同胞！同胞！同胞！」

「女神」裡面的詩十分之九充滿了反抗、戰鬥、樂觀、光明的色調，而且他在這首詩裡面歌頌了「最高的理想只在農勞」（蘇聯的勞農政權）。

冰心則歌唱着：（見「繁星」）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在這樣「心中的風雨來了」時，冰心女士的辦法是找一個躲避處；我們聽得她說了：（見「繁星」）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他的巢裡；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裡。』

——茅盾：「冰心論」。

有人說「冰心是新式閨秀作家」，從這些詩看，我以爲是並不寃枉的。對于她的小說，茅盾先生有如下的批評：

『是那時的人生觀問題，民族思想，反封建運動，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期所有的作家一樣「從現實出發」。然而「極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歡的；所以在「兩個家庭」中，她一方面針砭着「女子解放」的誤解，一方面却暗示了「良妻賢母主義」（我們說她是「新」良妻賢母主義罷）之必要。在「斯人獨憔悴」中，她勇敢的提出「父與子的衝突」來了，可是她使得那「子」——五四式青年穎銘，終於屈服在舊官僚的「父」的淫威之下，只斜倚在一張籐椅上，低徊欲絕的吟着：「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而在「去國」這一篇，她使那位學成歸國，滿懷壯志的年輕留美學生終於灰心去國，「不如先去到外國，做一點實事，」而且

這位青年留學生的父親——從前帶了一箱炸彈，雍容談笑進了廣州城的老革命黨，又是多麼暮氣頹唐！她的問題小說裡的人物就是那樣軟脊骨的好人。』

這就是冰心的詩和小說！她歌頌「母親的愛」，「小孩子的天眞」和「海的美麗」。但這和高爾基的「母親」裡面「母親的愛」；愛倫堡的「烟袋」裡面所寫的小孩子的天眞；高爾基的「海燕」「馬爾華」裡面所寫的海景，是多麼不同呵！我們並不是說她爲這些主題就不好，問題只在怎樣的寫法；從這裡我們看見作者的思想。

那麼，生在同一時代，同一環境，面對着同一文學問題，同一社會現實，胡適和陳獨秀，郭沫若和冰心，以及其他人們，爲什麼能有這樣不同的表現？難道一方面因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方面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麼？他們的「革命的」思想又是一種什麼思想呢？他們是被小資產階級思想領導着呢？還是被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着？

其他的人我們這裡沒有篇幅來一一加以比較了；我想把當時的魯迅先生和無產階級思想的關係提出來談一談。

三　五四時代的魯迅先生的思想不單純是進化論的思想，同時也有階級論的思想；即他也是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所領導的。

近來有一些人以一九二八年爲界，把魯迅先生一生的思想劃分爲二截，即一九二八年以前是進化論的思想，一九二八年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以後是階級論的思想。證明魯迅先生的前期（一九二八以前）思想是進化論思想，可以從他的作品裡面找出許多證據，事實上有一些人業已找出了。我基本上同意魯迅先生的思想發展道路大致是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看法；但我不同意說魯迅先生的前期思想是「單純的」進化論思想，我認爲除這種思想以外，還有無產階級思想即階級論的思想，在無形中影響着他，爲他在無意中所掌握，所運用。而瞿秋白先生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裡面也僅只說『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他說的是「五四前」，而且僅是「他的基本」；接着瞿先生又說：

『他熱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襲擊着宗法社會的僵尸統治，要求個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漸漸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會裡的層層壓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雜憶」，以及整部的「華蓋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華蓋集續編」，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火焰。自然，這不是社會科學的論文，這只是直感的生活經驗。』

他怎樣會「漸漸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會裡的層層壓榨」，「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呢？除了「直感的生活經驗」以外，必須有階級思想的影響。

他表現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裡面的人吃人的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和表現在他一九二五年「五卅」前發表的雜感「燈下漫筆」的思想是一樣的：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厨房。……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厨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兩篇作品對於中國現社會和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充滿了這樣强烈的階級觀點的認識和戰鬥的精神，是單純的進化論思想所能達到的嗎？

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後來收在「熱風」中的「隨感錄五十九『聖武』」裡面說：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爲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烟燄。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他的意思是說：可怕的不是「主義來了」，而是摧殘人民，壓迫新思想的這個「來了」（封建暴力的刀和火）——封建權力的「聖武」。對于「別國」（新社會的蘇聯），這是一首多麼有力的讚歌！他從十月革命看出了「新世紀的曙光」，號召人民向那「抬起頭」來！

要注意：這是「一九一八年」魯迅先生寫的！他在當時對于十月革命就達到了這樣的進步認識和極度的贊揚！這是單純的進化論思想所能作到的嗎？除李大釗先生外，就現有的當時（一九一八）發表的文獻中還找不到第二人。

由于在五四時代魯迅先生所受的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還不够多，他無形中

所能掌握所能運用的這種思想觀點，還不够全面，不够明確，所以瞿秋白先生說：

「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着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裡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魯迅雜感選集序）

魯迅先生的作品（小說，雜文，散文詩……）裡面有不少一部分確實流露着「一時的失望和悲觀」，有時是感傷的情緒；但他並不絕望和頹廢！我們每次翻開魯迅先生的作品，卽使是感傷，失望和悲觀的作品，讀完了以後，總似乎給我們添加了一種莫名的力量，鼓舞了一些生之勇氣。這由於雖在他的感傷，失望和悲觀的作品裡面，也往往充滿了憎恨，搏鬥；充滿了熱，充滿了光的！譬如小說「故鄉」裡面是流露着濃重的感傷和悲觀的情緒的，但是他說「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這是怎樣積極的肯定的號召我們去爲「新生活」「新希望」開闢道路的樂觀戰鬥的精神！

他在小說「藥」的後面，在爲辛亥時代的革命而犧牲的夏瑜的墳上放上一個花環，暗示着這犧牲的光明前途，和一個夏瑜雖然死了，還有無數的夏瑜在爲革命戰鬥着，並且敢於來送獻這個花環。魯迅先生自己雖然說「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因爲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吶喊自序）但他同時又說他「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同前）他的作品的目的是在鼓舞革命者「不憚於前驅」，而那花環，那光明的象徵，也不是他「平空」「添上」的，（不像那些公式化的作品後面硬加上去的一個「光明尾巴」）是他對於革命的樂觀思想的應有的結果。因爲，大致說來，他的作品裡面的戰鬥的熱情還是壓倒了悲觀失望的情緒，而這是由於他對現實的積極的樂觀的思想。「藥」的最後說：

「兩人站在枯草叢里，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這篇「藥」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寫的）

這不是寫寫景而寫景：「鐵鑄一般站着」，「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這是象徵着革命者的戰鬥的雄姿，象徵着革命或革命者的海闊天空似的遠大前程。

從以上所舉的魯迅先生在五四時代的這許多表現，是不是僅僅進化論的思想所能使他作到的？

中國的新文學，從五四時代起到現在止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義文學當然也應當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以至組織領導的文學。毛主席說：

「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方向；魯迅的文學方向，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方向；他的文學活動也就不得不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所領導，也必須如此，他的作品才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也才值得毛主席像上面那樣的用盡了最高的贊詞來稱頌。單純的進化論思想不可能達到那樣的程度。

我們說：「五四運動是以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爲領導骨幹的革命運動」；說五四運動（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包括在內）的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而這種領導或影響應不是籠統的，抽象的，它應是通過文學工作者的寫作，具體的表現出來。假使被毛主席用最高的贊詞所稱頌的，在當時（以及以後，終生）做工做得最好的魯迅先生，還沒有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影響，所領導，那麼，無產階級思想究竟影響了誰，領導了誰呢？魯迅先生在「五四時代」或一九二八年以前所運用的思想武器，是單純的進化論思想嗎？

因爲限於時間和參考資料以及筆者的學力，本文太粗淺和疏陋了，謹提供同志們參考，批評或討論。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於北京師範大學。

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

孫伏園

一

我自己都記不得了，一九二四（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二日的『晨報副刊』上有一篇我的小文，題名『關於魯迅先生』，承林辰先生抄寄給我，其中有一節討論到『狂人日記』。文中這樣說：

『魯迅先生所以對於「吶喊」再版遲遲不准許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是他聽說有幾個中學堂的教師，竟在那兒用「吶喊」做課本，甚至有給高小學生讀的。這是他所極不願意的，最不願意的是竟有人給小孩讀「狂人日記」。他說「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看的書雖然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吶喊。」他說，他雖然悲觀，但到今日中小學生長大了的時候，也許不至於「喫人」了，那麼這種凶險的印象給他們做什麼！他說，他一聽到「吶喊」在那兒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吶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它絕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這類小說的必要。我說「狂人日記」末了明明寫着「救救孩子」。那麼至少要有孩子的人纔有讀「狂人日記」的資格，孩子自身何必讀它！』

這是魯迅先生自己對於『狂人日記』及其讀者的一些早年的值得珍視的意見，態度很客觀，決不包含他的自謙或自尊的成分在內。

二

『狂人日記』創作於一九一八年四月（最初發表於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五月號，小序下有『七年四月二日識』字樣），正是十月革命以後五個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大示威運動爆發。後人對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後發動的這一次思想，學術，文藝，政治上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給以一個總名曰『五四運動』。

『狂人日記』是五四運動思潮中的一股主流，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一篇代用的或非正式的宣言，更可以說是五四運動中新文藝部分的一篇奠基的或示範的作品。

若干年來，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的集會中，常常有人朗誦『狂人日記』。我以爲這是最合適的。『狂人日記』與五四運動永遠分不開，『狂人日記』與中國新文藝也永遠分不開。中國新文藝一旦有了萬紫千紅的花朵，永遠不應該忘記這一枝衝破冰天雪地報道春來消息的臘梅。

三

『狂人日記』的形式是比較特殊的：是日記體，也是格言體；是譬喻的，是象徵的，却也是寫實的。

我上面說『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一篇代用的或非正式的宣言』。爲什麼是『代用的』或『非正式的』呢？這一大半在它的形式上。『五四運動』這個名稱本是後人所給，『五四運動的宣言』這句評語，也是我們後人對於『狂人日記』的估價，所以是『代用的或非正式的』，決不是運動開始的時候，便有此名稱與此宣言的。

『狂人日記』的小序上，用作者的口氣（不是狂人的口氣）有幾句話評論『狂人日記』的形式與內容：『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

作者既用『狂人』的口氣，寫了這十三章『日記』，又用作者自己的口氣，寫了這幾行小序。除了關於內容的『又多荒唐之言』，『以供醫家研究』等等，是作者故作玄虛，我們可以不必置信以外；關於形式的有『語頗錯雜無倫次』，『記中語誤，一字不易』，『間亦有略具聯絡者』等等。我們試問：第一、這些評語是不是準確？第二、如果準確，那麼爲了模擬『狂人』的口氣以外

，是不是尚有藝術上的必要？

我的答覆是：一，也準確也不準確。『間亦有略具聯絡者』可以不論。『記中語誤，一字不易』，現在檢查起來，似乎並無『語誤』情事，可以說不準確；至於『錯雜無倫次』，則全文既係日記體，格言體（或散文詩體），那麼思想起伏，播取高潮，『錯雜無倫次』本可容許，所以是部分準確的。二，模擬『狂人』口氣，自然是決定形式的一部分理由，還有大部分是藝術上的必要，因爲必如此纔有力量，纔給人深刻的印象。

日記十三章中，第十二章和第六章均僅二行，第一章和第九章四行，第十二章五行；其餘八章，所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每篇數百字或千餘字，實在是極具邏輯兼富美感的散文，既無『語誤』，亦非『錯雜無倫次』。

這是『狂人日記』形式的大概。

四

『狂人日記』內容十三章，無論作者怎樣在小序中說它『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跡不一，知非一時所書』。而事實上依我們看來，它的結構非常謹嚴，一章一章的迫緊，集中攻擊一個問題：『吃人』！

他拿『吃人』一個觀念，來作四千年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中國舊文化的象徵。這個舊文化的渣滓，應該讓辛亥革命（知識分子發動的排滿運動結合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斬盡殺絕的了。不幸辛亥革命幾乎沒有動搖了它的分毫。應該動搖的，應該斬盡殺絕的東西，不但沒有斬盡殺絕，而竟沒有動搖分毫，於是它的勢力格外猖獗，格外蔓延，格外迴光返照，人們格外感到它的重壓，這便是作者苦悶的由來。

我試把全文十三章各提出幾個要點，以見它全文的結構，並不是『錯雜無倫次』。

第一章：引言，恐怖的空氣，環境的布置。

第二章：寫『吃人』這觀念安放伏線，並說明吃人者的一夥全有連繫，其中有封建統治階級，也有未覺醒的被統治階級，甚至大人以外還有小孩，人以外還有狗。這一章又把主人公的所謂罪行說明白了：『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反對舊禮教，舊傳統。）這便是革命的主人公所以被目爲狂人，甚至不免被吃的理由。

第三章：正式提出本篇的中心觀念『喫人』。『喫人』是革命者被反動的全夥所施一切重壓的具象化。這一章裡，還分析反動的類型，並舉出他們『喫人』的諸種證據。

第四章：寫壓制革命起見，不顧血統上的親疏，正如革命者爲革命起見也不顧血統上的親疏一樣。『狂人日記』是思想革命的呼聲，反動者在一個思想營壘裡面，革命者在另一個思想營壘裡面，關鍵在於思想。革命者因爲思想不同，就被反動者的營壘裡面的一切人，連自己的大哥在內，目爲『狂人』。

第五章：舉出『吃人』的具體例子，並說明『吃人』的思想根源：『易子而食』，『食肉寢皮』及本草上說『人肉可以煎食』等。

第六章：雖只短短的二行，但包含着分量極重的語句：『獅子似的凶心，兎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這是反動的狗們的心理解析。

第七章：分析反動者壓制革命的戰略，並宣告革命須從近處下手。『我咀咒吃人的人，先從他（大哥）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第八章：青年未必全是革命的。辛亥革命以後有一種青年是前朝的『遺少』，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少年。他們的思想完全在反動營壘裡面。這一章所指『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的便是這類人。

第九章：吃人是舊思想的堡壘，舊文化的結晶；在革命者看來，反動的一夥只要『去了這思想』，他們便『何等舒服』了，而事實上他們是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的，必須經過劇烈的鬥爭才行。

第十章：用宣傳教育的力量進行革命，這是思想革命的一項最重要的手段，也是最穩妥的手段。這一章中作者記載他用宣傳教育手段進行思想革命的經過。這一章是全篇字數最多的一章，文字很豐腴，結構很謹嚴，是全篇的最高峯。最後一句作者引薩拉圖斯脫拉格言的訓詞是：『你們立刻改了，從眞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第十一章：從最高峯下來，重言申明『吃人』的哲學根據，既入了這思想營壘，即有母子之愛，對革命者也不肯寬貸。

第十二章：再下來一峯，將近結束的階段，認爲同聲的人已無可救藥，四千年歷史的重壓竟有不能抗拒的痛苦了。

第十三章：這萬流入海的處所是氣勢奔騰的，雖然只有兩行十六個字，實在抵得了一萬六千行的長詩：『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整篇看來，『狂人日記』是一篇內容充實，結構謹嚴的作品。何曾有『語

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及『記中語誤，一字不易』的痕跡。

曹雪芹轉了若干個灣子，逃避紅樓夢的著作權；終於『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十個字被我們抓住了。『狂人日記』的作者竟然連『一把酸辛淚』之類的字眼都不肯用，一口咬定『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及『記中語誤，一字不易』的語氣，好像小序作者與日記作者完全是兩個人似的。如果不檢查一下日記中有無這些評語的痕跡，說不定我們眞會上當，以爲日記是狂人的作品。

五

關於『吃人』這個中心觀念還需要說明幾句：

我以爲『吃人』這個觀念，包含三個意義。第一個是本義，或者說是狹義。日記中所舉種種事例，種種証據，都是『吃人』的本義。本義的『吃人』是應該努力攻擊的。『易子而食』，『食肉寢皮』，『人肉可以煎食』，徐錫麟的心臟被吃，農村裡吃大惡人的心肝以壯膽，都是事實。食人民族在現存的人類中已經不多了，而我們那時不幸還保存着一點這種野蠻行爲的殘跡，民族的恥辱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如果把『狂人日記』當作一篇象徵性的或譬喻性的作品看，那麼『吃人』的解釋只是本義還嫌未足，我們不能不再提出它的第二個意義是『殘殺人』。二十四史是『相斫書』，前人已經說過這話。日記中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竪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照我想，歷史書的字縫裡看出字來，不會（或者很少會）是本義的『吃人』，而應該是（或者大抵是）第二義的殘殺人。不過作者的着眼點未必是『相斫』，而是強者對於弱者的殘殺，統治者對於革命者的殘殺。

第三個引申義是『奴役人』。把人當作奴役，雖然並不『吃』他，也不殘殺他，但一樣的不把他當作人看待。有三條大繩子牽着三種奴隸，這大繩子名爲『綱』。君是臣的綱，夫是妻的綱，父是子的綱。綱怎麼樣牽着，奴隸便怎麼樣忍受，怎麼樣動作，怎麼樣就死。這在歷史書的字縫裡，也到處可以看得出來。

『人』的發現，在世界上也是近代史開端（結束封建統治）的事，在中國應該說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事。『人』既然發現了，自然第一步是不該『吃』了，第二步是不該『殘殺』了，第三步是不該『奴役』了。狂人日記把第一步的『吃人』抓住，具體而概括，容易打動人也容易取得人的同情。其實『日記』中的『吃人』包括『吃人，殘殺人，奴役人』三個意義。這三種行爲，在『人』沒有發現以前，無論在那個民族裡，也是當作家常便飯的。統治者根據這種觀念，織成一套『禮教』；禮教中包括成文的典章、規程、制度、不成文的風俗、習慣、輿論，天羅地網似的，把大多數弱者壓迫得嚴嚴密密的；一發見有『人』的活動，立刻便把他『吃』了；吃的方法有用牙、用刑具、用苦工等。這就是禮教吃人的眞相。

在辛亥革命前後鼓吹『天賦人權』鼓吹『自由，平等，博愛』，也不是沒有這類文字。然而論文到底不具體，因而影響也不深厚。如果那時寫一篇文藝性的文字，具體舉出『殘殺人』和『奴役人』的事例，材料固然是俯拾卽是，反響却可從兩方面推測，也許讀者大衆以爲這是平常極了，沒有一看的價值；也許以爲作者是罪大惡極，衆怒之下把他『吃』了，——萬一不被吃，也許把他當作『狂人』而被枷鎖，這是極可能的。『日記』作者只反對『吃人』，還不敢明顯反對『殘殺人』和『奴役人』，尙且須轉那麼大的灣子，假冒狂人的筆墨，又用作者的口氣駡它是『荒唐之言』，『語誤』，『錯雜無倫次』，『供醫家研究』，而這作者還用的是個筆名，試想那時候空氣的反動冷峻到了什麼地步，作者情感的苦痛沉悶到了什麼地步！

六

現在我想回過頭去，討論一下第一段所說的，中小學生能不能讀『狂人日記』的問題。

『狂人日記』是一篇鼓吹『人權』的作品，用一個極端蹂躪人權的例子（吃人）來細膩的刻畫，尖銳的攻擊，使讀者感覺到強烈的憤怒，沉痛的恥辱，因而決心悔改，立志奮鬥，不讓社會間再有蹂躪人權的事件發生，而漸漸造成一個自由、平等的世界。這樣的一段過程，只有成人纔能了解，中小學生是不容易被引導到這個境界中去的。所以，我上面所引魯迅先生自己的話很有道理。中小學生的課外讀物現在不比從前缺乏，語體文的文藝作品可供選用爲中小學課本的也漸漸多起來了，能不選用『狂人日記』一類較難懂的作品時，自然以不選用爲最好。

退一步想，現在圖書館的管理並不怎樣嚴格，書店的櫃台任人自由閱讀，租閱小說的書舖所在多有，

（下轉第24頁）

關於「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編者按：本文是范文瀾先生在一個用「中國通史簡編」做學習材料的機關裡的講話紀錄。范文瀾先生囑本刊發表這個紀錄，以供閱讀「中國通史簡編」的讀者參考。

我對我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是不滿意的，早就想修改，但總是沒有機會。去年才開始改了一些，今天看來仍是不能滿意，還得從頭再來過，寫一本書要錯誤儘可能少些，實在不容易，更不必說寫得好了。希望同志們共同指出本書的毛病，作到像孔子所說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指出很多毛病來，對我幫助就大了，可以修改得較好些。

一九四〇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編寫一本十幾萬字的中國通史，爲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我當時就同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分工寫作，由我總編。由於缺乏集體寫作的經驗，對如何編法沒有一致的意見，稿子是齊了，有的太詳，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從頭寫，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四一年四、五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國以前），至年底完成下册。校完全書我就轉入整風運動中去不再接觸這個工作了。這本書原來限定寫十幾萬字，但上册寫完已有二十多萬字，事已如此，只好不限字數，繼續寫下去。所以這本書是逐步擴充起來的，事前也缺少整個的計劃和提綱（當時僅擬定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這就是編寫「中國通史簡編」的經過情況。

要寫一本比較好的中國通史，必須具備着若干必要的條件，而我呢？這些條件都是很缺乏的。

第一、我的馬列主義修養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觀性片面性非常嚴重，沒有力量來正確地掌握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而這又是寫歷史的第一個必要條件，缺乏這個條件，就容易發生錯誤。

第二、材料的掌握和歷史知識也很差。延安馬列學院的資料室參考材料不算多，那時要找「農政全書」、「天工開物」這類書都找不着，有關史學的雜誌新書，更是難以看到。同時我的歷史知識很貧乏，許多部門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數民族史、自然科學史、藝術史、哲學史等部門，我都是門外漢，因之，有的說不出來，有的說得膚淺不扼要。

第三，有充裕的時間，纔能仔細研究問題，考訂史料，而通史簡編的編寫，時間却嫌過於倉促。恩格斯說「即令是唯物的觀點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的發展，也是一種需要數年靜心研究的科學事業……只有多數經過批判的選擇與全部精細研究過的歷史史料，才能解決這樣一個課題」。按照恩格斯的標準來看通史簡編，眞可說是粗濫的作品。

由於上面三個原因，可以得出結論，這本書不可能寫好，序言上也已聲明這只是一本聊備刪削的草稿。這本書既然寫的不好，那末是不是可以丟掉？是的，不久就可以丟掉。因爲中國已經解放，史學工作者在共同目標下，大家都在努力研究，不久就會寫出較好的通史來，代替這個寫得不好的通史簡編。不過在目前這一種新型類的書還只好允許它暫時存在，雖然對它很不滿意。原因是中國古代史書非常豐富，也有很多不朽的名著，但都屬於舊型類，主要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在眞正科學的歷史書出現以前，只要是嘗試着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方法寫的歷史，總比舊型類的任何歷史書要好些。這就是說，運用馬列主義不成熟比運用封建主義很成熟的歷史書，從人民的需要看來，顯然前者比後者合用，即令不是眞正合用。有些學者譏笑新型類的歷史書，說：「考訂太不講究，寫歷史鬧出好多笑話！」照我的看法，儘管笑話很多，急須改正，但既然糾正了舊型類的歷史書的某些根本缺點，這就是值得贊揚的。「中國通史簡編」也和其他新型類的歷史書一樣，毛病很多，遠遠不够科學的水準，可是它比起舊的以封建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觀點來寫的歷史書，却是本質上不同

雜，許多寫法在舊型類的歷史裡從來沒有過。

第一、書中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舊型類歷史以帝王將相作爲主人的觀點被否定了。

第二、按照一般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劃分中國歷史的段落，舊歷史寫堯舜禹湯文武所處的時代都是一個樣，完全是靜止的，有的「頌古非今」什麼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動，試用一般的社會發展原則到具體的中國歷史，這是和舊歷史完全不同的。

第三、中國是長期延續的封建社會，但三千年來決不是沒有發展，本書把封建社會分成三個時期（應該是四個時期，明以後自爲一期），說明它的發展過程（當然，說得很不够，而且也未必說得正確）。從西周起到秦統一定爲初期的封建社會。西周爲什麼是封建社會？今天不是專講這個題目，無須多說，這裡只說一點最簡單的理由：根據地下發掘，商朝社會裡階級極顯著的存在着，這是斷定商朝決非原始公社的有力証據。貴族死後要用大量財寶和大批人殉葬。一個國王死了，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此外，每年祭祀，還要殺若干人同牲畜一樣作祭品。一般貴族也起碼要有幾個人殉葬。至於周朝則截然不同，考古學者發掘了一百五六十個周墓，僅僅發現三個墓葬裡共有六個殉葬人。經書記載殉葬事，詩經秦風有一條，左傳有兩條(昭公十三年一條不計在內)，禮記有兩條，都是認爲「非禮」而予以反對。例如左傳記晉卿魏武子將死，囑咐他的兒子魏顆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顆不聽，說這是「亂命」。又如禮記記陳乾昔將死，要求兄弟和兒子尊重他的願望，給他造一口大棺材，讓兩個寵婢夾着他。兒子說，殉葬非禮，不能那樣做。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種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兒子也決不敢反對制度。孟子引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專講周禮，連俑都反對，足見周朝廢除了用人殉葬制度。商與周是前後接連的朝代，但殉葬就有這樣的變革，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爲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於此。　奴隸佔有制度與封建制度的區別，聯共黨史有如下的規定：「在奴隸佔有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是可以買賣的農奴」。根據上述原則，商朝殉葬和作祭品的人就是奴隸，商人信鬼，讓死了的國王貴人在天上有奴隸服役（不管是什麼種類的奴隸）。周朝廢除用人殉葬和用人作祭品，但並不廢除用車馬財寶殉葬，足見周朝不是因爲不信鬼而不用人殉葬，而是因爲農奴不能隨意屠殺，在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殘餘的奴隸，活着有較多利益可圖了。奴隸是能說話的工具，和牛馬一樣，要殺就殺，完全沒有生命的自主權，給奴隸主工作，吃主人的飯，多餘的勞動產物全歸主人所有。農奴有點小的分地和小的私有財產，要吃自己的飯，穿自己的衣，養自己的老婆、孩子。詩經周頌載芟篇說農夫帶着家裡人去耕公田（「有噞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良耜篇描寫農夫給封建領主耕地，互相開玩笑說：「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譯意爲：「你老婆快來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好米飯給你吃」。西周初年，天子慰勞農夫給陳米飯吃（「我取其陳，食我農夫」又「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這裡說的黍米飯，當然是農夫自備。載芟良耜兩詩，說明當時的農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飯，而且有頗高的勞動興趣。小雅大田篇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疏家都說這是周朝「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其實不是這樣；因爲農奴在公田上工作完了以後，才能回到私田來工作，所以希望先下公田上的雨，隨後下私田，以便得到時雨的好處。周頌臣工篇「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譯意爲：「命令我的農夫們準備你們的耕具還要多準備些割器」。顯而易見到公田服役的農夫，要自備生產工具。「資本論」勞動地租篇中說農奴制與奴隸制的基本區別點是「奴隸是用他人所有的生產條件」，農奴除給地主服役耕種外，自己還有一點土地和勞動工具（大田篇臣工篇正說明周初農夫有一點土地和勞動工具）。周頌中所表現的生產方式，應該是周初的主要生產方式，從周頌看來，當時在公田上勞動的人主要是農奴而不是奴隸。這不是說周朝沒有奴隸存在，相反，奴隸數量還是很大的，不過不是主要的生產者了。主張西周是奴隸社會的歷史學者，其基本論據建立在『重要生產工具，以農業而言便是土地』這個原則上面，依據聯共黨史所昭示，土地與生產工具同列於生產資料之內，土地不能當生產工具。所以用土地並非私有來判斷生產工具私有的不存在，　因而得出西周仍是奴隸社會的結論，似乎是值得考慮的。至於生產工具製作的變化，在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上，不一定是決定性的。請注意：我不是否認生產工具的作用，止是說，同樣的生產工具，在奴隸手中會遭受故意破壞，在「具有某些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的農奴手中，就會提高生產效力，實際上發生了生產工具的重大作用。列寧「論國家」中說「剝削形式的變換，把奴隸制度的國家轉化爲封建制度的國家。這是

有極大重要性的」。證以希臘羅馬奴隸社會，曾大量使用鐵製生產工具；到羅馬帝國崩潰，封建制度開始，農具却十分簡陋，主要的生產工具是木犂、木耙等，過了二百年，才使用帶鐵鏵的犂和帶鐵齒的耙。足見過分拘泥於銅器和鐵器，忽視其他許多重要材料，古代歷史問題就難得通盤解釋。以上所舉西周材料，都是從從來無人懷疑的詩經裡取來的，除非有充足證據證明那些材料出後人僞造，否則就應該承認西周初年已開始了封建社會。我覺得這是中國歷史的極大光榮事件，遠在紀元前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已進化到封建社會，爲什麼不引以自豪呢？當然，我們反對虛妄的「自豪」。但證據既確實存在，棄而不用，就未免可惜了。

西周開始時據說有大小國家千餘，東周一百數十國兼併爲十餘大國，至戰國只剩七個大國。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從原始的小國割據分裂局面，走向統一，自西周至秦共八百餘年，才完成統一。

自秦至南北朝，爲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二階段。秦統一中國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大躍進。漢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至三國時期，長江上游和中、下游建立起國家，開發經濟，提高文化；後來長江流域的南朝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文化超過北朝，經濟趕上黃河流域，至隋統一，黃河流域加上長江流域，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大地擴大並加强了，文化也跟着大進一步。

隋唐至鴉片戰爭爲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三階段。由於經濟基礎的擴大，文化也顯著的超過前一階段。宋朝開發了閩江流域（五代十國時王審知從河南帶了很多人和生產工具去）。至元、明，珠江流域也開發起來了。自隋唐迄鴉片戰爭，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黃河流域加長江流域，再加上閩江、珠江流域。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正常朝代，一般約三百年，比前一階段的正常朝代要多一百年（東西漢各二百年），這也可以說明唐以後經濟基礎確是擴大並加强了。

農民戰爭勝利的結果，出現了漢、唐、明三個大帝國，也就清楚的劃分了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反之，農民戰爭失敗的結果，軍閥混戰割據，外族乘虛侵入，出現分裂或淪陷的局面。勞動人民的命運就是整個歷史的命運，不看清這一件大事，等於忘記了勞動人民是歷史主人的原則。

第四，「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說：「一切至今存在過的社會底歷史是階級鬥爭底歷史」（就是用文字傳下來的全部歷史）。「中國通史簡編」寫階級鬥爭，着重叙述腐化殘暴的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舊型類歷史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罵農民起義是「流寇」「土匪」，描寫成爲野蠻人，把所謂「官軍」的眞正野蠻行爲，大都挂到起義軍賬上。要矯正這種謬見，必須肯定農民起義的作用，同時也要指出農民階級本身缺乏組織性和覺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度的推動作用。至於異民族侵入，我也着重寫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羣衆的英勇抵抗。寫農民起義和反抗異民族侵略，本意在說明中國人民確有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偉大傳統，但沒有寫好也是事實。

第五、書中注意收集生產鬥爭的材料，古代的科學發明以及有關農業手工業的知識還是寫的不少。例如鍊鋼、造紙、印刷、火砲的逐步發展；茶葉、旱稻、棉花的大量種植。又如南宋江西浙江有人使用投鐵片入膽水，提鍊出銅的方法。漢末曹操在冰井台藏石炭數十萬斤。漢時高奴縣（延安縣東）發見石油，北宋用來點燈。唐時航海有大船，宋時航海用指南針定方向。諸如此類，自信在主觀上是十分重視的（當然還有不少被遺漏），不過因爲知識缺乏，沒有能多所解釋。

同志們聽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不要誤會以爲我在這裡自我吹噓。像我這樣一個初學馬列主義的人，如果一下子能够寫出科學性頗高的中國史來那眞是怪事。這好像一個小孩子初學走路，東倒西歪，連跌帶爬，不成模樣。我們不能要求他一學就會，我們只能要求他不怕鬧笑話，加倍努力去學習。

通史簡編有很多缺點和錯誤，我要寫一篇「自我檢討」，希望發表出來，以便讓大家知道這並不是中國通史的「定本」，同時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評，幫助我改正。我在檢討中所得到的對本書缺點的初步認識，可以歸納爲以下兩個方面：

一 非歷史主義的觀點。

在中國歷史上佔據最長時期的封建時代，一方面是包含着許多甚至對於今天的民族生活還起着負作用的沉重遺產；另一方面，也不能認爲這段歷史時期對於中國民族生活的發展毫無積極作用，毛主席在新階段論裡指出：「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新民主主義論」裡也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正是無產階級對待歷史遺產的正確態度。對於整個封建時代的歷史應該採取這種馬列主義的歷史分析的態度，對於個別的歷史人物，個別的歷史事件也同樣應該採取這種歷史的分析態度。如果無分析的一律抹煞或一律頌揚，都是主觀主義的

，非歷史主義觀點的表現。在這本書中的有些地方的敘述就有這種非歷史主義的缺點。例如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帝王將相，就他們整個階級地位來說，沒有問題是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但是他們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確實也起了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認或縮小他們對歷史的貢獻，那是不對的。例如秦始皇嬴政，結束了從西周到秦朝八百多年割據分裂的局面，偉大的中國第一次統一起來。他廢侯王，置郡縣，興水利，通河道，築長城，統一文字，劃一度量衡，拆毀國內長城，開發嶺南，驅逐匈奴，建立規模弘大，空前未有的大帝國。漢朝制度基本上承襲秦制，漢後歷代制度又自漢制逐次演變而成，秦在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所起的創始作用，有極大的重要性，沒有足够的敘述是不對的。漢武帝劉徹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至少從殷朝起就侵擾漢民族的匈奴族，到漢武帝時，才打了決定性的大戰爭，漢族勝利了。當時匈奴還是落後的奴隸制度國家，每年侵入邊郡，破壞生產，捕捉漢人去當奴隸，打敗匈奴完全合乎漢民族的利益。我對漢武帝的武功，沒有着重寫他勝利這一面，却着重寫了人民所受戰爭痛苦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皇帝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擊滅了侵略中國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廣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國。漢唐是歷史上兩個光輝的大朝代，唐朝的强盛又勝過漢朝，我沒有着重寫擊滅突厥的功業，却看作爲他父親李淵報仇雪恥的戰爭。宋太祖趙匡胤統一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很有功勞。明太祖朱元璋從元朝異族壓迫下恢復漢族政權，也很有功勞，我着重寫趙匡胤的官僚政治，朱元璋的專制殘暴，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都沒有當作重點顯著地寫出來。

這本書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說今」而損害了實事求是的歷史觀點。本來「借古說今」並不是絕對不可以，但如果簡單地借古人古事來類比今人今事，這就不是「一切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爲轉移」的歷史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態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談時事了。例如通史簡編裡敘述魏蜀吳三國的情形就有這個毛病。三國以前長江流域經濟文化都落後於黃河流域，孫權建立吳國，推行北方的耕作方法，開闢耕地，又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洋諸國，組織一萬人的大艦隊開展海上交通，長江流域經濟、文化比東漢前進了一步，這些功績是值得重視的。蜀漢在四川、雲南，對少數民族不採取殘暴鎭壓的政策，漢族與少數民族一般能和平相處，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三國分裂是軍閥混戰的結果，但三國國內設施，也各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借吳蜀聯合拒魏來類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借孫權來類比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統一戰線，把孫權描寫成幾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這是不合當時的歷史事實的。又如武則天利用特務鎭壓她的政敵，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爭奪。借武則天來斥責特務統治，着重寫了特務的殘暴，而且把宮庭私事也寫了出來，意在增加對特務統治者的鄙視。事實上武則天統治的時候，中國還保持强盛的形勢，對人民說來，她不算是屬於壞的一類皇帝。

以上就是由於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說今」所造成的非歷史觀點的錯誤。

二　在敘述方法上缺乏分析，頭緒紊亂。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底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這種具體的分析，首先要把生產關係劃分出來作爲說明該社會形態底結構和發展，同時還要到處和經常考察那些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物，以血和肉來把骨幹包裹起來。但事情還不止於此，馬克思說「同一的——就主要的經濟條件說是同一的——經濟基礎，仍可由無數種互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條件、種族條件、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來。不分析這種經驗上給予的事情，是不能理解這一點的。」馬列主義的分析法應用在歷史研究上，如此複雜而繁重，絲毫沒有其他輕而易舉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通史簡編却採用了一個便宜方法來代替它，那就是現象羅列法，把互相有機聯繫着的統一的整體，排列成許多各個孤立的現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物，前一時期與後一時期，這一事件與別一事件，同一事件在此時此地與在彼時彼地，說不出或說不清楚它們中間有什麼有機的內部聯繫，結果是頭緒紊亂，不相貫通，名爲歷史，實際上是一本史料彙編。對某些單獨的歷史事實，也因爲缺乏分析，往往不能作出恰當的判斷。例如岳飛是抵抗女眞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行動是代表民族利益的偉大行動。他曾代表地主階級攻滅洞庭湖旁農民首領楊么，這固然不是好事，但比起抗金來，顯然是較小的，沒有把事情的輕重說明白，在鑑定岳飛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上，引起了混亂的看法。又如隋煬帝楊廣開運河，給當時人民帶來了嚴重的死亡和痛苦，開成以後，北至涿郡，南達餘杭，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楊廣以前和以後，歷史上不少開運河的人，楊廣之所以特別著名，在於他使用民力太急暴，更主要的是他在河上作大規模的遊行，爲以前以後的人所未有。着重寫了楊廣殘害人民驕奢淫逸，却沒有說明開運河還有其積極的意義，顯得看問題不够全面。

除了以上所說兩方面的問題，其他如使用材料也有錯誤或欠妥的地方，不

少史學工作者，曾經善意地給我指出，我在這裡表示感謝。此外沒有檢討到的問題當然還有，需要自己更深入的作檢討，找出全部錯誤來。

我這樣想：按照中國目前史學研究的已有成績，要總結四五千年的全部歷史，寫出一本比較完好的古代通史來，無疑是困難的，但決不能因此而減損工作的勇氣與信心，因為中國史學確實具備了幾個決定性的成功條件，相信若干年後，比較完好的中國古代通史一定會出現。第一，毛主席已經指出史學工作者應走的正確道路。第二，中國人民翻了身，反動統治階級基本上消滅了，革命的實踐中已經給「一部廿四史」做了總結，這對於史學工作者，創造了來全面地總結歷史的有利條件。第三，全國史學工作者組織起來，分工合作，或研究斷代，或研究專史，或研究少數民族，或研究某一專題，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益完好。第四，全國史學工作者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批評、自我批評，逐步改進自己的工作。這四個成功條件以外，還有一個條件，就是中國人民對史學工作者的期望和鼓勵。

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千辛萬苦，流血流汗，創造了自己的祖國，創造了自己的歷史，既然是自己創造的，產生熱愛祖國，熱愛歷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今天人民革命勝利了，勞動人民眞正當了自己祖國的家，對自己祖先創造歷史的勤勞和偉大，特別感到親切與尊敬，要求知道創造的全部過程，爲的承繼歷史遺產，從那裡吸收珍貴的經驗，作更偉大更美好的新創造。歷史上，中國勞動人民對自然界作鬥爭的生產鬥爭歷史，對統治階級及侵略民族作鬥爭的階級的民族的鬥爭歷史，都有非常光輝的成就。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以各個不同的程度，參加這種鬥爭，全部或部分的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政治經濟上，在武力衞國上，在文化思想上作出許多大小事業，給歷史以巨大的貢獻，這與勞動人民的成就，同樣值得人民的永遠紀念與學習。把上述豐富的史實綜合起來，就會基本上構成古代歷史的光明面。當然，正因爲中國人民充滿着民族自尊心，所以特別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隸生活與落後狀態，對那些玷汚民族名譽，出賣人民祖國，壓迫勞苦人民，破壞經濟文化，阻礙社會發展，毒害人民思想的暴君民賊及其所代表的反動地主階級，表現無限仇恨，把他們的罪惡寫在歷史上，好讓人民知道歷史不是走的一帆風順的勝利道路，歷史走的是崎嶇曲折，艱難困苦的道路。

古代留下來大量歷史書籍，一般是地主階級文士爲擁護地主階級利益而寫的，中國人民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歷史，而現在還沒有，這就是爲什麼期望和鼓勵人民史學工作者努力研究的緣故。我希望和全國史學工作者在一起，依靠四個決定性的勝利條件，樹立起爲人民服務的最大決心，同心協力，爲寫出一本比較完好的中國通史而奮鬥。

（並野、德遠整理，克敏、王綜校對）

（上接第19頁）家庭間成人的書櫃和兒童的書櫃沒有多大的分隔萬一中小學生自己看見了，那該怎樣辦呢？小學生未必看懂也就罷了，中學生看個半懂，不免要來問家長或教師。我想對家長或教師建議：與其事後斥責或禁止，不如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使他明白寫作的當時社會是怎樣，作者的心情又是怎樣，不妨細細的對他說明，不要有一點保留。魯迅先生自己說那時的孩子長大了的時候，中國一定已經進步，不會再有『吃人』的事發生，那麼這種凶險的印象給他們幹什麼！一點不錯！現在中國社會已經大大的提高了一步，這種『凶險的印象』可以不必再給小孩子們，使他們的小腦子染上這一點汚濁了。

『狂人日記』漸漸成爲古典作品了！我們爲什麼反對學生讀經，就因爲『經』中所記載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當時當地的大人的問題，不是中小學生所應該所能够知道的。『狂人日記』也是如此。

何況五四運動本身是失敗了。『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這個原因。』（毛主席論五四運動。）但另一方面『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新民主主義論』）。我們瞭解了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也就瞭解了『狂人日記』在中國文藝史上，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了。

（注）本篇原是『吶喊談叢』中的一篇，開始寫作於抗日戰爭期間，至今沒有寫成，爲紀念五四先抽出來發表，請讀者多加指正。

捷克作家協會擁護和平理事會建議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在其最近宣言中，號召各國的文化工作者以一切方法支持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決議。

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們也堅決地擁護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建議：召開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的國際會議，來討論關於發展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的問題。

偉大歷史工程底偉大哲理

何思敬

一

毛主席底「實踐論」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哲理，是毛澤東思想底基本構成部分。

中國人民已經推翻了蔣美匪帮的殖民地統治，粉碎了它們底國家機器，勝利地實現了驚天動地的人民大革命，人民大翻身，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創設了人民民主專政以後，現在正在恢復創傷，恢復疲勞與元氣，並準備迎接不久將來更有計劃地創造自己的生活和歷史。在這時期中，尤其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底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偉大運動中，「實踐論」底公布就更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在「實踐論」中，毛主席說：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的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經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地球上已經有一部份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與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現在我們的民族有計劃地創造新文明新歷史的偉大工程已經開始了，我們將穩步前進，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而進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們要創造自己的文明與幸福，要促進世界的和平與自由，要戰勝一切困難，我們必須懂得實踐的眞理性與科學性。毛主席就在我們的民族面前展開了實踐的眞理，我們的民族可以從「實踐論」中看到自己的實踐底眞理，並因此而能更好地發揮偉大的實踐的力量。

毛主席底「實踐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底鮮明總結，它集中地顯示了人類創造歷史的動力與規律，具有極偉大的積極的力量，它是我們的民族辛勤實踐勝利成功底指南針，它將使中國人民確實獲得辛勤實踐的勝利果實，將幫助中國人民勝利地創造歷史前程，它是偉大歷史工程勝利的原理。

毛主席底「實踐論」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沒有民族界限，任何民族都可以利用，但它對我們將近五萬萬刻苦耐勞，勇敢而勤勞的人民是莫大的貢獻。

二

毛主席「實踐論」底根本思想就是實踐的觀點。

有沒有客觀眞理和如何認識眞理的問題，是哲學的大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以前和產生以後，有着種種無根的忽視實踐的眞理論與認識論，非無產階級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的、機械主義的以及一切庸俗的眞理論、認識論。

馬列主義決不忽視認識或理論以至哲學底的重要性。馬列主義反對離開理論的「盲目的實踐」，沒有革命理論的革命運動。而主張實踐的理論與理論的實踐結合。毛主席底「實踐論」就是用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底觀點來展開了理論與實踐底以實踐爲基礎地辯証的關係。其任務就是爲了首先使我們的民族、使我們的黨和幹部在實踐中少犯錯誤，少走寃枉路少遭失敗，多得到勝利。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有些人爲什麼忽「左」忽右犯錯誤，招致失敗或者沒有把握做陌生的工作呢？因爲他們的思想不合於客觀外界底規律性，或者因爲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工作，所以無從談到這類工作底規律性。按他的話來想，我們的同志在實踐中無論做小事或大事，必須認識客觀外界底規律性，事物或工作底規律性。如果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世界、客觀事物底規律性，就會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可見，工作底成敗，不是一個偶然 、而是一個是否符合歷史發展底客觀規律性的問題。

什麼是客觀世界底規律性？這必須另行論述。現在暫且放開這個問題，僅指出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處理理論與實踐底關係問題時正確地把這個問題本身提到了客觀規律性底高度。

理論或認識和實踐比較起來，那一個是基本的東西呢？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論証並答復了這個問題。毛主席在「實踐論」中站在爲無產階級服務的馬列主義哲學底立場上，旗幟鮮明地强調了實踐底觀點。他嚴正地指出實踐底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底第一的基本的觀點。他說，離開了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他又說：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

不是眞理是實踐底標準，而是相反，實踐是眞理底標準，眞理底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底標準，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底結果如何而定」。總之，認識依賴於社會實踐。社會實踐包括社會實際生活底一切領域——生產勞動、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與藝術的活動。理論和眞理底基礎，是變革現實的社會實踐。

三

但是，毛主席告訴我們說：「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物質的生產活動。這是人的認識底基本來源」。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也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而發展。

此外，在他的「實踐論」中，毛主席「强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

毛主席底這些論証，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底偉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因爲强調了社會的實綫是眞理的標準，「實踐論」糾正了過去理論與實踐底關系底顚倒，並幫助人們解脫種種迷妄與荒謬，引導人們底思想意識與理論深刻地返回到自己的基礎上去，正確認識自己的眞理性底基礎、源泉是實踐、是社會的實踐。另一方面，「實踐論」也解除了實踐本身所陷入的迷妄。人的實踐期望自己的成功曾追求眞理，甚而陷入迷妄喪失了自信，現在發見社會的實踐自己本身就是眞理底標準。這一偉大的眞理，使社會的實踐恢復了自信，增加了勇氣。

爲什麼社會的實踐是眞理底標準？首先因爲「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這是人的認識底基本來源」。這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最基本的實踐活動」。

過去的世界，是一個顚倒的世界。剝削階級站在勞動人民頭上，從剝削者底利害出發，決不會承認最基本的社會實踐、社會的生產勞動是眞理底標準。社會分工——物質的和精神的勞動底劃分，產生了恩格斯所說的「觀念的諸果實」，蒙蔽、迷惑了許多脫離勞動專門用腦子的人們底思想、理論以及哲學。馬克思、恩格斯告訴我們說：「當物質的和精神的勞動底劃分出現後，從這瞬間起，勞動底劃分（分工），才眞正成爲劃分，從這瞬間起，意識就能眞正自己以爲可以成爲某一個東西，不同於現存的實踐底意識，可以現實地想像某個東西而不想像什麼現實的東西，——從這瞬間起，意識就有可能把自己從（現實的）世界中解脫出來，轉移到『純粹的』理論、神學、神學、哲學道德底創作上去。」（「馬恩全集」第一編第五卷第二十一頁。）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科學地揭開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人們在一切事體之先，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够推行政治、科學、藝術、宗敎等等」。而這一個簡單的事實，至今被「觀念的諸果實」所掩蔽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至今一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們，忘了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忘了本，就成了無根之草。

只有馬克思主義認識了生產的實踐，勞動是「永遠的自然必然性」。爲了滿足吃、喝、住、穿等物質的需要，人類必須進行生產的實踐——勞動。這種勞動，「作爲使用價値底形成者，作爲有用的勞動，是人類底一個生存條件，不依靠一切社會底諸形態，是永遠的自然必然性，爲了媒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流，爲了媒介人類的生活。」（「資本論」，四七頁）。

只有馬克思主義認識到生產的實踐，勞動是「人類第一個歷史的行動，是一切歷史底一個根本條件。若要維持人類的生存，就不問過去、現在、將來，每天每時都要進行這一個歷史的行動，這是人類第一個歷史的行動，也是一切歷史底一個根本條件，每天每時必須滿足這個條件。」（「德意志意識形態」一〇頁與一七頁）。

只有馬克思主義認識到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實踐、生產的勞動能够打開宇宙底秘密，並掌握統治這些自然力量。「勞動首先是人類和自然之間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通過自己的行動來媒介、規整和控制他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流。它自己作爲一個自然勢力去對待自然物材。他把屬於他本身的諸自然力量弄成運動……他通過這個運動作用到他外部的自然上去，並改變它，同時改變他自己的自然（本性）。他展開那睡在自然裡面的諸潛在力，並把自然底諸

力量，投放在他自己的統治之下。」（「資本論」一八五頁）。

顯然，偉大的生產實踐是眞理底標準，它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決定其他一切活動」。但社會實踐底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因此，可以說，以生產實踐爲基本，爲決定者的全部社會實踐，是眞理底標準。

四

要了解社會的實踐，必須進一步了解社會的實踐底主體，廣大羣衆底力量以及我們和羣衆底關係。毛主席曾說：「必須明白：羣衆是眞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農村調査序言）。這句話底意義是非常深刻的。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勸我們「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論聯合政府」）。他在另一處說：「我們共產黨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底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底大世面。……「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組織起來）。

這種羣衆觀點，使毛主席在「論合作社」與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中，作出了一個簡明的公式：「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想問題要從羣衆出發，而又以羣衆爲依歸」（「論合作社」）。「這就是說，將羣衆底意見集中起來，又向羣衆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底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一英明的方式，不得不使我們想到一切認識或理論必須「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求服務，求檢驗自己是否正確，是否合乎客觀世界、客觀事物底規律性，求改正自己的錯誤，求發展自己的眞理。然而，「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結局也就是「從羣衆的實踐中來，到羣衆的實踐中去」，這是因爲羣衆是社會實踐底主體、主角。因此，社會的實踐，就是羣衆的或羣衆性的實踐。羣衆既與實踐有着這樣深的血肉關係，可見，在馬列主義的實踐論中，羣衆是一個基本的要素，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同時也可以看出：既然社會的實踐是眞理底標準，那麽，羣衆的實踐也不能不是眞理底標準。這決不是降低眞理底標準，反而是把羣衆——革命羣衆提到眞理標準底高度。我們應當承認在羣衆中有眞理，應當到羣衆中去認眞地發見眞理。記得列寧曾說過：凡是有千千萬萬羣衆起來的地方，一定有偉大的政治。同時，凡是有千千萬萬羣衆起來的地方，一定有眞理，一定是眞理底所在。斯大林曾說：「在這裡，眞理和正義是在中國方面」。這不外是指中國革命羣衆底偉大力量與偉大理由。毛主席說羣衆有無窮無盡的偉大的創造力，難道這樣的創造力對眞理不起一定的作用，當作標準的作用嗎？

生產的、實踐的、革命的羣衆，是偉大的社會實踐底主體，是偉大的無窮無盡的創造力，並且他們現在已經依照新的秩序組織起來了，這一偉大的無窮無盡的創造力在物質世界中發揮它的威力——進行物質的生產活動即「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之外，還進行多種其他形式的社會實踐，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這以生產實踐爲基本、爲決定者的全部社會實踐是眞理底標準。這其實就是客觀規律之一。毛主席底「實踐論」就分析了、展開了這一個客觀規律。

五

現在我們來看毛主席是怎樣分析認識過程的吧：

毛主席分析認識過程，不像非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們一樣把認識過程和社會實踐和歷史發展分割開來孤立起來研究，也不把認識過程底兩個階段一刀斬成兩段，然後把後一階段、理性認識階段孤立起來，作爲認識過程來研究。他不是在單單分析認識過程而是在分析一個客觀的規律。他開頭第一句話，就批評「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實踐，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毛主席在分析認識過程時，站在無產階級變革世界的立場，他不僅使用了馬列主義的反映論，而且使用了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宇宙觀與發展論，因此，他把認識過程不僅放到它和具體實踐底關係中，而且放到歷史發展底規律階段和轉移中，最後還把認識過程放到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底關係和規律中去研究。因之，他發見了理論（認識）與實踐底關係在歷史發展中的規律，

並且得到了一個結論：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底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爲了變革世界的實踐，他不承認那種離開實踐的空洞的「認識」，他只關心那從實踐中發生並服務於實踐的認識，卽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認識；而這種實踐，總得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中進行並且變革其中某一個客觀過程。

他分析了認識過程底兩個階段底每一個，就每一個過程得出了一個結論，並且就整個認識過程，也得出了一個結論。關於第一個階段，他的結論就是：「認識從實踐始」——「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底唯物論。關於第二個階段，他的結論就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底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底辯證法。關於整個認識過程，他的結論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這也就是「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

然而，這樣一個分析和綜合，還僅僅只作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認識運動底前一部分底研究，這一部分如果爲分析清楚起見，暫時離開實踐來分析，那末，這部分確是一個整個過程，並且有兩個階段，但如果和實踐聯系起來看，那末，這前一部分只是從實踐中來的一部分，還有到實踐中去的後一部分要加以研究。

在分析前一部分底兩個階段時，毛主席指出了兩個階段底質的差別，後一階段是一個「飛躍」，「推進了一大步」，因之「更重要」，同時他也指出了這兩個階段底統一，它們統一在實踐底基礎上，因爲它們發生在社會的實踐過程中。這就使我們看出了認識過程底規律性，它是離不開實踐的。

首先，認識離不開實踐，它只能發生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它只能從實踐開始，它只能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底唯物論。毛主席發揮了認識論底唯物論。毛主席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要認識事物」，就得「同那個事物接觸卽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底環境中」。「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去才能接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底現象」，「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底本質而理解它們」。這些話，首先要人們取得經驗，而一個人底知識，不外是「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兩部分」。無論何種知識，都「不能離開直接經驗」，「一切眞知都」「從直接經驗發源。」前面已經講過，毛主席曾勸我們「經風雨，見世面」，經羣衆鬥爭底大風雨，經羣衆鬥爭底大世面，這就是要我們到革命的羣衆的實踐鬥爭中去「直接經驗」一番革命鬥爭，取得革命鬥爭底直接經驗，而這種經驗越豐富，他就越有可能做一個革命理論家。可見，認識論底唯物論，有巨大的實踐和理論的意義，這意義就是毛主席所引用的一句古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然而，認識底感性階段够不够呢？當然不够。毛主席說得好，他說：「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於是，他指出：「認識底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惟，到達於逐步了解事物底內部矛盾，其規律性，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底內部聯系，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這就是「感性認識（感覺印象）反覆了多次，生起了突變，產生了概念，抓住了事物底本質，全體以至內部聯系，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與推理底工夫，並使用判斷與推理底方法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這就是「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以「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這就是認識底突變、飛躍、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認識論底辯證法。

綜合起來看，「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一「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始終是「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過程的理論」。

認識經過了能動的飛躍達到理性認識，好像可以脫離實踐了，好像可以爲自己的目的而活動了，好像可以爲認識而認識，如同爲藝術而藝術一樣了，然而，這種由能動的飛躍而來的假象，只能使一切認識墮落到爲統治的剝削者們服役並自絕人倫、自趨滅亡而已。這是認識底生死問題。這也是一個危機，使認識再落到唯心論去的危機。要從這一危機中超脫出來，那只有再來一次飛躍，生死底飛躍，卽再到實踐中去經過考驗。因之，認識必須非常虛心，卽使經過飛躍到達了理性認識階段也不能自滿，不要忘本，忘記了自己在飛躍之前乃從實踐中來，也不要忘記了自己在飛躍之後還要經過一次飛躍，再回到實踐中去服務、去指導行動、去改造世界、去經得住考驗或檢驗。這是馬列主義者底虛心態度，也就是眞正採取辯證唯物論的態度。

理性認識經過腦子的勞動，「造成了概念及理論的系統」，但不能自滿，必須虛心地再回到實踐中去檢驗一下自己「是否符合於客觀眞理性」、客觀

過程底法則性、世界底規律性，是否能指導行動、改造世界，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得到勝利？這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底繼續。這時候理性認識必須充分估計到毛主席所指出的兩種可能：一、能夠實現——但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是很少的——或大體上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同一個實踐過程中變爲事實；二、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即「在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必須部分地或全部地改變或糾正——有時經過許多次反覆失敗，才改正自己的或別人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使之符合於客觀過程底規律性，使之由主觀的東西變爲客觀的東西，變爲事實，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得到工作底勝利。不經過這種檢驗，無法發見一個理論之是否正確，也無法改正或發展理論。

爲什麼從實踐中來的理性認識再回到實踐中去，有可能會「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發現自己「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或錯誤呢？這是因爲從實踐中來的理性認識，始終受歷史發展底條件所限制，受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底限制，受客觀過程底發展及其表現程度底限制（有限性）。另一方面，因爲客觀過程本身有內在的矛盾與鬥爭，所以它必然要向前推移，向前發展，因而發生「思想落後於實際」，趕不上實際變化，「停留在舊階段上；」——但另外有一種思想急性病急忙地往前趕，走得太快了，飛躍得太快了，趕過頭了，超過了客觀過程底一定發展階段，「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底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這樣，人們「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或者「反覆失敗過多次」「就從失敗中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爲勝利」。

可見，認識以及理性認識必須十二分虛心，必須甘心當小學生，從實踐底直接經驗中取得充分的感性材料，加以認眞的整理，作出概念和理論的系統來，再虛心地回到實踐中去檢驗自己是否正確或錯誤，這樣一種認識，將帮助社會實踐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中變革某一個客觀過程而產生成果。中國人民爲了創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明與幸福，爲了創造歷史，需要這種虛心的辯證唯物論的理性認識。這種理性認識之有無，決定一個民族底勞動人民之是否能創造自己的幸福與文明。毛主席底「實踐論」就帮助我們學會理解並掌握這樣一種理性認識來爲社會的實踐服務，爲變革世界、創造文明服務。

六

至今毛主席所分析的，只是一個在某一客觀過程中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認識運動。但他並不使人的認識運動作爲「完成了」的東西停留在一個客觀過程中。他說：「馬克思列寧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他首先指出：客觀過程本身有內部的矛盾與鬥爭，所以必然向前推移與發展，因之，「人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繼而他說：「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一鮮明的論證，就把我們的認識運動帶到物質世界與社會實踐底無窮的發展中去了，同時也就把我們的認識運動帶到相對眞理和絕對眞理底關係中去了。他說：「馬克思主義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眞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眞理性。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眞理」。可見毛主席底辯證唯物論和相對論絕對沒有相同之處，就看他說「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永遠沒有完結」，就可以知道他和列寧完全一致，承認「我們的認識」無條件地「逐漸接近於」「客觀的絕對的眞理。」並且他所說「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就是上述列寧底思想底更加發展。這道路就是：「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個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道路也就是：「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就是他所謂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主席底這段敘述，給我們展開了多麼遠大而豐富的歷史前程啊！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也就是不斷地打開宇宙秘密的道路，也就是創造文明創造歷史的道路——這一道路就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前進，將

積累無數相對的眞理，將形成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即絕對的眞理底長河，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長河。

哲學家曾描寫過絕對眞理底形像，如黑格爾。列寧曾在黑格爾哲學史講義序論中看到黑格爾把「哲學史和圓」比較，看到他說「這個圓以一大羣圓做圓周」時，列寧就在這話傍邊寫了下面一段話：「非常深刻而正確的比較!!!思想底各個階段—人類的思想一般底（螺旋）發展底大圓上的一個圓」。（列寧「哲學筆記」，日譯本，第二冊一七一頁）。

然而，毛主席所謂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道路，更無限地接近於絕對的眞理。

自從毛主席這樣英明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以後，在中國那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以外，在社會的實踐以外冥想那種玄幻的絕對眞理的哲學也將無事可做了。絕對眞理不是哲學家們底個人作品。絕對眞理是全人類在前進發展中的集體作品。中國人民可以從那種幻想的絕對眞理中解放出來，而「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以「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變革客觀現實」並「一次又一次地向前」的實踐來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創造自己的文明與幸福，參加絕對眞理底集體創作，創造光明燦爛無限豐富的世界了。這是偉大的歷史工程，中國人民永生了，中國人民永生在這偉大的歷史工程中，永生在絕對眞理底集體創作中，永生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歷史發展中了。只要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進行不休的社會實踐，不斷地在實踐中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這就是中國人民永生底道路。只要依照我們毛主席的結論堅持「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那末，我們將獲得勝利以至永生。

堅持毛主席「實踐論」底結論，就是要使我們的主觀、理論、認識不至於「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而變成「落後於實際」的右或超階級的「左」。

七

毛主席底「實踐論」是極其偉大的哲理，它首先將使我們民族當前的社會實踐底一切領域都在新愛國主義底大旗下活躍起來，使物質的生產實踐、政治生活過程、軍事實踐、文教活動、科學藝術活動都活躍起來，使中國人民底新社會建設工程，新文明創造工程，新歷史開闢工程都活躍起來，得到工作底勝利，得到預想的結果，獲得內容極其豐富的文化與理論的成果——將實現毛主席底預見：「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它並且將使我們民族底社會實踐不斷地永遠地得到勝利。

學習、學習、再學習，把這一偉大哲理運用到一切科學（新法學在內）中去，使它成爲一切科學底指導原理。

宣傳、宣傳、再宣傳，把毛主席底「實踐論」和毛澤東思想結合起來，普及到全國人民大衆中去，使它成爲全民的公共財產。

（完）

（上接3頁）後來中國的思想與學術的發展，主要的有賴於「五四」運動所給的刺激。「五四」運動在當時的一定限度以內，革新了中國的文化，同時也就加强了中華民族的有生力量。

以上所舉「五四」運動的四個特點，每個特點都成爲中國人民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因爲「五四」結束了一個舊的時代，同時揭開了另一個新的時代。「五四」打倒了傳統的統治者的威權，而建立了人民的强大力量。「五四」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力量上做了一番較量，而預示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政治鬥爭。趙家樓的吶喊與打鬬，可以說是敲擊了中國古老制度的喪鐘，而開闢了一條新的社會進化的途徑。「五四」運動對於我們中國人民實在太重要了，太可寶貴了。假使它未曾出現，中國的解放與獨立，還不知要推後多少年。我們應該紀念「五四」，應該歌頌「五四」！

雖然如此，「五四」運動所完成的，還是不如它所提供與預兆的多。它的具體成績，是極有限的。繼續「五四」的傳統，發揚光大，完成解放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的還要等着兩年以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之下，這個黨以它的正確的政治綱領，堅强的組織，具有堅忍的戰鬥精神的忠誠黨員，並靈活地運用蘇聯的先進經驗，經過三十年間難以置信的堅苦奮鬥，才將中國解放，才使五萬萬的中國人民站了起來。所以，眞正完成「五四」運動所開端的大業的，是中國共產黨！

學習「實踐論」，克服經驗主義！

王思華

毛主席的「實踐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他運用了中國長期階級鬥爭經驗，充實了並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這篇論文，對於現在正從事於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革命工作者，極富於指導意義。我們爲了正確地掌握馬列主義的精神和實質，正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與方法來把我們的工作做好，就應該認眞地研究這篇極其重要的哲學論文。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用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觀點，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錯誤。目前我們所担任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工作，都是我們素所不熟習的工作，我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一般地說又很低，因此，我們在工作中便容易發生錯誤。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觀主義。要克服主觀主義，就要認眞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就應該首先認眞地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要提高我們理論水平，要用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科學規律知識，來指導我們的新的複雜而艱鉅的工作。

要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首先必須認眞地克服經驗主義。因爲自一九四二年全黨整風運動特別强調反教條主義以來，教條主義的危害性，是盡人皆知的事了，而經驗主義的危害性則還未予以足够的揭發。馬列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特點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經驗主義，正和教條主義一樣，它的基本特點，乃是分裂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經驗主義者，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局部的片面的經驗，滿足於自己的老一套，不願學習各方面的新知識和新經驗。他們把自己的狹隘經驗視爲萬靈丹，不管時間地點與條件如何，到處都來應用。他們在新的事物面前，表現無知，缺乏預見。更不會分析經驗，總結經驗。

現在全國基本上解放了，我們的當前任務是要集中力量來加快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這種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要求我們在思想上超脫狹隘片面經驗的束縛。偉大的國防與經濟建設，必須實行統一計劃，必須加强統計監督以避免盲目發展。可是計劃與統計，都是新的工作。它們的作用，還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我們有些同志還願做到那裡就算到那裡，因此認爲計劃是無足輕重的東西。更有些同志認爲編製經濟計劃是紙上談兵，不是準備認眞執行的。他們不知道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國民經濟計劃，應成爲積極發展和改造我國經濟的有力工具，實現黨的政策的一種有力手段。

經濟計劃可使我們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得到意志的統一和目標的一致。它應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擴大再產的整個過程，它應確定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它是一種偉大的組織力量。按照計劃去工作，這就是說，知道需要做什麼，知道爲了什麼目的而工作。

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要保證國民經濟逐年不斷地增長，同時也保證工業生產逐季逐月地不斷地增長着。工業生產逐月增長，是爲了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我們的經濟計劃，要貫澈發展的觀點，應向先進者看齊，不應向脆弱環節看齊，反對自流現象，反對保守觀點，反對老一套和墨守成規的做法。

對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來說，國民經濟的計劃化，乃是一種客觀的必然要求。新民主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所領導的，因此，應把國民經濟一切部門都聯結在統一的經濟體系中。這樣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如果沒有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去指導國民經濟向前發展，沒有統一的標準去進行生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那麼它的發展必然是盲目的、不平衡的。

國民經濟計劃工作，是一種很複雜的工作，並且是一種嶄新的工作。它不能依靠我們過去的經驗來解決，我們必須學習一套新的知識和方法。但是經驗主義者是不願學習，不善於隨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其認識，變化其工作方法的。他們不能按照毛主席所說的來辦事：「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卽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實踐論）

在這裡，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善於接受新鮮事物。可是新的統計工作也正如計劃工作一樣，却受着舊的思想殘餘的阻礙。統計工作是一種極複雜、極贑

泛的科學工作。他需要各個部門各個環節密切配合，因此，在統計工作初創的時候，難免有的環節作的不好，便將影響到整體，使統計數字不能及時和正確。這也就容易被人認爲「統計」還不如「估計」。其實「估計」是過去我們處在分割而動盪的環境下，爲了瞭解情況不得已而採用的辦法。我們現在處在全國基本上已解放並已進入大規模的國防與經濟建設的時期了。從事建設，就要有計劃，就要實行經濟核算，就要有經常的監督，這一切非依賴有科學的統計不可。因此，我們對統計工作，必須逐漸加强，逐漸改善，而不能習慣於「估計」，滿足於「差不多」。有時主觀上的「差不多」實是客觀上「差的多」的錯誤認識，例如，去年我們在進行東北區私營工業普查之前，我們根據各省市的估計數字，有三個勞動者以上的東北私營工業，約有十萬戶，但後來實際調查的結果，共爲三萬七千餘戶。客觀實際與主觀估計相差太多了。有時「估計」自認爲「差不多」，自認爲還能解決問題，就是因爲缺乏客觀的正確統計資料與之相對證的原故，那麼，只好任其「差不多」。你的估計與我的估計都得不到最後客觀的校正時，那麼彼此便很容易地滿足於主觀上「差不多」了。

調查研究是爲了了解情況掌握政策的，但是調查方法是應隨着環境的變化而應有所不同。可是經驗主義者則不顧客觀條件如何變化而仍然固執着老一套的辦法。典型調查固是過去分割環境中唯一可用的調查方法，但在今天全國基本上已解放後，爲了製訂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非有普查的資料，是不能了解其全貌的。一定時期的各種普查與臨時性或經常性的典型調查與專業調查，都是科學統計工作的調查方法，它們因爲調查對象與調查目的的不同，而各有其作用，各有其優點與缺點；不能一概而論。不能分析，不願打開腦筋，固守成見，而以一知半解爲滿足，正是經驗主義者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經驗主義者在新鮮事物而前，缺乏敏感，在工作中，缺乏遠見，以致迷失方向，發生錯誤。要克服經驗主義，就要好好學習新的知識，好好學習革命理論，好好學習如何總結經驗，要把局部的感性知識，提高到條理性的理論知識。因爲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過：「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系的東西。理論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系的東西。」又說：「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可是總結經驗，並不等於把各種經驗簡單地收集一起，而必須經過一番分析與研究。不要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而要去思考問題的本質。正如毛主席所指示：「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實踐論）

自從一九四二年黨中央發表加强調查研究的決定以來，我們黨內已經有了總結經驗的習慣，但一般地說，還缺乏分析的方法。提倡閱讀馬列主義著作，認眞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掌握馬列主義理論的精神和實質，特別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學習分析的方法。

經驗主義者往往把馬列主義著作本身看做教條主義，以爲自己不學習理論的藉口。這是完全不正確的看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自從黨內反教條主義以來，在若干幹部中，確實發生過這樣一種偏向：認爲讀書就是學習教條，因此不讀書或不敢讀書。其實，馬列主義著作本身，完全不是教條；這些偉大的著作都是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經驗的總結。問題是在於我們的教條主義者不知道把馬列主義精神和實質，運用到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上，而只知道背誦馬列主義著作中的個別詞句，生吞活剝地搬運過來。他們只起了留聲機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正是由於他們違反了馬列主義一條基本原則：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他們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很會的，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具體地分析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樣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顯然是有害的。」（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

我們更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具體應用。我們要認眞閱讀毛主席的著作，因爲它總結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各種經驗，也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最好說明。具體地分析研究問題，一切都依條件時間和地點爲轉移的觀點，這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我們學會了使用這個方法分析問題，才能從總結經驗中找出有關事變的發展規律，把經驗提高到理論；才能有預見，才能克服經驗主義。

對於有書本知識的人，要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對於有工作經驗的人，應在新鮮事物面前，有敏感，打破保守思想，跳出事務主義。要努力學習理論與新的知識。積極養成動用腦筋的習慣。毛主席說，「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眞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的經驗誤認爲即是普遍的眞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改造我們的學習）

實踐論解說（三）

李達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爲止，那麼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註六）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爲它能够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够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爲眞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發現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爲眞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爲普遍眞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眞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眞理的標準，所謂「實踐是認識論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註七），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斯大林說得好：「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註八）」

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在上面雖然說明過了，但認識的運動，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前文中我們曾經引用列寧的指示，「認識客觀實在之辯證法的路程」，是由感覺到思惟，由思惟到實踐。依照這一指示，可以知道，認識的總過程，包括由感覺到思惟的過程和由思惟到實踐的過程。上面所展開的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過程，只說到問題的一半，並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至於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則是由思惟到實踐的過程。因爲認識是以實踐發生的，人在實踐中，遇到了困難，發生了問題，就要認識那困難，解決那問題，於是就形成了理論（即理論的認識），然後依據所得的理論，組織實踐，指導實踐，實踐就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若果得到了理論而不去組織實踐，指導實踐，則實踐勢必停頓了。所以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說明世界，但是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這便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

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理論與實踐，具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實踐是理論的基礎，理論是實踐的要素。由實踐證明爲眞理的理論，能够組織實踐，指導實踐，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理論對於革命的重要性，由這一句話充分的表現了出來。斯大林發展了這一句的眞理，也說：「理論如果是在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他就能成爲工人運動的偉大力量；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圍事變的內在聯繫：因爲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使實踐不僅能了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論列寧主義基礎」），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百多年來，無數先烈，爲了民族的解放而流血而奮鬥，其英勇事蹟，是可歌可泣的，但他們不能摸索出救國救民的革命理論。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

義以後，毛澤東同志才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鬥爭中，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綜合百多年來革命的經驗，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已經指導我國人民得到了勝利和解放，並將使我國民族經由新民主主義而到達於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理論的重要性，已經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毛澤東同志本人非常重視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理論的創造，是一件極其偉大而又非常艱巨的勞作，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說，他對於無產階級的事業、人民的事業，具有百折不撓、移山塡海的無限忠心，他對於歷史、社會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對於領導革命有極其豐富的經驗，他善於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作精確的科學的分折：他善於集中羣衆的經驗、意志和思想，又應用到羣衆中去。因此，他能依據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和中國具體的經濟、政治環境及條件，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獨立的光輝的補充，並用中國人民通俗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使之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和中國的特殊條件，成爲中國無產階級羣衆與全體勞動人民羣衆戰鬥的新武器。中國民族，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不但是能夠戰鬥的民族，而且是一個有近代科學的革命理論的民族了。

毛澤東同志不單自己重視革命理論的創造，還經常勸告黨員重視理論，學習理論。他說：「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在今日革命建設的過程中，一切黨與非黨的幹部，一切工作者，都要重視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特別是要依據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與看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

然而，理論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秘，因爲它好看，而是因爲它能指導行動，毛澤東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爲他能夠指導中國人民的革命取得勝利，使中國能夠得到獨立、民主、和平與統一，並將由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而走向於共產主義的美好的將來。所以，重視理論，學習理論，必須採取「有的放矢」的態度，仿照毛澤東同志的話來說，「的」就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矢」就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我們所以尋找這根「矢」，就是要射中中國革命與建設之「的」。如果眞能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解決實際問題，得到了正確的理論之後，而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正像一個人得到了眞箭（不是蠟箭）却「把箭拿在手裏，捻來捻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越老是不願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整頓學風黨風文風」）。革命的理論而不應用到革命的實踐中，那種理論還有什麼意義呢？理論是解答實踐中所提起的問題的，解答了問題的理論，必須應用到實踐中去，才能使實踐繼續發展。所以，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必須把它運用到實踐中去。

認識有兩種作用，一是受動作用，一是能動作用，兩者都是物質生產過程中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之反映。人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地受到外界物質的事物之刺戟，這是受動作用；同時又經常地改造它，處理它，使它合乎利用的目的，這是能動作用。物質生產上這兩種作用在觀念的形式上反映出來，就成爲認識中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認識中的這兩種作用，形成爲辯證的統一，但認識的能動作用，比較受動作用占居主導的地位，（正如物質生產上的改造物質的能動作用，對接受物質刺戟的受動作用占居主導地位一樣）。認識的能動作用，表現爲思惟的創造能力，能夠改造感性認識的材料，引起認識過程的突變，即感性認識飛躍到理性認識。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的飛躍，即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在中國革命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一經形成，即「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改造我們的學習」）。這就是從理論飛躍到實踐的良好例證。馬克思所說「理論一旦掌握了羣衆，就成爲物質的力量」，這就意味着理論到實踐的飛躍，我們可以這樣地說，一切能在實踐中正確地解決問題的理論，都可使實踐提高一步，這就是飛躍的變化。

理論所以能夠飛躍到實踐，是因爲理論能夠指導實踐，組織實踐。但這樣的理論，必須是經由實踐證明其正確的理論。未經實踐証明過的理論，不但不能指導實踐，組織實踐，反而引起實踐的失敗。所以抓着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檢驗一番。譬如：關於生產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用到生產的實踐去檢驗；關於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用到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去檢驗；關於自然物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用到科學實驗的實踐去檢驗。通過實踐去檢驗理論，然後終能發展理論，這是認識過程的繼續，即是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理論的東西是否符合客觀眞理性這一問題，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論用到實踐中去，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如果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這理論便合乎客觀的眞理性，否則便是錯誤，只有通過實踐證明其正確的理論，纔能促進實踐的發展。

任何一種理論，必須通過實踐才能証明它的眞理性。許多自然科學的理論，並不是在自然科學家得到那些理論時就成爲眞理，而是在經過科學的實驗之後才能成爲眞理的。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經過多年之後，才由天文學的實驗証明它的眞理性。

物理學家關於原子能放射的學說，多年前已經發明，但直到最近才証明它的眞理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和斯大林所創造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也是由於後來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才証明它們的完全的眞理性。毛澤東思想，「在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鬥爭中反覆考驗過來了，證明它是客觀的眞理，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論黨」)。又如辯証唯物論這一哲學所以被稱爲普遍眞理，是任何人的實踐所證明的。無論是誰，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正確地應用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就能使實踐順利前進。認識的歷史對我們表明了：有許多理論的眞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了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例如空想的社會主義，雖含有眞理的成份，但經過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暴露了它的片面性，而爲馬克思所揚棄了。又有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例如共產黨歷史中曾經有過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左」和「右」的機會主義，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檢驗，糾正了它們的錯誤。由此可知，任何理論，必須通過實踐，才能證明其眞理性，並且經由實踐證明了它是眞理之後，才能指導實踐，組織實踐，發展實踐。前面所說實踐是眞理的標準，其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所以列寧指示我們說：「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

理論與實踐，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理論與實踐的聯繫，是無產階級的黨性的最高表現。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之唯物辯証的統一。在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如果有人分裂理論與實踐，那便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斯大林說得對：「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這兩句話的意思，最好借用斯大林自已在別的地方所說的話來說明。他說：「甚麼是沒有工人運動的科學社會主義呢？——這就好像一個指南針，它放在那裡不用，就會生銹，結果只好把它拋掉。什麼是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呢？——這就好像沒有指南針的船，它雖然也能駛到彼岸，但有了指南針，就會迅速得多地到達彼岸，而且會少遇一些危險。你們把兩件東西（即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工人運動的實踐——節錄者附註）結合起來，就會有一隻很好的大船，它會一直駛向彼岸，安然到達碼頭」。(斯大林：「略論黨內的意見紛歧」)

「說到這裡，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覆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與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爲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爲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獲，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的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了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由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過程，在前面已經說明了。但是說到這裡，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麼？我們的答覆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

爲什麼說是完成了呢？這是就變革某一對象的發展階段內的某一過程得到成功的情形說的，譬如就變革某一自然過程來說，我們要興辦一個工程，要解決一個科學問題，要製造一種器物，要增進農業生產；或者就變革某一社會過程來說，人們要發動一次罷工，要指導一次戰役，要改造一種教育，在從事這一類實踐時，某一對象的具體過程，就反映於人們意識之中，形成爲感性的經驗，人們的主觀的能動性就發揮作用，把那些感性的經驗實行論理的加工，能夠發現那一對象的具體過程的法則。適應於這一具體過程的法則，就能夠概括那些關於這一對象的意識內容，形成爲思想，造出有系統的知識即理論，根據理論，擬定計劃或方案，然後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來改造同一對象的同一具體過程，如果這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在改造那一具體過程中成爲事實，或者大體上成爲事實，這就算是實現了預想的目的，對於這一具體的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即是說，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業生產計劃的完成；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是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

很少的。例如在十年蘇維埃戰爭初期，我弱敵强，我的裝備太差，在軍事的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方面，都趕不上蔣介石匪軍，並且戰爭過程剛才開始發展，匪軍內部的矛盾與弱點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所以在戰鬥進行之中，一經發現「計劃與情況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改變也是間或有的」（「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所以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在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中，依據所得的理論，擬訂實踐的計劃去實踐的時候，常不免招致失敗。基於失敗的教訓，去檢驗所得的理論，改正原來的錯誤，然後再去實踐。有的時候，要經過多次的失敗，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使認識與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是說，主觀上預想的結果，變爲客觀的事實。這便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但不論怎樣，到了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時，人們對於某一發展階段內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與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眞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根據對於某一過程的認識去改造某一過程，如果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人們對於這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但是當着一個過程在其發展中，推移於另一過程時，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認識是對於自然過程或社會過程的反映，這反映本身也是一個過程，並且是一個辯證法的過程。任何自然過程或社會過程，都有其內在的矛盾，因矛盾而引起鬥爭，由於鬥爭的發展，那自然過程或社會過程就從一種形態轉變爲它種形態，即從一個階段轉變到另一階段，開始了新的過程。這新的過程又孕育着新的矛盾，開始其新的發展。自然過程和社會過程既然向前推移和發展了，人們對於過程的反映，必然也跟着推移與發展。所以，眞正的革命指導者，在指導革命的過程中，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如果發現了有與客觀形勢不相符合時，固然要隨時善於改正，並且在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毛澤東同志在指導中國武裝革命過程中，最善於適應過程的推移與轉變，製訂了正確的革命戰略。他在一九三八年發表的「戰爭與戰略問題」中，在一九三九年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綜合了中國共產黨十八年間武裝鬥爭的經驗，得出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與優點的正確結論。他指出：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之時，或者是聯合資產階級，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或者是聯合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在帝國主義進攻之時，則是聯合國內一切階層，同時也即是聯合資產階級。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抗日戰爭。北伐戰爭是第一階段，十年蘇維埃戰爭是第二階段，抗日戰爭是第三階段。這三階段的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份都是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國內戰爭，或者是民族戰爭，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戰爭，或者是共產黨聯合國民黨進行的戰爭。當然，這些區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爭主體有廣狹的區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產階級聯合）。戰爭對象有內外的區別（反對國內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內敵人又有反對北洋軍閥或反對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行中有各個時期不同的內容」。基於各個時期不同的內容，軍事戰略也隨着轉變了。在國內戰爭的前期，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中國型的正規戰爭，是提高了的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的前期，主要的是游擊戰爭，是用正規性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的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將是世界型的正規戰爭。至於一九四六年以後的三年多的解放戰爭，已進到革命形勢的新階段，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加上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主體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基於革命的新形勢，毛澤東同志決定了十大軍事原則（見「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作爲打敗蔣介石匪帮的主要方法，結果果然把蔣介石匪帮打敗，中國人民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以上的說明，是隨着武裝革命戰爭的過程的推移與轉變而改變革命戰略的很好的例證。

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非常急速，革命黨人的認識必須追隨於變化了的新形勢而急速變化，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毛澤東同志對於新鮮事物有敏銳的感覺，每逢革命形勢發生變化時，總是依照新的形勢，規定新的任務，指示全黨去實行。如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所報告的「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就是輝煌的範例。特別是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後，蔣介石匪帮勢力在基本上已被擊潰，革命勢力進入了工商業的大城市，一切事物對於在老解放區工作的許多同志們，都是新鮮的東西。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要「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些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

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便是說，革命形勢起了新的大變化，革命工作者從前在老解放區所『熟悉的東西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强迫我們去做』，所以必須學習做新的經濟建設的工作，使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爲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原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說到思想與實際的關係，可能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思想能正確地指導實際。這只有馬、恩、列、斯、毛這些革命導師，能够總結人民革命的經驗，通觀革命過程的全體，指出過程的推移與轉變的法則，提出科學的預見，指導革命階級不僅能瞭解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裡行進，而且能瞭解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裡行進。第二種情形，是思想能與實際相配合，這雖不能像革命導師們那樣有遠大的科學的預見，但還能正確地針對革命的新形勢，提出新的辦法來，不至與實際脫節。第三種情形，是思想落後於實際，因爲人們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屬於反革命陣營的人，他們的思想是徹頭徹尾落後於實際的。他們爲着保持自己階級的利益，想把社會拉到過去的時代去。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憲政』中所說的頑固份子，就是這類人。『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的人，就叫做頑固份子』，帝國主義者、官僚資本家、封建地主等，都是這類的頑固份子。另一方面是屬於人民方面的人，其思想落後於實際，有很多的原因，他們或者是缺乏革命的階級意識，或者中了敵人階級思想的毒素，或者是沒有受過革命的鍛鍊，或者受了局部工作的限制，以致思想追不上實際，所以革命隊伍中也不免有頑固派存在。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他們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例如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大革命當時，組織起來的農民已有數千萬，土地革命的要求已被提了出來，民衆武裝的需要已是非常迫切，但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派，却認爲共產黨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公然做了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主張實行土地革命，不主張爭取軍隊，而只是『片面的着重於民衆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什麼民衆運動也塌台了』（「戰爭與戰略問題」）。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實例。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的思想，總是落後於實踐的。他們不但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工作，也不能跟着社會車輪前進，而只怨恨車子走得太快，想把車子向後拉。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雖然和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不同，但在思想落後於實際這一點却是相同的。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眞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

思想落後於實際，固然要陷入右傾機會主義，但思想若遠遠超過於實際，超過於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就會陷入於『左』翼空談主義。『左』翼空談主義者，不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和革命的實際出發，而從主觀的願望或抽象的原則出發。有些把幻想看作眞理，有些則把將在將來有實現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例如整個中國革命是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階段的兩重任務的。毛澤東同志說：『每個共產黨員須知，整個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包括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淸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的領導中國革命』（「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但是『左』翼空談主義者，不懂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或者主張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應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或者『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新民主主義論」）。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如不打倒，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左』翼空談主義者『一次革命論』的主張，只是一種空想。

（未完・下次續完）

本社啓事

本刊所載各文，除報紙雜誌外，非經本社和作者同意，請勿轉載！

大學課程「中國語文概論」的一個教學總結

——北京師大中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組報告之一——

黎錦熙

一　明確教學目標（教學計劃和大綱）

師大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字概論」這一門課程，在教學計劃上是分做三個節目，同時進行教學的：（一）中國語文問題，二學分；（二）實用文字學，四學分；以上共計六學分，另加（三）新文字學習，一學分。都是一年級必修。

「中國語文問題」的教學目標和任務是：「以本國語文教育上現實的需要和應當改革的各問題爲出發點。在本系，須把在校四年間有關語文的專科課程，都須爲聯系到實際問題；……使學者明確地了解要學習或運用這些專科知能的任務是甚麼，方針指哪兒。——在初步的技能（工具）方面，本課程必須以正確的『現代國文（寫作）』與標準的『國語新文字（拼讀）』爲基礎（所以同時設有「實用文字學」和「新文字學習」兩課目）——從這些技能的基礎上，建立適當的理論。明晰的概念以及業務上必需革新而有效的語文教學法。（卽以對於現實的語文改革和語文教育問題，都能簡明而正確地作原則性的解答，爲修畢的最低水平。）」

過去的內容大綱是略照主要教材（國語新文字論）的綱目次序：（一）緒論（中國語文全景）；（二）音標；（三）文字（漢字）；（四）語言（漢語標準語和方言，少數民族語言）；（五）語法和詞彙。參考資料分章配列。應聯系的其他課目，也分別註明。

教學方法以自學精讀爲主。講堂上只就主要教材提綱或補訂；凡需要註釋的，大都在指定參考資料中的某部分自行解決，較粗淺的問題，則由互助和小組討論解決。預定每一單元講完，舉行小組討論一次，集體提出問題，由教員隨時解答。

二　創試檢查制度（溫課與考試）

照師大的現行學則，期終考試照常嚴格舉行；但溫課和教學檢查制度是新建立的。「中國語文問題」的期終總結，創試了一種「三位一體制」，就是把溫課、考試（測驗）、教學檢查三件事連串起來，成爲一體。說明如下：

（一）溫課：一般有「溫課提綱」，是就本學期所教所學平列一些重點問題，個別溫習，上學年度本課目也是這樣辦的。但結果大部是「應付考試」（甚或就把它作爲考試），而不是「總結學習」，不能把本期所教所學系統化起來，不能自運腦力加以批判和消化，因此，失去了溫課的正確意義，本學年度第一學期索性把溫課提綱改爲一個綜合的具體的「中心問題」，就是把問題不再平列一些，而只直發一個。由於本期內同學都從抗美援朝的宣教運動中獲得一些反映，對於掃盲識字感到急切，就結合本期所教所學，提出一個「注音漢字與新注音漢字的選擇」問題，作爲溫課的中心。

（二）考試（測驗）：一般仍照舊章定期按時在堂上出題考試，但爲時間所限制，不能系統地「總結溫課」，所以仍多流於形式地「完成考試」（或者就以溫課習題作爲考試，就不再在堂上考試）。這「三位一體制」是把每個人溫課時的問答卷，通過小組討論，連同討論時的批評和總結報告，由小組長負責彙交，然後逐卷核定成績的。（附註：上學年度的暑前期考，本課目發了一「溫課提綱」十四題，後附「作答說明」，錄此備參：「這是把『溫程工作』和『理論測驗』『教學檢查』結合起來的三位一體制，共程序：（一）每個人各自選擇至少五題（愈多愈好）用書面詳盡地解答。（二）各將答卷交本小組的小組長。（三）答卷中如有問題，通過『互助』還不能解決的，必須在小組討論時提出。（四）小組討論的總結，由小組長書面報告，連同本小組全組答卷彙

交教員。（五）各小組的總結報告，須包括：1.本小組組員提出的問題，其討論經過和總結；2.本小組長對於某些答卷的意見，或已經過討論的綜合意見；3.本課目教學檢查的總結意見。（六）限於假前交齊。」）但過去的溫課提綱，只是發出十幾個平列的問題，沒有抓住中心，結合實際，上學年度末期考試情況都不能符合理想（期中各課目都須結束，大家不願意單獨爲這一課目舉行小組討論會，結果，小組長只能還把每人溫課時的書面問答卷彙交，這就等於不在堂上考試了）。這一次，既把溫課問題一些平列的改爲一個直豎的，綜合地系統地指定主要的和參考的教材，溫習、深究和組織起來，並且早日宣佈，以便大家在溫課期前準備；强調在溫課期間必須照本課目溫課提綱的「作法說明」，開一次總結的小組討論會，由同學自行計劃。結果，雖然只有第一、二小組會聯席討論，由第二小組長提交記錄和總結意見，但每人的答卷，一般是有組織性的，是認眞做了一番溫課工作才寫得出來的，至少可抵論文式的全學期研究報告；堂上另行出題的直接測驗儘管省略了，而每個人是否有心得和是否努力，都顯示得出來。

（三）教學檢查：這點要展開師生間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另有制度的。但每一課目的深入檢查，還須在本課目的教材內容、教學過程和總結中去進行；這「三位一體制」就在上面所述小組討論中，包括大家對本課目教學檢查意見的提出和討論，由小組長負責記錄和總結，附帶地報告給教員；由教員一面參酌修訂其教學計劃和內容，一面還可向教學研究組的提出報告，交流經驗。這一次，雖小組討論的附帶報告還不完全，但從同學學習的情緒上、困難上和成績的表現上，可以大體了解教學的效率如何和優缺點之所在。

三　總結優點

（一）學習了掌握階級和羣衆的觀點去看問題。

語言文字學科的業務學習，向來容易流於機械，不易結合思想政治的理論。況且本課目所用的主要教材（國語新文字論），乃是站在專科本位的一份報告書，上學年度雖在教學計劃中有所聯系，但一遇到實際問題，仍是和理論搭不攏。這一次，大家既從抗美援朝的宣教工作中面臨文盲和半文盲的大衆引起了動機（如前面所說），又從指定的參考教材中較深切地體會到新中國領導階級要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二十七本答卷中差不多是一致强調掃除文盲的突擊工作。因此，對於這個中心問題（注音漢字和新注音漢字的選擇），也差不多是一致主張選擇「注音漢字」，或者暫時選擇「注音漢字」。對於國際化新文字的推行，一部分認爲注音漢字既由「音符」與漢字的結合而展開「鬥爭」，到漢字堡壘攻下時，獨立發展的新文字自可取而代之；不必多費事再設計鑄造「新注音漢字」，爲着等待它而不能迅速完成「突擊掃盲」的任務，這是不智的，是新中國建設上的損失，是廣大人民的損失。完全同意選擇「新注音漢字」的只得一卷（等於二十七票中的一票）。

（二）矯正了一些主觀的偏向和高論空談的積習。

在上學年度小組討論所爭辯的，多半是廢止漢字代以國際化新文字的問題，同時大家又覺得這類問題太不現實，並沒有解決它的眞正情緒和研究它的嚴肅態度。（對於一班語言文字學課目，不論新的理論和舊的文獻，同樣的都不易提高學習情緒。）這一次，大家都在漢字繁難不適於做大衆語文工具這一水平的認識上，也並不抹煞漢字的現實性，不空談廢止它，差不多是一致同意把一種「音符」來和它結合，作爲過渡到新文字的橋樑，一方面藉着注音就可以大大的克服大衆學習漢字的困難。在小組討論時，雖還存在着一些主觀偏向的高論（例如主張目前掃盲就可痛快地一律改用新文字，相反的，就是漢字頂多只能簡化，不可動搖），但書面的答卷，大體上是能循着實事求是的路線前進而落到本題的。

（三）端正了分析問題、尋求解決的態度。

大多數要選擇注音漢字而不選擇「新注音漢字」，大多數又要把國際化的新文字作爲文字改革的終極目的，那麼，到了注音漢字普遍推行，注音字母逐漸獨用之後，又如何使大衆能改變它爲國際化的拉丁字母拼音新文字呢？對於這個問題，一般的感覺着有些矛盾不易解決。於是有的主張就獨立使用注音字母來組織新文字也好，文字既非文化本身，只是工具，何必一定要國際化？（有三卷）有的表示只要四萬萬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掃盲工作迅速成功，於願已足，何必再計較「音符」與漢字呢？像這樣的意見，是超越本題限度的解決法。此外，多數都考慮到這個矛盾問題，都在分析情況，推斷前途，覓取辦法。雖然提出的各種意見已見於主要教材或參考文件中，但大家能辯證地分析問題，尋求解決，這種學習態度是認眞的，是端正的。

四　總結缺點

（一）基礎訓練不大够。

基礎訓練就是本課目教學計劃的「目標和任務」中所說的「正確的寫作」和「標準的拼讀」，在一年級是高中畢業的水平，當然不能估計太高。其實，現在的一年級比較過去的，政治覺悟高些，所以有上面所說的第一個優點。對於習用的文字（漢字）和現行的字母，一般還不免偶有水平以下的錯誤。例如卷中有說漢字是統治階級壓迫與剝削人民的武器的，又如說注音字母是三十八個，是一九三一年公佈的。

上學年度的教學檢查，早已反映了一種意見，說大家程度淺，不能自動研究，因此小組討論不能深入。本學期班上也表示了系統地精簡地講授語文基本知識的希望。這次總結，也還有少數個別不够水平，須待補充初步的基礎訓練的。

另一方面是突出的，例如，主張通過「注音漢字」就把注音字母來獨立使用組織新文字，這種建議，除已在主要教材和指定的參考資料中找出一點理由外，還應當多方參考（如日本的假名，朝鮮的諺文，必須借鏡），才能說服人家，所以對於參考資料廣泛地蒐集和整理，也是學習方法上一種高度的基礎訓練。

以上一高一低的基礎訓練，都是屬於知識方面的，另有屬於技能方面的，如上面所說對於字母符號和字音語音的「標準拼讀」，更需要經常的且較艱苦的基礎訓練。

（二）實際結合不充分。

大家都知道理論要與實際結合，但大家在研究問題時，又往往把最實際的自身情況忽略了。本學年一年級的新生比往年不同，全國各大方言地區的人都有：「吳越」「閩粵」兩大方言區，說到掃盲，如何能用這種右注國音的「注音漢字」呢？假如請你自己回鄉去實踐這種掃盲工作，讓上海人或廣州人都照「注音漢字」刊物每字右注的國音去讀書（不認得中間一行漢字的），試問能懂得意思嗎？二十七本答卷中僅有一本考慮到自己方言區的問題。只因我們自己所在的圈子裡都是滿可以運用漢字的，儘管彼此口音不同也不礙事，竟沒有體會到不識字的廣大羣衆他們專憑「耳治」的種種困難（文盲專讀注音，自唸自聽，還是「耳治」；能讀漢字，見形知意，才算「目治」。將來進到能獨用的拼音新文字階段，這個「耳治」才可與「目治」合而爲一）。凡對於一個問題做了決定，必須設想我自己怎麼樣去辦，這才算走向結合實際，這才能主動發掘問題。

但還有三卷也考慮到方言問題，結論是：「注音漢字」右注正確的國音，穩紮死守，正好糾正方言，統一國語。這在掃盲工作上，只在大「官話」系統內的小方言區才有可能性。如果要結合實際，就必須——尤其是生長在小方言區的——先從自己的方言糾正起，對於自己愛好的文藝讀物，必須經常「實踐」地作國音的朗讀，把教學上的語言技術準備好；但一般並不大注意此事。最怕的是：我主張藉着「注音漢字」的印刷品來糾正廣大羣衆的方言，就是我自己的方言不要糾正。

（三）頭緒有些沒搞清。

例如：本課目全名爲「中國語言文字概論（一）中國語文問題」，可簡稱爲「語文概論」或「語文問題」。但二十七份試卷上「課目」格內標題有七卷是標爲「國語新文字論」，這是把主要教材的書名誤作課目名稱，更有八卷是只作「國語新文字」的（內有一卷是「國語新文字學」），另有兩卷是稱爲「語言概論」的，共計寫錯了課目名稱的有十七卷，差不多佔總卷數的三分之二。

又如：試題是：「注音漢字」和「新注音漢字」的選擇。「注音漢字」是每個漢字右旁注音的一套印刷器材，並不只是「注音字母」；新注音漢字」是把每一個拉丁化新文字的詞兒和漢字對照而正在設計中的印刷器材，更不是專指拉丁化新文字。這種分別，在學習的主要教材（新文字論）和參考資料（如新語文二十七期）裡，都提醒得很明確。但卷中多數是把「注音漢字」與注音字母併爲一談，把「新注音漢字」與拉丁化新文字認爲一物。有的甚至把試題改換了字兒（如把題中「新注音漢字」改爲「新文字」）。——這麼一來，這些答卷的內容豈不都是文不對題了？但是，小部分是文與題一同錯到底的；大部分是把題目看錯了而文章內容並沒有錯。前者當然是基礎沒有搞好（屬於前第一項）；後者是麻麻糊糊地把頭緒沒有搞清，如同辦公文的把兩個機關誤作一個，著述家把所根據的幾部書或者某些人都弄錯了，儘管文章內容說得過去，但這些錯誤多半是表現在事情的頭緒上、主題上、重點上，關係

不少。必須反省：病根何在？

五　存在的問題和教學計劃大綱的改進

上節所說的三個缺點，就是存在的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因此，首先應當修訂本課目的教學計劃和內容大綱的先後次序（另詳本學期語言文字教研組修訂的「北京師大中文系中國語言文字概論（一）中國語文問題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合表」），要點是：

（一）先打好基礎：

（1）擬從下學年度起，第一學期先教「實用文字學」和「新文字學習」，第二學期再教「中國語文問題」，不同時進行教學。

（2）「中國語文問題」的綱目次序，改訂爲：一、漢字問題；二、音標問題；（這都是現實在運用和需要就了解的東西，與前兩課目密切聯系，有缺乏基礎訓練的，一律提高到水平。）三、漢字與音標的結合問題；四、中國語文的全景和新文字問題；五、國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文問題；六、語法和詞彙問題；七、語文改進與大衆文藝的關係。

（二）不離開實際：

（1）講到前項綱目第三節時，應與實際的掃盲識字運動相配合；

（2）隨時各就自己的方言，實際地運用「音標」，並科學地比較「國語」而實際地練習矯正（前項綱目第五節）；

（3）多配時間講習「語法」，與「寫作實習」聯系起來（前項綱目第六七節）。

（三）加強些領導：

（1）鼓勵學習情緒，認眞「自學精讀」，精細發掘問題；

（2）每一單元講完，必須「小組討論」，集體提問解答；

（3）「中心問題」，參考資料，精簡地指出，嚴肅地工作。

（4）頭緒不清，粗心浮氣，不可放任隨便，以致發生錯誤。

這一次總結，在本課目的任務中所謂「對於現實的語文改革問題，能簡明而正確地作原則性的解答」這一個「最低水平」上，雖然相當地獲得一些成績，但對於那些缺點，關係不止一科，應大家注意，努力改進！

（一九五一年二月）

日本科學史學會對於和平運動的決議

原子能的利用，雖是科學史上的最大成就，由於原子彈的出現，它也帶來了可悲的機運，致使我們在五年來和平的生活中，爲了原子武器的破壞性能，一天一天地在增大，新的戰爭暗雲密佈，在我們的心裡又罩上了極大的暗影。

我們大多數的日本科學工作者，一面是堅持以發展科學反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爲保衛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一面針對着帝國主義者强橫壓迫，加緊我們自己的團結，爲了尋求發展科學爲和平建設服務的道路，日本科學史學會，在面臨今天的嚴重局勢之前，更要糾正昔日的錯誤思想，決心加以深刻的反省。

我們確信着基於歷史的認識，我們一定要做科學與技術爲民主主義及和平事業而服務的眞正的保證者。我們是由衷地希望祖國的獨立，世界的持久和平，學術的自由，爲了達成以上的目的，我們堅決聲明與國內、國外所有熱愛眞理與和平，一切不同立場的人們團結起來。

因此，我們在科學史方面，努力去研究和證明，那侵略的戰爭，如何殘酷地傷害了大多數人類的生命，防礙了全人類的進步，阻滯了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爲了進一步地加緊保衛和平事業，對於日本學術會議全體大會的擁護和平的決議，日本民主主義科學工作者協會，日本物理學會、日本地質學會，日本心理學會等科學團體的保衛和平的聲明，以及科學界和平問題座談會的活動等，我們聲明予以有力的支持。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

日本科學史學會第六次全體大會啓

（載於日文『科學史研究』第十五號，一九五〇年七月。黃宗甄譯）

國語語法綱要（中）

趙元任

丁　造詞法

十一　造詞法的種類

實際上，漢語的最小意義單位都是單音節的，例如人，肯，對。只有少數來源不明的或者外國來的才是多音節的，例如蘿蔔，嘰咕，菩薩，邏輯。雖然這些全寫成兩個字，並且就來源說，造詞法是複雜的，在口語中却不把他分析成更小的意義單位。

漢語的造詞法可以分成底下三種來討論：字的重疊跟變讀；增加成分；複合詞。

十二　重疊跟變讀

重疊有好些功用，最主要的有兩種。

1、所有表示動作的動詞都可以重疊，重複的字念輕聲，有「一次」的意思，例如走走，看看，劃算劃算。多數助名詞（二十二節）跟有些個名詞可以重疊，保留原調，有「每」的意思，例如張張，人人。重疊的動詞有時候兒加兒，例如等等兒；重疊的助名詞常常加兒，例如張張兒，個個兒。

2、形容詞或副詞可以重疊（重複的字要是原來不是陰平，就變陰平），常常加兒，加的不加的隨便，有「生動」的意思，例如快快兒（的）。兩個字的形容詞或者副詞，每個字都可以重疊，加的字，要是原來第二個字輕聲，恢復重讀跟本來的調子，有「加强語氣」的意思，例如慌張：慌慌張張的。

直接的稱呼，例如爸爸，媽媽，跟一些特別詞，例如蟈蟈兒，娃娃，一定得一個一個的學。比方說，咱們可以從黏增的星字造成星星這個詞，卻沒有從黏增的月字造成的當月亮講的月月，除非是小孩兒說話。

變讀（包括調子不同）的例子：長短的長：生長的長；涼：晾；傳遞的傳：傳記的傳；看見的見：出現的現（也寫作見）等等。雖然每一對都是親屬字，寫法也常常相同，爲了實用方便，一定得個別的學習。

十三　增加成分

漢語的詞前增加成分很少。常用的只有第，初，老。第是序數的前加成分，例如第一。初是每個月前十天的前加成分，例如初三。老是單音節的姓跟一些動物名稱的前加成分，例如老張，老虎。

漢語的詞後增加成分不多，可是用的機會非常多。最重要的後加成分是：

指小後加成分兒　寫起來跟別的字一樣，說起來不成音節，是前頭那個字的捲舌韻尾。用作名詞後加成分的時候比用作指小後加成分的時候多，例如黃：黃兒。動詞加兒的只有玩兒，火兒了，顛兒了。

名詞後加成分子　椅子，襪子。

名詞後加成分頭　石頭，外頭。

名詞後加成分巴，笆　尾巴，籬笆。

疑問詞跟副詞後加成分麼　麼是前頭那個字的韻尾m，要是在停頓的前頭就自成音節me。甚麼，這麼，那麼，怎麼，哪麼，多麼。

代名詞跟人稱集體名詞的複數後加成分們　們是前頭那個字的韻尾m，或是自成音節men。他們，孩子們。

詞尾後加成分了表示「動作完成」等等，例如打破了。

句尾後加成分了表示新的情形，例如飯好了；燈開了；表示「敍述一串事實」，例如後來我們就走了，到家就睡了。

在文言跟別的方言裡頭，上頭說的兩種後加成分常常不同音，不像國語是同音的。國語說你傷了風了，廣州話說你傷咗風咯，上海話說儂傷仔（是）風哉

(十)。句尾後加成分了文言是矣，詞尾後加成分了文言沒有相當的字。

在國語裡頭，這兩種後加成分擱在一塊兒就合成一個，例如你把杯子打破了。廣州話咗跟咯都保留：你將隻杯打爛咗咯。

進行式的後加成分着　我穿着你呐；說着話呐。

表示可能的後加成分得　說得，記得，要得。

表示從屬關係的後加成分的　我的帽子，快快兒的跑。

漢語的詞中附加成分非常之少。有很少幾個常見的都是跟「部分重疊」在一塊兒的。可以分成兩種：

1、叮噹：叮玲噹啷。第二字跟第四字都拿L做聲母，分別跟第一字，第三字疊韻。

2、糊塗：糊哩糊塗。哩字擱在第一字的後頭，再重複整個詞，要是原詞的第二字輕讀，恢復原來的重讀跟調子。

戊　複合詞

十四　複合詞的分類

複合造詞法在漢語裡頭很重要，値得換一個大題目來討論。複合詞是包含兩個字（或詞）的詞。複合詞可以用好些方法來分類：

1、組成複合詞的字是不是有一個輕讀　烙餅兩個字都重讀，燒餅的餅字輕聲。

2、組成複合詞的字是自由的還是黏附的　烙字燒字餅字全是自由字，可是柿餅的柿是黏附字，柿是柿子這個詞的黏附的詞根。

3、組成複合詞的字當中是不是有造句的關係　買賣的買跟賣是並列關係（比較買賣都一樣價錢）；可是打手的打是外動詞，除非加的字，不能當修飾語用。

4、複合詞在語法裡的功用是不是跟組成複合詞的字一樣　比方說，燒餅是一種餅，可是買賣是名詞，買字跟賣字都是動詞。

5、複合詞裡頭是不是包含孳生詞或是複合詞　瓜子兒的子兒是從子加兒韻尾孳生出來的，山楂膏的山楂本身是複合詞。

6、複合詞的成素常用不常用　比方說有意的有是自由字，意是黏附字，有跟意都是常用的。惡（上聲）心的惡（上聲）在這個複合詞以外很少用到。

7、最後，有些黏附字是非常活動的，可以造成無限的暫時複合詞。有些是可分複合詞，只要知道成素的意義，就能猜對複合詞的意義。另外有些是成語性質，就是已經知道了成素的意義，還得當作一個新詞去學習的複合詞。比方說，那變，屋子裡是暫時複合詞；飛船，好看是可分複合詞；白薯，月亮是成語複合詞。

要是咱們同時運用這七個原則來分類，結果一定弄得非常複雜。咱們主要的是討論複合詞的成素跟成素之間的造句的關係（要是有的話），帶便提一下別的重要的現象。

十五　主謂複合詞

討論謂語的種類的時候（第五節），咱們說過了，在眞正主謂結構的謂語裡，當間兒可以插進別的字，主謂結構複合詞却是一個凍結的單位。主謂複合詞除了當謂語用以外，還有別的功用。例如，他並不心疼他的錢這句話裡頭的心疼。

十六　並列複合詞（包括同義字跟正反字）

利害（兩個字都不念輕聲，例如利害關頭），利害（害字念輕聲，例如他很利害），尺寸，希奇，裁縫。

咱們要注意，造句法裡頭的並列關係是可以顚倒的，即使有一個次序是比較習慣的，造詞法裡頭的並列關係次序是固定的。少數幾個例子兩個次序都可能，意義常常不一樣，比方說，要緊是重要的意思，緊要多少帶點文言味兒，有緊急的意思。

十七　從屬複合詞

心理，心裡，笑話，三百，難受，麻繩兒。

地位複合詞是從屬複合詞裡頭頂重要的一類，由名詞（或者代名詞）加上輕讀的定位字造成，比方說，桌子的上頭是個仂語，其中的上頭是名詞，桌上卻是個加定位字的體詞結構複合詞。

從屬的動詞名詞複合詞是名詞不是動詞。例如：別針兒，夾鉗，扶手，辦法，借條兒，存款（比較十八節）。

既然我們把形容詞當作動詞的一種，形容詞名詞複合詞也屬於這一項。例如：香蕉，臭蟲，好人，大使。

助名詞複合詞是決定詞跟助名詞組成的從屬複合詞，例如一天，這塊。詳細情形看第二十二節。

十八 動詞賓語複合詞

咱們已經說過，動詞賓語結構的性質介乎造句的跟造詞的之間。要是這種結構的成素有特別的意義，或是這種結構實際上不當動詞加賓語用，最好當作複合詞去學習。要是賓語念原有的聲調，全結構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眞正的動詞賓語結構。比方說，存欵的意思在到銀行去存欵跟把存欵取出來這兩句話裡頭是不同的。要是賓語念輕聲，複合詞常常有不同的意義。例如：護書，董事，點心，枕頭。

十九 動詞補足語複合詞

造詞法裡跟動詞結構連用式相當的是動詞補足語複合詞，例如我喫飽了。動詞結構連用式的第一個動詞總有一個賓語，動詞補足語複合詞的第一個動詞却決沒有賓語。比方說，風颳倒了一所房子，賓語在第二個動詞或者補足語後頭，不在主要動詞的後頭。動詞補足語複合詞的意義總是表示結果的，不像動詞結構連用式那麽複雜：颳倒了，倒了是颳的結果。

最簡單的補足語是詞尾後加成分了字，例如把水喝了的了，殺了人了的第一個了字。

方向補足語是補足語當中很重要的一類，由動作性的動詞組成，表示前頭那個動詞動作的方向，例如飛來，送去。

動詞加上方向補足語本身，也可以當作方向補足語用，好像送進來的進來是送的補足語，進來的來是進的補足語。加來的（加去的比較少）複合補足語常常給插到當間兒的賓語給分開了，例如拿出一本書來。（註六）

可能補足語又是很重要的一類。咱們已經說過表示可能的後加成分得，例如記得，認得（跟表示從屬關係的我的裡頭的的不同）。這種後加成分不很活動，那些動詞可以加得尾一定得一個一個的學。要是後頭有個補足語，幾乎任何動詞都可以帶得尾，我們管那個補足語叫可能補足語。雖然咱們不說拿得，咱們却能說帶可能補足語下來的拿得下來。（註七）

二十 再複合詞跟小詞

詞後坿加成分不單加在詞根後頭，也加在整個複合詞，仂語，句子後頭。比方說，闈脖兒的結構跟瓜子兒不同。因爲子兒是子加兒的孳生詞，是種子的意思，却沒有脖兒這個詞。闈脖兒這個詞要分析成闈和脖子的脖，名詞後加成分兒是加在闈脖整個兒後頭的。看起來是一個複合詞，因爲整個兒結構的後頭加上詞後坿加成分，就不再是複合詞了，咱們管他叫再複合詞。

小詞是整個仂語或者整個句子的後加成分。比方說，在我住的旅館這句話裡頭，的字加在仂語我住後頭，把我住變成一個詞了。定位字也可以加在整個仂語後頭。比方說，報上的上是報的定位字，我今兒買的報上的上，是我今兒買的報整個仂語的定位字。

己 詞類

二十一 詞類跟字類

常常有人說漢語沒有詞類，同一個詞，在句子裡的位置不同，功用也跟着不同，常引的例子是文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語裡頭，詞的功用變動的範圍，要是不比英語大，也比別的印度歐羅巴語大，不過變動的範圍還是有限制的。比方說，酒後頭決不能加表示動作完成的後加成分了字；表示程度的更（去聲）決不跟數字連在一起；躺着後頭也決不會跟上個賓語。反過來，打的後頭總跟着體詞。換句話說，咱們可以在字典裡頭註明，酒字是名詞，表示程度的更字（去聲）是副詞，躺着是內動詞，打字是外動詞，等等。因爲每個字或者詞的功用照例有一定的範圍，學習的時候，一定得知道那個範圍。

咱們拿語法功用做標準把字或者詞分分類，就得到字類詞類。例如：名詞後加成分，外動詞，體詞結構。在這一大節裡頭，咱們討論詞類跟一些黏坿字的字類。

（李 榮譯）　　（全文未完）

·附 注·

註六 方向補足語 有些表示動作的動詞常常念輕聲，擱在別的動詞後頭表示方向，例如拿來，拿去，出來，進來，進去，起來（北方官話沒有起去）。

主要動詞加方向補足語可以擱在別的主要動詞後頭，當作複合方向補足語用，好像拿起來，拿出去，飛起來。

註七 可能補足語 主要動詞加補足語造成複合動詞，要對這種動詞表示「能够」或是「不能」的意思，通常的說法是在當間兒加得字或不字。例如：看得見；看不見。聽得懂；聽不懂。

學術講座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中）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在中國新法學研究會上的講演——

蘇聯法學專家 Н·Г·蘇達里可夫

還是相對的進步階級，並帶來了新的較高的生產方式以代替落後的、衰退的、封建的生產方式的時候，也會經提出過認識國家與法律之眞正本質的任務。但是就連他們這些鷄羣之鶴在關於階級社會這些複雜現象之本質問題上，歸根到底，也還是得出了錯誤的不科學的結論。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利用了錯誤的科學研究方法。

儘管資產階級法律科學裡有着各種不同的派別，但歸根結底，所有他們都是一些唯心主義者，而在研究的方法上說，則都是些形式主義教條主義者。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那種武斷，說什麼國家和法律的現象似乎是那樣特殊，而和其他現象有那樣截然的區別，以至於對於它們（亦卽對於它們的研究）應該建立一種特別的，專門的法律方法。德國反動的法學理論家斯坦穆爾與吉爾克都十分明顯地表現出這種觀點。其他資產階級理論家在這個方向上大大地越過了斯坦穆爾與吉爾克，他們認爲國家與法律之間，有着某些不同之點，而這些不同點對於研究國家與法律，也要求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所以對於研究國家應當用這一種方法，而研究法律則應用另一種方法。

另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表面上不强調對於法律與國家有建立特別認識方法的必要，而利用其他各種方法的片斷例如：形而上學的，比較的，注釋的等等方法。

方法論上的多元論，乃是資產階級科學弱點的絕對象徵，是表示它無力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完整的方法論體系。

我們現在來簡略地研究一下資產階級法律科學所利用的許多方法的基本特點一般地是怎樣的。因爲我們不能夠個別地去研究資產階級法律學者所利用的每一種方法。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方法論上的根本缺點

資產階級法學是建築在根本有缺點的方法論的基礎上，這種有缺點的方法論基礎是早已註定它對國家與法律問題的闡明是要陷入歪曲和曲解的。

科學的認識方法究竟是什麼呢？

科學的認識方法這是研究的工具，或者是用以研究某種物象或現象的方法之總和。

正確確立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的。但是即使把科學研究的對象正確地確立起來了，這還不能說是科學已走上正確的道路。研究的對象或客體一經確立，接着就必須正確解決研究方法的問題。

資產階級法律科學無論在規定科學研究的對象上，或是在規定科學研究的方法上，其立場都是錯誤的。

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的理論家，都是把法律看成經國家規定的和表現全體意志的規範之總和，從這樣的法律觀出發，他們就認爲法律科學的客體或對象是脫離現實的，並且也是沒有內容的法律規範。

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理論家都是僅從國家的外形來研究國家，既不揭露它的本質，而又只限於各種的管理形式：共和制的或君主制的。

研究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和法律學說的學者既然是這樣去理解國家，並把它的本質僅只歸結到各種政治形式上去，所以他們就認爲法律科學的研究對象、或正確一點說國家科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各式各樣的管理形式。在這種場合，我們又可以看到對於科學對象的確立是表面的、形式的。

資產階級科學的個別代表者，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當資產階級

（一）第一個特點，就是資產階級法律科學所利用的任何一種方法，都是直接或間接從否認有徹底認識國家與法律之本質的可能上出發的。資產階級的不可知論（卽否認有認識世界本質的可能）的鼻祖就是德國的哲學家康德，他的觀點曾經現代資產階級科學的許多代表，就是所謂新康德學派，加以發展和繼續。康德本人及其現代的繼起者，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從那一點出發的，就是說，現象的本質是完全不能認識的，而所能認識到的，則僅是本質的外部表現。

康德學派說，法律是特殊的自在之物，它的本質是不可知的。這種公開表示認識法律本質是不可能的說法，對於現在反動的美國法學家來說，乃是一個極其合適的屏障，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要來掩蓋法律底本質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宣稱法律本質完全是不可知的最適當的辦法。不久以前，在一九四一年，美國教授彼特爾遜在其所著的一篇論文裡，公然宣稱：「人們受法律保障的利益是極其多種多樣的，因此，要確切地來研究和確定法律底社會職能，是不可能的」。

而這是一個自稱爲科學界中的人所宣佈的，而且他並不是生活在中世紀，而且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今天，生活在正當科學擺脫任何帝國主義的羈絆而可能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大踏步前進的時候。

這些主張和馬列主義底令人鼓舞的原則比較起來，是顯得多麼貧乏呀，因爲馬列主義是從人類認識底無限能力爲出發點的，並且絕對否認有爲人所不能研究與認識的現象和物象。

馬克思主義當然不否認暫時還有沒有認識到的物象或現象，但是它們（物象或現象）是能够並且將要被認識到的。至於談到國家與法律底本質，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早就已經把它們揭示出來，並認識到了的，而要是科學是眞正的而不虛假的話，那麼這些現象對於它來說，就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了。

爲什麼美國反動派要證明國家與法律的不可知性呢？

其所以要這樣，就是爲了要找到一種新的辦法、新的出路來對於人民大衆掩蓋那種不可爭辯的事實，就是現在美國的國家和法律乃是在一小撮富豪們手中的順從的工具。

（二）資產階級的方法論，在研究國家與法律上的第二個特點是與第一個特點密切地聯系着的，這就是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是意味着偏重形式，企圖在某種現象上賦予形式而不是賦予內容以決定的意義，它不願意也沒有能力來發現在每一個形式後邊的內容，本質和實體。對於那些在觀察現象時，首先以其形式出發的人們來說——內容是沒有什麼的，而形式便是一切，這些人們對於一些問題的看法不禁令人想起一個著名的公式「任世界毀滅，願正義永存」，而他們所了解的正義本身就是他們所專有的正義，就是從他們的觀點上來看的正義。

形式主義是那樣深深地滲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國家——法律關係裡，因而使法律世界觀就成了資產階級古典的世界觀。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學者研究社會現象時都是通過染有法律色彩的眼鏡來看一切的，都是從法律形式的觀點來判斷每一個社會現象的。

例如：在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學者看來，買賣勞動力的契約（或僱主與工人間的勞動契約）乃是兩個「平等的」權利主體的契約，因爲他們每一方都有權利和義務。其實這種契約按其內容而不是按其形式來說，正是在社會上佔有完全不同地位的人們底契約。參加這個契約的一方面，是沒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從而也是沒有生活資料的人；而另一方面，卽僱主這一方面則是佔有一切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所以也就是佔有一切生活資料的人。對於一方面來說，這個契約所追求的是利潤，而對於另一方面這個契約乃是意味着慘痛疲憊的勞動，而勞動所得來的微薄工資，則與其在勞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價值是遠不相符的。

在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學者看來，法院乃是公正無私地將一切證據拿來放在公平審判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並據此而對有罪人決定刑罰的機關。但須知道：這只是問題的外部形式的一方面，因爲法院向來就是並且現在還是掌握在一定的階級手中用來箝制其階級敵人的工具。

在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學者看來，議會制的國家政權形式，乃是全體意志的體現，並且是最完善的國家形式。可是，眞正的科學不能僅限於問題的形式這一方面，還要觀察其主要的、基本的和最實質的一方面，也就是要觀察在這議會制共和國裡的政權，是屬於什麼階級？所宣佈的那些權利究竟實現了多少？以及這個議會在實質上對千百萬民衆的利益反映了多少？

在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學者看來，多黨的選舉制度的存在，就已經是這個制度底民主性的不能駁倒的證據。可是，有很多生動的例子告訴我們，只是有幾個黨的存在，只是各黨有幾個候選人參加選舉，還沒有理由就認定說這些選舉是眞正民主的。我們就拿美國爲例來說。在美國很久就佔有統治地位的是兩

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即共和黨和民主黨。這些黨派之間，在選舉時似乎發生着鬥爭，兩黨對於總統職位也都提出各種不同的候選人。但大家不是早就已清清楚楚的嗎（當然不是指一切人而言），這些黨派之間實質上是並沒有差別的，有的只是名稱之差別而已，這兩黨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實質上也沒有任何差別，他們都是反映美國帝國主義集團底利益的。保留兩黨的制度，乃是這樣一個極其巧妙的手段：就是無論那一黨，在選舉上獲得勝利，而在總統職位上或在國會裡，總是會有人永遠地並在一切場合來給華爾街効勞的。

在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學者看來，在許多資產階級憲法裡所宣佈的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乃是資產階級制度底正義性的不能駁倒的證據。由眞正科學的見地來說，承認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還是不能說明任何東西，這只是問題的表面，還要深刻地從實質上去分析究竟享用這些權利的實際可能是保證了多少，以及有沒有那些使千百萬羣衆能够實際享用賦與他們的權利的物質前提。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個道理。美國的法學家竭盡全力企圖證明在美國每一公民都有可能去參加總統的選舉。就令相信他們，並假定在美國的確在選舉總統時都可以參加投票（雖然事實上在美國對於黑人，對於沒有一定的財產上資格和居住年限資格等等的人，是有着很多選舉權上的形式限制），那末爲什麼許多年內參加選舉總統的人數，通常是超不過具有形式上參與投票權的公民總數百分之五十至五十五呢，這是事實，請問這些先生們用什麼能够把它來解釋一下呢？這個極其顯明的而且無可爭議的數字（因爲它發表在關於選舉結果的美國報導中）是說明什麼呢？它是說明所謂普遍的選舉權，在美國乃是一種空洞的形式，乃是對民衆的一種欺騙，是對世界輿論的一種欺騙。難道可以不看到在外部的形式後面所實際存在着的完全相反的一面嗎？

馬列主義的國家與法律科學並不否認形式是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第一次指出了並證明了形式對於內容不是被動的，它是在表現和構成內容，它在一定條件下對於內容具有起着積極反作用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從來也不是只局限於形式，在他們看來，內容也是很重要的，因爲內容是最終決定形式的。在形式與內容之辯證的統一上，內容是起決定作用的。

資產階級方法論在研究國家與法律上的第三個特點乃是教條主義（由法律的「教條」二字而來）。

教條主義的表現，是在於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將法律的任務只是歸結於法律規範的註釋、分類和分組。教條主義和教條主義者的特點，就是他們所依據的，只是現行的法律規範（就是僅根據現有的法律教條），在他們看來，法學的全部意義也就是包含在法律規範裡面。按他們的意見，法學是應該去分晰個別法律規範外部的相似和不同之點，應該把它們和其他國家裡所頒行的類似的法律規範來加以比較。教條主義對於那些像具體歷史環境，像法律規範所由產生並決定其內容的條件等等極其重要的因素，却是漠不關心的。在教條主義者看來，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是法律「技術」的發展程度，也就是法律規範底敘述和條文化的完備程度，它們的形式邏輯上的相互依存性和相似之點。教條主義者把主要的注意，都放在法律規範和法律「技術」的皮相研究上了。

馬列主義法學絕不否認研究法律規範（就是法律教條）的意義，它承認法律規範的正確規定和分類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研究上的便利來說，但它把這些因素看成不是決定意義的，而是派生的完全從屬於法律規範底內容，完全依地點、時間與條件爲轉移的。

資產階級法學方法論上的根本缺點便是這樣。

這些缺點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使人不可能基於這一個有缺點的方法去得到符合於對眞正科學所要求的結論。根據這種方法所作出的結論使人對於法學研究對象本身得到一個謬誤的歪曲的概念，即對於國家與法律本質得到一個謬誤的概念。

只有根據唯物辯証法才能建立起眞正的國家與法律科學，即能够揭示出國家與法律之起因，它們的發展和運動的規律，闡明它們的內容及其在社會發展中之作用的科學。

馬列主義的科學與多元論的方法，即資產階級科學所利用的衆多的方法是不同的，它在認識的各方面，是利用一個統一的辯証法。辯証法可以應用於所謂精密的科學方面（化學，物理，數學等），應用於自然科學（生物學等）方面，同時也可以應用於社會現象的研究。

馬恩列斯對於辯証法的建立，乃是整個科學發展中的根本轉折點，特別是社會科學發展中的轉折點。只有根據辯証法才能建立眞正的國家與法律科學。辯証法不僅使我們能够正確地去分析和認識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而且也向大家指出了改造社會，改變自然的道路，因此辯証法乃是最革命的方法，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辯証法不僅幫助去認識過去或現在所發生的現象，而且它也能科學地預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並加速其規律結果的到來。

預見，就是多方面估計條件與環境的結果，認識發展趨向的結果。例如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即當德國法西斯大軍雲集於莫斯科附近而我們蘇聯軍隊蒙受了若干暫時的軍事失利的時候，就已經表示出堅決的信心要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軍和消滅德國法西斯主義，儘管它獲得暫時的軍事勝利，但滅亡終究是難免的。後來的全部戰爭進程證明了斯大林同志科學預見的正確性，證明了戰爭進程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暫時的過渡的因素，而是經常發生作用的戰爭因素。斯大林同志關於在共產主義時代如資本主義的包圍還沒有消滅，國家也仍然會保存下來的指示，就是他的偉大的科學發現與預見。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與法律科學所據以建立和發展的辯證的科學認識方法有下列幾個特點：

辯證法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對於一切社會現象是在其密切聯系和相互依存中來加以觀察的。社會現象的聯系和互相依存並不是某種人爲的創造，這個聯系是實際存在於現實的事物之中。科學的任務就是在於正確地發現這個聯系，把它揭示出來並加以認識。

辯證法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它對於一切現象是在其不斷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中去加以觀察的。所以我們在這裡還應當再着重指出，現象的運動、發展與變化不是人爲地從外部加上去的，這是客觀的因素。各現象之間客觀存在的聯系和不斷發生的變化，只有根據辯證法才能加以認識的。

辯證法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它對於一切現象，是在其上升的發展中，在由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由一種質態向另一種較高質態的發展和過渡中來加以觀察的。辯證法的這一特點是表示，特別在政治的活動上永遠不要向後看而要向前看，不要尾隨事變，而要領導羣衆去爲改造世界而奮鬥。

辯證法的第四個特點，就是它指出了每一現象所具有的內在矛盾，而這個矛盾是決定着規律性的和不斷的發展。

馬列主義——科學所據以研究國家和法律基礎的辯證法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如此。

還須指出一個極其重要的情況。

馬克思主義科學從其一產生的時候起，就和生活，和羣衆革命鬥爭的經驗與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發生在革命鬥爭的高漲之中，並隨着經驗的積累，社會發展的實踐而完備起來的。如果說，大多數資產階級理論家是輕蔑地對待經驗，而另一些理論家相反地一味重視經驗，而藐視科學結論和綜合，那末，馬列主義則是第一次表明出科學與實踐是辯證地統一起來的。斯大林同志用下列的話把這個規律性表達出來：「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毛澤東同志在其一九三七年所寫的並於最近在蘇聯報紙上刊載的「實踐論」著作裡，對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相依存性作了特別深刻的描述。毛澤東同志縝密地分析了在歷史發展中實踐與認識的聯系以後，作出如下很重要的結論：「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未完）

（法制委員會編譯室譯，陳漢章校）

學習「實踐論」 新學術小叢書第一種 定價三千二百元

本書包括：毛主席的「實踐論」全文，李達、王學文、郭大力、王亞南、馮友蘭等學習「實踐論」的心得，和對「實踐論」內容的發揮。書末並附有「實踐論」學習提綱。是學習「實踐論」必備的參考書。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新學術小叢書第二種

張志讓・陳翰笙・沈志遠等著

（在排印中，月內出版）

新建設第三卷合訂本 定價二萬五千元

本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學術討論

本欄的增闢，是爲了對各種重要的學術問題，展開自由討論，和培養學術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編者

孔墨底唯心論？唯物論？

楊柳橋

在「新建設」第三卷第六期上，讀了馮友蘭先生的『「實踐論」——馬列主義底發展與中國哲學傳統問題底解決』一文，曾談到孔子與墨子在認識論方面的思想問題，其中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以爲孔子是注重行的。例如他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可見他是以行爲主，而以學爲輔。但是……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他在認識論方面的思想，正如他在別方面的思想，是唯心論的。……他以爲「學」與「行」是對立的。……他所學的，是古來的詩書禮樂，以及典章制度。他注重「聞知」，引伸類推，所以他喜歡顏回「聞一知十」。這就是說，他比較不注重認識底重要的來源，即實踐方面的來源。』

又說：『我們再看孔子底主要反對者，墨子的思想。墨子說：「言有三表」。……這以「本」，「原」，「用」爲主的三表，……第一表、第二表，他肯定認識底來源是聞知與親知。他很重視經驗爲認識底來源。至於第三表，就是以社會的實踐，爲對於認識的考驗底標準。認識既需在實踐中考驗，則認識與實踐就有互相推進底可能。至於認識爲實踐服務，更是墨家底一貫的精神。』

後面他又說：

『墨子是古代的「賤人」，……所以……對於知行關係能有比較正確的看法。』

究竟孔子是不是一個唯心論者，墨子是不是一個唯物論者，究竟他倆誰是「比較正確的看法」，還是值得我們多方考慮的。決不能抓住他們底一兩句話斷章取義地來斷定。

先說孔子。孔子曾說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可見孔子的「學」，不但要「聞知」，而且要「見知」（親知）；他將所「知」的，「擇善而從」，有的「闕疑」，並不見得「認爲就是眞理」；並且他把所「聞知」「見知」的，不但要發之於「言」，而且要見之於「行」。

孔子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敏於事而愼於言」，他也說作「訥於言而敏於行」。可見孔子的「好學」，是包括着「敏於行」的，也就是注重實踐的。看他又說：『文莫（義同忟慔、黽勉，即勉於學。）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見他是嘗怕自己在實踐的工夫不够的。『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這就是孔門中一個注重實踐的好榜樣。並且『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這又是他教人不但要「知」，而且要「行」的。

並且，孔子又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這就是警告人們，只是讀死書，不能聯系到實踐上，是絲毫沒有用的。

尤其使我們注意的孔子的兩句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不但是教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並且教人要學得充實，然後才能「行」「事」（毛詩傳：「仕，事也。」）。「學」是探求認識或理論，而「仕」就是把自己的認識或理論推到實踐。可見孔子教人，要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這是如何的切當！又怎能說他是「不注重實踐方面的來源」，不知道「認識與實踐互相推進」呢？

再說墨子。馮氏援引墨子的「三表」，以說明他「認識爲實踐服務」的「一貫精神」。（「三表」亦作「三法」。兩字古文形似致誤，應以「法」爲正。）

我們看看墨子的「兼愛」，「非命」，「節用」，「節葬」……，都好像是站在「賤人」的立場來立論，但是他底基本論點（本之者）就不見得正確。

他所謂「本之者」，不但要「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非命上、下），而且要「考之天鬼之志」（非命中）。他底認識就大大有問題了。

墨子是承認天意與鬼神的存在的。他底基本論點是建築在天意之上。他底法儀篇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明久而不衰，故聖人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在天志上篇他又教人『所祈福於天』，『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並且他說禹、湯、文、武底得賞，都是由於『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而桀、紂、幽、厲底得罰，都是由於『上詬天，中誣鬼神，下賤人』。他最後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簡直是痴人說夢！

他底明鬼篇，更是些望風捉影、索隱行怪之談了。他以爲：『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可不明察『鬼神有無之別』。他還用盡一切方法證明鬼神是存在的。

他說：『舉天下之所以察知有無之道者，必以衆人耳目之實，知有與無爲儀者也。誠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下面便歷舉些古人「活見鬼」的例子。這些是不是「衆人耳目之實」？是不攻而破的。他恐怕人還不相信，又舉了些『三代聖王』和『周書大雅』的說鬼；其實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

總之，墨子要「人」的行爲，以「天」與「鬼神」爲法儀。他底「本」，已建築在渺茫的基礎上，無論怎樣「原」，怎樣「用」，恐怕是不會合乎客觀實際的。

那末，孔子是否就是一個唯心論者，而墨子是否就是一個唯物論者？我現在沒有結論，仍請馮先生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九五一·三·二十五於天津市第三中學。

答楊柳橋先生

馮友蘭

楊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值得討論的。我向來反對『抓住一兩句話，斷章取義地來斷定。』但是爲說明對於孔墨的看法，總不免要引一兩句來作爲例證。楊先生也是如此。爲避免有『斷章取義』底嫌疑，我們只就哲學史上的事實來說。孔子是個儒。儒的職業是研究古代典籍，傳授古代文化。所以孔子『好古』。『好古』則注重『聞』，是很自然的事。論語於『多聞』之外，還提到『多見』。可是『見』的是甚麼？還是古代典籍，或是禮樂之類，並不是與自然界或社會的基礎直接接觸。所以我說：『他（孔子）比較不注重認識底最重要的來源；即實踐方面的來源。』特意加上『比較』二字，意思是說：與墨子比較起來是如此。

孔子注重道德方面的行，我在我那篇文章裏，是承認的，不過以爲注重實踐的哲學，主要有四點，而此不過是其中的一點。楊先生所引的許多論語上的話，就是證明這一點。這一點本來是不成問題的。

楊先生引『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訓『仕』爲『事』，以證明『孔子教人，要在實踐中學習，學習中實踐。』可是爲甚麼要訓『仕』爲『事』呢？論語中『仕』字不少，如果別的『仕』不訓爲『事』，而這個『仕』要訓爲『事』，必得說出個道理。即令這個『仕』可以訓爲『事』，這句話的意思，也只是說：『事情作好了，就去學習。學習好了，就去作事』。仍是以學習與作事對立，並不是『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

墨子底三表，『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是平列的。『本之』就是『言有所本』的意思。並不是以『本之』爲基本論點。這三表是一個明確的方法論，而且注重實踐，這是不成問題的。至於由此而得到天志明鬼底結論，那是他受時代底限制。我們若拿現在的標準去批評他，那就不合乎歷史主義了。他主張天志，是唯心論，孔子信天命，也是唯心論。我那篇文章只是就認識論說，說孔子底認識論是唯心論的認識論，墨子底認識論是唯物論的認識論。怎樣是唯心論的認識論，怎樣是唯物論的認識論，我在那篇文章開始時已經說明了的。

費爾巴哈底唯物論，還是下半截唯物，上半截唯心。我們若希望二千年前的墨子，就有完全的唯物論，那末免太苛求一點吧。

關於公共收入和租稅的發生

任林圃

看了周伯棣先生「人民租稅綜論」（新建設三卷五期）以後，筆者認爲有兩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因此寫出個人的意見，並請周先生及對此問題有研究的先生們給予指正。

在周先生原文第一節「租稅的地位與使命」當中，有着如左的說明：

「租稅在公共收入中的地位，是跟着時代而不同的，在封建時代以前，無所謂租稅，到了封建時代才有租稅發生，然租稅在封建時代的形式與地位，顯與後世不同……」（着重點係筆者所加）。

對此，我們有一個最要緊的問題，即奴隸社會——即周先生所謂封建社會以前，是否有租稅的問題。

馬列主義對租稅的觀點是與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分不開的，租稅與國家是有着密切聯系的東西。

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當中，對這問題有着精闢的說明。在該書第九章野蠻與文明中，恩格斯寫道：「（國家的）第二個特點是社會權力底創設，這種社會權力跟把自身組織爲武裝力量的居民已經不直接符合一致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爲居民底自動的武裝組織，自從分裂爲階級以來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了。奴隸也算在居民以內：九〇、〇〇〇的雅典居民，對於三六五、〇〇〇的奴隸，不過構成一種特權階級，雅典民主主義底人民軍，則是一種貴族的武裝力量，用以壓迫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並爲了壓制公民，則憲兵也成爲必要的了，這種社會權力，在每個國家裏面都是存在着的；它不僅是由武裝的人來構成的，而且是物質的附屬物——監獄及各種强制機關——這些都是爲氏族社會所沒有的——來構成的。這一權力，在階級矛盾尚未發達的社會及遼遠的地域里面，或許是極其微小的，幾乎是有若無的，如有時在美國某地所見者，但隨着國家內階級矛盾的加劇，並隨着相隣各國的日益强大與人口日益稠密。它也加强了。你試把我們的近代歐羅巴瞧一下吧，在這里

階級鬥爭及侵略底戰爭，已使社會權力像螺旋一樣，扭至高卻，以致它有吞滅全社會乃至國家之感了。為供養這種社會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捐稅了。捐稅是為氏族社會所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今日我們卻十分明白它了，隨着文明底發展，稅捐甚至不夠了，因此國家舉行期票，舉借債款即公債了。歐羅巴老太婆關於這可以滔滔不絕的說出好多來。

官吏當掌握着社會權力及徵稅的權力，如今當作社會機關而高居於社會之上了」。（張譯本一八六頁）。

恩格斯在這裏說明一個問題，即租稅的起源與國家的起源是同古的，在國家以崩潰的氏族社會廢墟上產生出來的時候，其本身便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統治階級——古代的奴隸主，便要通過社會權力來鎮壓對立的階級，從而，就需要着供養這些社會權力機關的租稅。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當不同的剝削階級掌握着國家機器的時候，他為了鎮壓被剝削者的反抗，要徵取「租稅」來供養這些權力機關，因而，那時的「租稅」是供給了剝削階級供養權力機關之用的，而這些權力機關是為統治剝削階級服務的，它與被剝削的勞苦大衆的利益是完全違背的。因而，周先生所謂租稅是「公共收入」一點，是有些問題的，對此，似乎應該揭穿它在「公共收入」背後的實質，而從它的發生和所起的作用上去了解，那末它在剝削階級佔統治的時代就不能說它是「公共收入」。這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租稅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租稅」是在本質上完全不同的。

其次，周先生所說：「在封建時代以前，無所謂租稅」，筆者對此也難於同意，因為，如上面所已經說過的，租稅的起源與國家的起源是同古的，從氏族社會崩潰後，國家代之而興的時候起，就需要有供養國家權力機關的租稅了。如果說封建社會以前沒有租稅，或無所謂租稅，那末就等於否認了奴隸社會中租稅的存在，但奴隸社會是有國家的，無論君主的，共和的，也是有國家權力機關的，如果沒有租稅，那末，將用什麼來供養這批統治階級呢？這里僅就恩格斯所述關於羅馬時代的徵稅事實，舉例說明如下：

「在帝王時代的羅馬，租稅和兵役都是存在的，即使新來的移民——他們並不構成原有羅馬民族的一部份，他們人格上是自由人，得佔有土地財產，並須納稅和服兵役，但不能担任任何官職。……在羅馬滅亡以前：羅馬變成了一架龐大的複雜機器，專用以榨取臣民的膏血了，稅捐，國役及各種賦役，使大批居民陷入窮困的深淵，總督、收稅吏及兵士底勒索威逼，更加強了這一「壓迫」。

基於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認為租稅是發生於奴隸社會，而不是「封建時代才有」的。

一九五一年　安東

答任林圃先生

周伯棣

任林圃先生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是極有興趣，同時也是極有價值的問題。只是筆者對于社會史與財政史的研究，過于淺陋，所以不能有所貢獻，在這里只提出若干的說明。

筆者是依據財政類型的說法，而說到封建時代以前沒有租稅，自然是過于粗略了。因為照財政類型的說法，第一個是公產經濟的類型，即國家的重要收入來自公產，第二個是特權收入的經濟，即國家于公產經濟之外，還利用王權(特許權)產生收入。第三個是租稅經濟，這才以租稅為國家之重要收入。至社會主義財政，又屬于另一類型。正如在租稅經濟的時代還有公產經濟的殘留，在公產經濟的時代亦早有租稅的存在（濫觴）。不過就主觀來講，是可以這樣劃分的。

筆者知道雅典的收入有貢輸(Tributes)，公產 (Public Domains)，關稅與內地稅(Customs and excise duties)，市稅 (market dues)，貨物裝運稅(duties on cargoes)，罰款與司法規費 (fines and legal fees)，奴隸稅 (a tax on slaves)，財產特別累進稅 (a special graduated tax on property)及其他。在羅馬時代的收入，有公地 (public lands)，獨佔事業 (monopolies)，關稅 (Customs)，地稅 (the land tax)，交易稅 (taxes on Sales)，遺產稅(inheritance tax)，奴隸購買稅 (Taxes on the purchase of slaves)。自然，羅馬的租稅更較希臘為發達，但其重要的收入，恐均不在於租稅。因為羅馬財富之發掘，非由于勳，乃由於劍，故人民尚武勇，輕勞働。戰爭勝利，掠奪之物(booty)足以富國，而臣民的貢輸(tribute)亦成為大宗收入，此外又輔之以兵役與力役。至于其他收入 (包括租稅)，還都是次要，甚至于不甚重要的。故雅典居民視納稅為恥辱，(disgrace) 這種恥辱，只有在非常的時期才堪忍受。這也可以想見租稅在彼時的地位。但無論如何，租稅在彼時已經存在，當為事實。所以在奴隸社會，可以有租稅，『在封建時代以前無所謂租稅』自覺言之失當。至於說『到了封建時代才有租稅發生』，這句話，自更覺錯誤了。

此外「公共收入」一詞，在階級國家時代，自然也有其階級性。號稱『公共收入』，實際是說不上多數人民的公共收入，而只是少數統治階級的『公共收入』，那是自然的道理。

一九五一・三・二〇

研究古代中朝關係的一個新證據

常元敬

最近看到周一良先生在新建設及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有關中朝歷史文化關係的兩篇文章，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周先生引證了很多材料，說明中朝兩大民族的悠久歷史關係；現在正是兩大民族以無比堅強的團結，負担着反抗美帝

侵略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偉大歷史任務，周先生的文章是值得一讀的。過去研究歷史的人，對於中國古代與朝鮮的關係問題，祇提到過傳說中的箕子和史記裏記載漢初燕人衛滿逐朝鮮王箕準自立兩事，周先生雖徧引博徵，但也沒有找到別的材料（當然指的是書本上）。這裏偶然憶及王符潛夫論上有一條可以提供周先生作爲參考，當然希望周先生能予指教。

詩大雅韓弈『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玄孔穎達箋疏：『燕安也。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完築。』這顯然是鄭玄孔穎達都覺得燕韓——封在今陝西韓城的韓相距至遙，近在豐鎬肘腋的韓城，如何能爲燕師所完，故不得不曲爲之解。但我們再看一看韓弈通篇內容：(一)其土地則川澤訏訏，其物產則魴鱮麀鹿熊羆貓虎之屬，皆與今韓城一帶的地理環境不類。獻其貔皮赤豹黃羆，陸璣詩草木蟲魚疏解貔爲遼東人謂之白羆。(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長爲追貊，奄有北國，以爲之伯。這又是什麼意思？我們顯然可以看出韓決不是封今韓城的韓，然則韓弈所指到底是那個韓呢？陳奐詩毛氏傳疏謂周有二韓，一爲姬姓之韓（左襄二十九年，叔侯曰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所指的韓，即是姬姓之韓）。一爲武穆之韓（左僖二十四年，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所指的韓，即是武穆之韓），姬性之韓，當受封於武王之世，其後爲晉所滅，以賜大夫韓萬。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河北縣有韓亭，即姬姓韓國地。武穆之韓，封自成王之世，至西周之季尙存，其國在禹貢冀州之北，故得總領追貊北國。酈道元水經注聖水篇聖水東經方城縣故城，又東南經韓城東，詩韓弈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賜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括地志云：『方城縣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今直隸順天府固安縣南十五里）。則韓城實在燕國之南，同在周幽州域內。所謂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就毫無疑問指的是燕國之師，並不是什麼燕安之義。鄭箋毛詩，杜注左傳，韋注國語，皆誤以武穆之韓與姬姓之韓合而爲一。以致牽強附會，漏洞百出，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了。及讀王符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志氏姓篇）。這是研究中朝關係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材料，從而知道漢時半島上的三韓，與此不無關係。我們中朝兩大民族的歷史文化關係，實在是源遠流長。當然啦，過去的「成文歷史」，祇留下一些統治階級的名號，要知道在這下面還掩蓋着不少我們人民之間的頻繁接觸與深厚友誼。今天抗美援朝，就應該充分瞭解我們與朝鮮之間曾經有過如周先生所說那樣悠久而親密的關係。

敬答讀者

爲了廣泛地徵求讀者的意見，我們在三卷六期中，曾附有一張「讀者意見表」。這兩個月來，承蒙各地讀者給我們提了許多賽貴的意見，在這裏，我們應該首先向讀者致謝。

對於這樣的一個學術性的刊物，大家一致指出，在今天是很需要的，並對它寄予了極大的希望，這使得我們十分感奮，但也十分惶恐。因爲，我們編輯部的人力非常有限，深恐有負讀者的期望。不過，在讀者的愛護、指導和勉勵之下，我們一定要竭盡全力，以求進步。

總結讀者意見，對於過去六期（三卷一期至六期），認爲比較滿意的，有下列幾點：(一) 出刊了「抗美援朝」和「學習實踐論」兩特輯；(二) 批判了一些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說；(三) 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的座談記錄；(四) 初步展開了學術討論；(五) 經常評介重要的學術著作。

其次，讀者認爲我們做得不够，甚至認爲缺點的，有下列幾方面：(一) 文字不够通俗；(二) 與時事的結合不够密切；(三) 哲、史的文章所佔篇幅較多，政法、財經和文藝理論的文章發表得較少；(四) 長文太多，短篇較少；(五) 校對還不够認眞；(六) 發行工作做得不够好。

對於這幾點，我們經過檢討，認爲讀者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準備逐漸改進，有的已經在改進了。本刊既爲學術性的綜合月刊，它有一定的讀者對象，在內容上，自應與其他刊物有所分工，這一點，是希望讀者鑒諒的。我們今後當儘可能使文字寫得深入淺出與結合實際，儘可能組織一部分政法、財經、語文、和文藝理論方面的文稿。對於二萬字以上的長稿，也設法另出單印本。此外，我們要加强內部的校對工作，並轉請和協同新華書店把發行工作做得更好。

對於讀者建議增闢的新欄，如「新書介紹」、「學術劄記」、「哲學名著評介」、「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指導」、「蘇聯學術介紹」、「中國革命理論研究」、「讀書會」等欄，我們也正在考慮中，如條件許可，我們是會把它逐步實現的。讀者提出的許多問題，我們當分別函答或將答案在本刊發表。

有些讀者要求我們把月刊改爲半月刊，也有要求增加篇幅和插圖，我們一面限於人力，一面又照顧到讀者的經濟負担，決定暫時不予更改。

編者　一九五一・四・廿三。

譯文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定義

Д·И·戚斯諾科夫作
沈志遠譯

本文作者戚斯諾科夫教授是蘇聯「哲學問題」雜誌的主編人，去年曾偕法學博士阿斯凱洛夫教授來我國講學兩月，給我國學術思想界及一般知識青年羣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篇文章是戚教授回國後寫的，原文總題目是『馬列主義論基礎與上層建築』，全文譯出來共有三萬字，本文祇譯了原文的第一節，已有六七千字。這篇文章刊載在最新出版（一九五一年一月底出版，二月底才寄到中國）的「哲學問題」第三期上，它之所以可貴，因爲是歷史唯物論中這一基本問題之斯大林階段的高度發揮，裡面非常深刻而且全面地闡揚了斯大林階段的歷史唯物論關於這一問題的各種觀點。

——譯者

斯大林同志的新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出版，是黨的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著作，豐富了並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斯大林同志在這一著作中提供了關於語言的馬克思主義的完整學說，並且闡揚了馬克斯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重要原理。斯大林同志發展並改進着我們的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他教導我們在同實踐不可分離的聯系中，去考察和解决理論問題，教導我們用創造的態度對待科學。

斯大林同志無情地揭露並粉碎了教條主義者，這些教條主義者不追求事物的本質，只是形式地、不顧歷史條件地援引文句。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不承認自已是對一切時期都適用的、一成不變的結論與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者的敵人。

斯大林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理論的發展，具有極大的理論上和革命實踐上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確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决定着社會的經濟制度，後者又决定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馬克思·恩格斯發見了歷史發展的法則，並給予無產階級以無可代替的思想武器，無產階級藉助於這一武器而獲得勝利。馬、恩、列、斯粉碎了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者和單純化者以及一切面貌的機會主義者，並確定了上層建築在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意義。斯大林指出，沒有新的政治思想和與它相適應的革命組織與制度，就不能解决業已成熟的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任務。

在我們的時代，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是建設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新的革命政權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者的羣衆組織，是改革全部社會生活制度的有力武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勞動者的羣衆組織，是同資產階級的基礎與帝國主義的上層建築作鬥爭、同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和戰爭作鬥爭的有力武器。沒有這種武器，就不能保衛和平與民主，就不能爲社會主義而鬥爭。

在這些條件之下，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馬列主義理論的意義，是更爲增加了。

在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中，根據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總結，首先根據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和蘇聯人民爲共產主義而鬥爭的經驗，把歷史唯物論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原理，發展並提高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

× × ×

在社會物質生活諸條件之體系中，决定整個社會的面貌、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由一種制度到另一種制度的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規定着一般的社會、政治和精神的生活過程。不是人類的意識决定他們的存在，而相反地，是他們的社會存在决定他們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七頁）。

斯大林教導我們說『社會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那末社會本身，基本上也

是什麼樣的，它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制度，也是什麼樣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五一頁）。

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力與人們在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中所實現的生產關係相統一的體現。

人們的生產關係是必然地且不依賴人們的意志，並適應着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而形成的，這些生產關係形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實在的基礎，在它上面建立着社會的上層建築。

基礎包括着人們的生產諸關係，他們的各種經濟關係，基礎在經濟上服務於社會。基礎，作爲生產諸關係的總合，作爲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社會生產的一方面，是生產方式的一方面。生產方式還包括着另外一方面——即物質的生產力。因此，不應當把基礎等同於生產方式，後者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體。

同時，應該指出，不許可將基礎跟社會生產力分割開來；不要忘記，生產關係是決定於生產力的。誰要是企圖把基礎跟生產力分割開來，或者是在分析過程中把它從生產力中抽出來，他就不可避免地站到唯心論的立場上去了。誰要是把生產力包括到基礎中去，誰也是犯了錯誤，因爲在這種場合，就是企圖用生產力的水平來直接解釋上層建築的性質了。

然而，生產力永遠不是直接決定上層建築的，斯大林教導我們，上層建築「與生產的關係只是間接的，是通過經濟的媒介，通過基礎的媒介的。因此，上層建築不是立刻地，直接地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是在基礎發生變化以後，通過生產的變化在基礎變化上的屈折表現而反映着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十一頁）。

必須嚴格堅持馬，恩，列，斯所給的關於基礎的典型定義。基礎是適應着一定發展階段中的生產力的生產諸關係的總合。斯大林同志說，『基礎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中的經濟結構』（同前書，第五頁）。這一定義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生產方式（這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之決定作用的命題出發的。它從下面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出發：即生產中的變化應該表現於生產諸關係上，然後引起社會思想中、理論中和整個上層建築中的一定變化。最後，這一定義亦從下面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出發：即社會思想是在社會現存基礎與社會生產力的相互關係中反映着這一基礎，反映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適應或不相適應的事實。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分析那成爲社會革命之基礎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時寫道：『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或遲或早地要發生全部巨大上層建築的變革。在研究這些變革的時候，必須常常把物質的、能以自然科學的正確性而被確定的、生產的經濟條件上的變革，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變革，簡言之，即同意識形態的變革，區分開來；人們在意識形態中意識到這種衝突，並且同它作鬥爭。正如，對於某一個別的人，我們不能根據他本人關於自己的想法來評斷他，同樣地，我們也不能依據時代意識來評斷類似的變革時代。相反地，這種意識必須由物質生活的矛盾，由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現存的衝突來說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七——八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稱呼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方式間的衝突的理論反映，這種衝突証明着新的生產關係出現的物質條件已經成熟了。

在社會的經濟基礎上，建築着反映這一基礎並服務於這一基礎的上層建築。『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制度是眞實的基礎，這種基礎的特質歸根到底說明着全部上層建築，後者是由法律的和政治的各種制度，加上每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宗教、哲學及其他各種思想之總合所構成的。』（『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十六頁）。上層建築是各種社會思想及其相適應的組織與制度的綜合，這些組織與制度是現有的基礎所引起的。斯大林同志寫道：『上層建築是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藝術的和哲學的社會思想，及其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及其他的各種制度。

一切基礎都有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的、法律的和其他的思想，及其相適應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它自己的。假如基礎改變了或消滅了，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將隨之而改變和消滅；假如新的基礎產生了，那末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亦將隨之而產生』（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五——六頁）。

因此，上層建築首先是各種社會思想和理論的一定體系。

列寧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觀的特點時寫道：『他們的基本思想……是在於把社會諸關係劃分爲物質的和思想的兩種。後者只是前者的上層建築，是越過人們的意志和意識而形成的，作爲（結果）人們維持生存的活動的形式

」（『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三三——一三四頁）。

自然，在建立於生產手段私有制之上的社會中，社會思想和理論都是爲私有財產和剝削辯護的，是表現統治階級的利益的。

大家都知道，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在不完全佔有生產勞動者的情形下佔有生產手段。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它的基礎，反映於那些在社會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政治、法律及其他的思想中。

封建貴族的思想家維護着封建的私有制、農奴制的『合法性』以及其他被壓迫者對於剝削者的人身從屬形式的『合法性』，身份區別和貴族的身份特權的必然性；他們論証着集權或分權的君主制的原則，一定的宗教觀念和倫理觀念等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而不佔有生產的勞動者——僱傭勞動者，資本家不能殺害他們，不能出賣他們，因爲他們沒有人身的從屬關係，但是他們被剝奪了生產手段，而且爲了免於餓死，他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且揹起剝削的重荷」（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五六頁）。

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由資本主義的基礎所產生的政治和法律的觀點，辯護着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企業主的倡導權，論証着爲實現僱傭奴隸制的目的而有實施人們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的必要，宣傳着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等等。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當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已經成熟的時候，當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力量開始超過帝國主義的反動力量的時候，當資本主義的社會，因而，資本主義的基礎接近其最後崩潰的時候，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法律的見解中，就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照舊維護和辯護着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企業主的倡導權，論証着資產階級國家同壟斷資本融合的合理性，因爲這種融合實際上意味着國家直接隸屬於壟斷資本，意味着壟斷資本家直接而公然地指揮議會或政府，諸如此類等等。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這一時期發動了反對在資本主義壟斷前期所承認過和讚美過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進軍，論証和辯護着法西斯主義，宣傳着爲了世界反動力量的聯合和爲替妄圖奪取世界霸權的美帝國主義者的擴張創造條件而放棄國家主權的必要性。

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是統治的生產方式的負持者，統治階級的思想反映着社會的經濟制度並成爲爲維持這一制度而鬥爭的武器。但是統治階級的社會觀點——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被他們散佈到一切社會階層中去了。『共產黨宣言』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社會中具有統治力量的思想，因爲在物質財富的生產領域內佔統治地位的階級，不能不在思想的生產領域內也實行統治。被壓迫階級的成長中的意識形態，應該爲了爭取對本階級的影響，而堅持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作酷烈的鬥爭。只要回憶一下就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爲了爭取工人階級，揭露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並且爲了把勞動者的思想從它（反動思想——譯者）的腐敗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曾經得、現在還得同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何等酷烈的鬥爭。這就是同舊的上層建築進行鬥爭的困難之一，舊的上層建築是維護舊基礎的武器，是維護舊統治階級利益的武器。

但是社會觀點、理論、思想只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不僅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倫理、美學和宗教等觀點，而且那適應着這一切的各種制度，也是屬於上層建築的。在階級社會中，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國家和法律，以及社會、政治組織的整個體系——政黨、各種團體和協會，都是適應着政治和法律的觀點的，各種宗教團體，首先是教會團體，是與宗教觀點相適應的。體現於文學和藝術作品中的美術與美學的觀點，是由一定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戲院、報紙、電影院、廣播電台等等，來進行宣傳的。哲學和倫理的觀點，情形也是一樣，這些觀點有着適應於它們的雜誌和社團。應當强調指出，這些制度和組織都是彼此緊密聯系着的，而且其中的每一個都在宣傳和散佈統治階級的一切觀點——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美術的等等。

在一種基礎被另一種基礎所代替的時候，自然，不僅是各種社會觀點，就連適應着它們的各種制度，都是要跟着改變的。例如，由封建的基礎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君主制和等級制就讓位於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限制教會的政權並取消皇室僧團；適應於資本主義基礎的資產階級社會組織代替了封建的社團、政黨成立起來了；出版事業、廣播事業、資本主義的報紙等都達到了很大的規模。

這樣看來，上層建築是種種一定的社會觀點及與之相適應的各種組織與制度的統一體。凡是當產生一定上層建築的那個基礎是敵對性的，而且是以酷烈的階級鬥爭爲其特徵時，那麼上層建築就帶有嚴格的階級性。它變成統治階級手中用來壓服被壓迫階級的武器。被壓迫階級如果不破壞與舊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話，他們就不能免於奴役、不能消滅舊基礎。

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我們所面對着的是同一類型的

生產關係，因而也就是同一類型的上層建築。但是應當記住，每一個敵對性的社會經濟形態，各有其發生和衰落的時期。與此相適應，基礎和上層建築在同一種社會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上，都有着一些特殊之點。例如，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整個時期內，它的基礎，基本上，即從人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上講，始終是一樣的。但是在其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它跟生產力有不同的關係（在一種場合，它基本上適應着生產力並刺激其發展，在另外一種場合——不適應着它，並且阻礙着它的發展），因而在社會的發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同一社會形態範圍內的經濟制度中，能够發生某些結構上的變化。例如，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統治代替了固有的自由競爭。因此，作爲一定生產關係（即一定基礎）的負持者的階級底思想，就發生一定的變化。爲建立新基礎（例如資本主義）而鬥爭的新興階級的意識形態，當這個新基礎起來代替舊基礎（封建主義的）時，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它是有歷史上的進步性的。同一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當它維護着業已腐朽的資本主義基礎而不允許建立新基礎（社會主義的）時，自然，就失去了任何的進步性，它是反動的。現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就是這樣的，如像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

資產階級的制度和組織也隨着基礎的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資產階級觀點的相應的變化而變化着。帝國主義時期的到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招致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危機的加深，使得資產階級到處走向反動和法西斯主義。

列寧早就注意到這一方面，他說『在新的經濟基礎上面，在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基礎上面的政治的上層建築是由民主轉向政治的反動。自由競爭適應着民主。壟斷適應着政治的反動』（『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十一頁）。

在當前的時代，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力圖到處建立法西斯秩序，消滅民主自由的可憐的殘餘。資本主義的境況愈沒有出路，他們就愈加有力地走向法西斯和戰爭。當這一基礎要消滅的時候，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動的政治上層建築，也在資本主義社會崩潰的條件中爲保存資本主義基礎而服務，正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這種上層建築會經爲肅清封建殘餘和形成資本主義基礎的進步目的服務過一樣。資產階級的一切組織和制度，以及他們的觀點，在資本主義基礎發展的一切階段上，幫助了它的發展或保持。

『基礎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這一斯大林公式的英明，就在這一公式不僅指示着各種社會形態的經濟制度的區別，而且也指示了在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分析它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時，對同一制度的各個發展階段必須有具體的歷史觀點。

由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過渡到另外一種形態的時候，舊的基礎被肅清、被消滅，而代之以新的基礎。緊跟着，舊的上層建築也被肅清，被消滅，而代之以新的上層建築。但是在同一社會形態的範圍內，基礎也經歷着一定的變化。業已失去生命力的和走向崩潰與最後滅亡的那個基礎，在某些特點上，不同於其發展的初期階段。在現存制度的範圍內，隨着基礎的變化，爲它服務的上層建築也發生變化。因此，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範圍內，基礎和上層建築是隨着這一形態的發展而變化的。在過渡到另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時候，它們是被肅清、被消滅了，在那裡就由新的基礎和新的上層建築來統治了。

（原文載蘇聯「哲學問題」一九五〇年第三期——冬季號）

安徽績溪發現太平天國攻城壁畫

皖南人民文物館配合土改，蒐集文物。其中有關革命文物，收穫也很豐富，而以徽州區採集組在績溪縣所發現的太平天國攻城壁畫爲最珍貴。這幅壁畫在績溪縣翬岑北，第二區旺川行政村曹氏支祠左廊的粉牆上，內容大體完整，可能是太平軍侍王李吉賢所部梯攻徽郡圖，華東文化部已派人會同皖南人民文物館人員前往攝影摹繪。

四川內江縣發現三座漢代古墓

成渝鐵路民工築路隊最近在川南區內江縣牌樓壩地方進行開山工程時，連續發現三座古墓，經西南軍政委員會文物考查隊鑑別結果，確定爲漢代古墓。墓穴高七尺，深約二丈，有石窗、石床、小石屋和石槨；槨內藏有遺骨漢錢；槨側有花紋清晰的漢磚；穴壁有壁畫和美麗的圖案雕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物考查隊正在作進一步的發掘中。

敦煌文物在京展覽

中國千餘年來最光輝的藝術遺產之一的敦煌文物，從四月十三日起在北京歷史博物館舉行展覽。

展覽內容以莫高窟（俗稱敦煌千佛洞）的壁畫摹本爲主，包括有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一千年間各朝代壁畫摹本九百餘件，此外還有一部分遼陽漢墓壁畫摹本，六朝的寫經和洞窟模型、塑像等，同時還陳列有被帝國主義盜竊的文物照片、材料等。

新編「哲學史」

第五章　巴黎公社後（一八七一——一八九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三續）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　譯

五　辯證唯物論底進一步的發展

辯證唯物論在恩格斯底天才的著作『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中得到了穩固的奠定和進一步的發展。列寧指出在『反杜林論』中『研究了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許多偉大的問題……這是一本非常有內容和有教育意義的書。』㈠

列寧對恩格斯底著作『費爾巴哈論』也作了同樣高的評價。列寧說，這部著作『像「共產黨宣言」一樣，是一切自覺的工人底參考書。』

『反杜林論』從一八七七年初以單獨的論文形式發表於『前進』報上，而在一八七八年多，即反對社會主義底特別法案頒佈的前夜，才以單行本出版。用梅林底形象的語言來說：『這是這樣的一個時候，濃密的烏雲掩蓋着政治的領域，這部書底光輝安安靜靜地燃點起來。』㈡

『費爾巴哈論』這部著作最先在一八八六年發表於『新時代』雜誌。

這兩部著作都是在同馬克思主義底敵人作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它們都光輝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底世界觀，粉碎了敵人底攻擊，同時又進一步發展了這個世界觀。恩格斯反對杜林底反動言論的鬥爭特別有重大的意義，因爲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都贊同杜林的那種言論。

埃森派同拉薩爾派底妥協，這是在荷特締結的，也引導到同其他的反對無產階級的份子妥協。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央機關報『前進』客氣地把自己的篇幅讓給各種各樣的假理論家，讓他們在工人中散播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黨底定期機關刊物『將來』底出版家霍黑堡，『參加進』，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黨裡來，宣傳反對唯物論世界觀和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這個新康德主義底旗手，公然以庸俗的唯心論的見解挺身而出，認爲『社會主義的理想底唯一的來源是離現狀而獨立的，甚至與之背道而行的自動的意識及其關於必然底概念。』所有這一切在『共產黨宣言』以後說了三十年之久！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馬克思給查爾格底信上寫道：『……在德國、在我們黨內、在領袖（從上層階級和上層『工人』出身者）中間臭氣沖天，而在羣衆中並不如此。』㈢整『羣的不成熟的學生和聰明透頂的博士』參加到工人運動中來，並以反動的囈語毒害了工人底意識。

杜林就是這種不速之客的一個，他曾有一個時期同俾士麥保持着聯系。這個助敎，『令人難堪的厚顏無恥的主體』，帶着喧嘩的自吹自擂的姿態出場，並且把自己說成『卓絕的天才』，他給帶來了世界上所不知道的眞理。他把自己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體系底混合物吹噓成爲他所『發現的』『新的思想方法』和『完全特殊的結論和觀點』。當杜林自吹自讚自己的『學說』時，他就以馬克思主義科學底兇惡的敵人出現。

杜林有許多崇拜者，主要的是在資產階級的德國學生中間，一部份在工人中間，特別是那些不復成爲工人而成了職業的文人，他們創造了，用馬克思底話說，『「理論」中的許多災厄和經常準備依附於所謂「學者」階級底荒唐的頭腦。』㈣恩格斯指出，在當時的德國，空洞的、經院式的『體系創造』，成了各種各樣的以科學騙人的混亂的觀念。

因爲這種欺騙者底『體系創造』，他們試圖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間散播自己的『學者』底廢話，有使工人發生思想混亂的危險，恩格斯認爲必須對這些騙子給予應有的抵抗。恩格斯就把杜林放在自己的批判火力之下，因爲杜林乃是這種輕浮的僞科學底典型人物之一，杜林底僞科學到處賣弄，並且用自己的傲慢的法螺底雷鳴掩蓋了一切。

爲了清算杜林，恩格斯充分地拿出了許多篇頁，那些篇頁是用他特有的論戰的技巧寫成的。恩格斯之所以這樣不厭其詳地去批判杜林，其詳細的程度和杜林著作底『科學』的內容顯得不相稱，他是有重要的理由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初版序裏所說，他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與批判杜林的同時，對比較一般的科學的和有實際興趣的問題從積極方面去發揮自己的觀點。

這就是恩格斯所發展的積極內容使『反杜林論』成爲不朽之作。杜林和杜林派很快就消聲匿跡了，而『反杜林論』卻永久生存。

恩格斯底著作『費爾巴哈論』也是思想鬥爭底成果，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對費爾巴

㈠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十一頁。
㈡梅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㈢馬恩通訊選集第三一二頁。
㈣同前第三一三頁。

給底觀點和黑格爾底哲學作了批判的分析，表明了他自己和馬克思對於這兩個哲學家底態度。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早期著作——『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考察過這些問題，恩格斯認爲必須重新再回到這些問題上去，以便更完滿地解說它們，因爲在這個時期，德國的唯心論的哲學在某些國家——在英國和其它國家內，又有復活之勢。某哲學博士康·尼·施達克論費爾巴哈的著作底出現便足爲證，這位先生把唯物論同唯心論鬥爭底根本問題弄得混亂一團。不論是在『反杜林論』內也好，在『費爾巴哈論』內也好，恩格斯都很巧妙地運用了論戰來進一步分析和敘述自己的世界觀。

在『費爾巴哈論』中，恩格斯在批判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底過程中形成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一切哲學而特別是新哲學底基本問題，是思惟對存在之關係問題，而這個問題就把哲學家分成兩個營壘：凡認爲物質是第一位，而精神是第二位的，都屬於唯物論者底營壘；凡認爲精神是第一位，而自然界是第二位的，則屬於唯心論者底營壘。

關於哲學基本問題底恩格斯的原則，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鬥爭都是圍繞着它展開的，便確定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觀點。

闡明了唯物論同唯心論之間鬥爭底眞實的內容之後，恩格斯就從馬克思主義敵人底手裡奪下了武器，他們認爲唯心論與唯物論底對立，是論理觀點底對立，而恰恰正是唯心論才具有追求上昇的和高貴的意向。這種觀點是在多年的討厭的僧侶的企圖降低唯物論底說敎影響之下形成的，它與實際情況毫無共同之點。恩格斯指出，這種觀點『是產生在哲學以外，產生在德國的庸人身上，他們掇拾了席勒詩歌中底哲學敎育底碎片。』㊉其實唯物論世界觀經常鼓勵它的信從者獻身於偉大的社會理想，而唯心論的胡塗思想底說敎者，則離服務於『眞實和眞理』遠得很，往往爲了三十塊錢便屈服於反動底黑暗力量的支配之下。

唯物論同唯心論底眞正的矛盾是被意識對存在這個問題底根本矛盾的解決所規定的。

這個問題，恩格斯寫道，有兩方面。第一，這問題是何者在先：自然先於精神還是精神先於自然。唯物論者與唯心論者底區別是在於唯物論者承認佔第一位的是自然，而不是精神。

問題底另外一方面——關於存在與意識底相互關係——是我們的關於圍繞我們的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底關係。『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的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的關於眞實世界底表象和概念中構成對現實的眞實的反映？』㊁——恩格斯就這樣把這個問題底實質作了概括的說明。

在批評不可知論和解釋唯物論的認識論時，恩格斯指出辯證唯物論給予康德的和休謨的哲學的歪曲以最堅決的駁斥，因爲它提出了新的認識底標準，宣稱人類的實踐是這個標準。恩格斯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裡所提出的原理：『人應當在實踐中證明自己的思維底眞理性，卽眞實性和力量、全面性。』㊂他强調着說，實踐爲什麼能作爲認識底標準呢，因爲它製造事物和現象，從它們底條件中引出它們並使它們服務於人類底目的。在人類底實踐的活動面前，不可知論完全破產了，而所謂不可捉摸的『物自體』也告終結。

恩格斯提出的哲學中的兩個基本派別這個原理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的歷史哲學的概念和說明了哲學史底眞正面目，把哲學史看作哲學中的兩個黨派底鬥爭史，兩個黨派底每一個，都反映出每一特定的歷史時代底特定的社會階級底利益。

因此，它就給予了『超階級的』和『非階級的』觀點以毀滅性的打擊。資產階級的敎授們這種觀點僞造哲學史，唯心論地曲解它，以便把哲學史變成反唯物論的鬥爭武器。

在總結哲學底基本問題時，恩格斯把唯物論描寫成這樣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是建立在物質和意識關係底特定的理解之上。恩格斯把辯證法底觀點運用於唯物論底歷史的考察和運用於創立唯物論底世界觀和唯物論底認識論。恩格斯提出非常重要的原則：唯物論在自己的發展中經過了許多階段，隨着自然科學上每一個劃時代的新的偉大的發現，唯物論就必須採取新的形態。把唯物論底發展同歷史上特定的階級基礎和自然科學底狀況聯系起來，恩格斯指出了古代唯物論和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底特徵，揭露了它們的缺點和局限性，並指出辯證唯物論底巨大的力量。

恩格斯底著作『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是闡明辯證唯物論理論底天才的貢獻。在先前的時期，問題主要是關於如何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社會生活，來認識社會發展底規律，特別是認識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規律和傾向。

辯證唯物論理論本身底研究，它的一般原則底具體化和它們的詳細解釋這些任務，曾被科學研究和革命的實際鬥爭底更迫切的和第一緊要的任務所排擠。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經濟的研究裡和歷史的著作裡實現了闡明無產階級底全世界歷史的作用這個主要任務，因此更詳細地考察和創立哲學本身底時機到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在利用哲學的時候完成了認識經濟和歷史規律底偉大的發現。揭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底敵人，恩格斯對辯證唯物論世界觀底基礎作出了深刻的和全面的分析和說明。他在『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裡就完成了這件工作。

在這兩部著作中，事實上第一次對辯證唯物論底理論作出了展開的說明，並指出辯證唯物論這個成果是在那裡，它構成馬克思主義創造者所創造的新世界觀底根本的特點。

自然本身底辯證法底揭發，在考察唯物論的自然觀和唯物論的認識論底基本問題上辯證法底運用，這些在上述的恩格斯底著作中，都表現着天才的實施。

這兩部著作揭開了和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底偉大的思想寶庫，並且給予革命的工人階級隊伍以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當保護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時，恩格斯巧妙地採用辯證法來考察唯物論理論底最重要的問題：世界底唯物論的統一問題，物質和運動

㊉恩格斯：『費爾巴哈論』第二四頁。

㊁同前第十七頁。

㊂馬恩選集第二卷第三八三頁。一九〇八年版。

問題，空間和時間問題，以及世界底認識問題。恩格斯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原則形成爲辯證唯物論世界觀底不可動搖的基礎。

揭露了杜林對世界及其統一底觀點上的形而上學和唯心論，指責了杜林底錯誤是在於他的『世界的圖式』完完全全是從唯心論者黑格爾那裡借用來的，恩格斯寫道：『世界底眞正的統一是在於它的物質性，而這物質性不是靠兩段魔術式的詞句所能證明，而是靠長期的和艱苦的哲學和自然科學底發展來證明。』㈠

這就是說，世界底統一不是在它的存在，如杜林所說那樣。世界底存在是它的統一底前提。然而世界底眞正的統一是在它的現象底物質的聯系，是在於世界是不可分割的物質的過程。例如無機界和有機界爲什麼會形成統一呢？那是因爲後者是從前者產生出來的。恩格斯肯定世界統一上底辯證法的觀點，這種觀點要求從物質發展底觀點來考察這個統一。與此同時，恩格斯所完成的另一指示也很重要，就是世界底統一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底發展來證明。只有跟着自然界中存在着的眞實聯系底科學知識底發展在一起，按照從辯證唯物論底觀點來總結現有的自然科學底程度，越來越深刻地揭露出世界底統一是在它的物質性。

站在唯物辯證法底立場上，恩格斯也考察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世界有限呢還是無限呢？

杜林從數學上數的系列底類推上，來提出世界無限性問題。這樣的系列從單位開始而可能繼續到無限，但只在一個方向上。因此，杜林斷言說，『正確地假定的』無限性沒有終結，但有開端。

不難看出，這種見解是事實上承認神底存在；假使世界有開端，這就是說它是被創造的。杜林自稱爲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底敵人，事實上是眞正的形而上學者，因而經常掉到唯心論裡去。

恩格斯澈底掃除了全部杜林底這種形而上學的和唯心論的混合物。他說，數學上的數目系列底概念，完全不能用到物質世界和它的存在底根本條件——空間和時間——上面去。

杜林底論斷底破產，是在於他形而上學地把開端與終結彼此對立起來。『稍微有一點辯証法的洞察力，——恩格斯寫道，——就應當會使杜林先生懂得終結和開端必須像北極和南極一樣彼此聯系起來，如果抛開終結，那麼開端便變成終結，變成系列上同一的終結；反之亦是如此。』㈡誰要是認爲世界有開端，那他就應當也承認它的終結。然而假使承認世界沒有終結，那末也就必須承認世界沒有開端。『時間上的永久性，空間上的無限性，就字面底意義一望而知，——恩格斯寫道，——它們無論在任何方面，無論在前在後，無論在上在下，在右在左，都沒有終結。』㈢

無限性底荒謬的理解，事實上是無限性底否定，使得杜林達到關於世界的整體和部份底有限的數字底糊塗的論斷。

承認自然底無限性，即是承認運動底無限性，因爲運動是物質存在底形式。任何時候也不能有無運動底物質。一切的靜止，一切的均衡都是相對的，就是說不僅不排除運動，而且相反地只是由於運動才有可能。無運動的物質，正如無物質的運動一樣不可思議。

思考無運動的物質，即是把物質思考爲某種不變的、自身同一的狀態。杜林恰恰就是這樣看問題的。然而『假使世界，——恩格斯寫道，——曾經在某一時候處於一種絕對不發生任何變化的狀態，那麼它怎麼能從這種狀態轉到變化的東西，假使它還多年處於這種狀態，無論如何決不能自己脫出這種狀態而轉入於運動和變化底狀態。因此，第一個引起世界運動的推動力必定是自外面，從天上世界而來的。但是，如衆所週知，「第一推動力」只是稱呼上帝的別名而已。』

杜林以引用『物質和機械力底統一』，試圖脫出唯心論的死路，照他的理解，在不變的的同一的狀態之時，物質被裝進了力。『……這樣的表象是沒有意義的，——恩格斯指出說——因爲它把那種本性上是相對的、在每一瞬間往往只是一部份物質所服從的狀態，轉移於宇宙中，而把它看作是絕對的狀態。但是，即使不顧這一情形的話，那末還是存在着難題：第一、宇宙怎樣被充實起來，因爲在我們的時代，槍砲是不會自己裝進子彈的，第二，誰的手指撥動槍機呢？我們可以任意旋轉，可是在杜林先生的指導之下，我們每次總是重新回到上帝的的指頭上。』㈣

從以上可以得出結論，不承認運動底永久性，便不能成爲唯物論者。物質沒有運動之不可思議，正如運動沒有實體、沒有物質一樣不可思議。恩格斯保衛了辯証法的唯物論，反對杜林底形而上的僞造，他把運動歸結到機械的力，這表明他沒有能力理解物質與運動之間的眞實的聯系。

這是完全明顯的，恩格斯底這些古典的原理對於反對現代的研究哲學的資產階級的物理學家的鬥爭，即在現在還保留着自己的意義，這些物理學家『計算者』分子和原子底數目，並且宣稱後者是神所創造的。

巧妙地採用辯証法來解決唯物論世界觀底問題，恩格斯對空間與時間底統一與不可分作了深刻的闡明，說明它們是一切存在底基本形式。恩格斯粉碎了杜林從空間割裂時間底試圖，按照這個試圖底描述，似乎世界開始是處於不變動的狀態裏，因而是存在於時間以外，似乎時間有一個開端而只是當世界開始運動時才出現。當駁斥杜林底這些論斷時，恩格斯指出說，時間以外的存在正如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的荒唐無稽。他揭穿了杜林底論斷底虛僞性，照杜林底說法，似乎時間只是由於變化底結果才存在，恩格斯証明說，其實變化存在於時間裏面，而且靠時間作媒介。『正因爲時間是和變化不同的，是對它獨立的，所

㈠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四三頁。一九五〇年。
㈡同前第五三頁。
㈢同前第五二頁。
㈣同前第六七頁。

以時間可以用變化來測量，因爲在測量某物時，總是需要一種與被測量之物不同的東西。』[一]杜林試圖把時間底概念消解在存在底一般的觀念裡，因此，破壞了唯物論對時間的觀點，就是把它看作是同存在不可分的，看作存在底基本形式，它是離開人們底意識而客觀地存在着的。恩格斯責難杜林以時間概念底變化問題來代替時間是否眞實地存在這個問題，責難他借助時間概念底變化底判斷而試圖拒絕回答以下的問題：時間和空間是存在底形式，還是意識底形式。恩格斯寫道：『……我們這裡絲毫不管在杜林先生的頭腦中變化着的是怎樣的概念。我們所說的，不是時間底概念，而是現實的時間，杜林先生無論如何不能這樣便宜地擺脫這個現實的時間的。』[二]

在反對杜林的鬥爭中，恩格斯採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觀點來解決人們的思維內容對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底關係問題。

世界如何反映在我們的意識中，認識的思維如何達到眞理，認識底道路如何，——所有這些問題甚至沒有提在杜林的面前，他絲毫也不能設想眞理是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地製就的、不變的、經過最後審判的絕對的知識。照杜林底說法，『眞正的眞理一般是不變的』，因此某物或者是『經過最後審判的眞理』，或者是『迷誤』。在這些斷言中表現出一切馬克思以前的，特別是唯心論的哲學所特有的野心！企圖建立理論知識底普遍的體系，它與經驗科學是對立的，並且把經驗科學踏在脚底。

粉碎了杜林底形而上學的構想，恩格斯指出說，假使認爲只有永久的、不變的、不要求進一步發展的絕對的知識才算眞理，那末就必須局限於最貧弱的原則上面。從右邊和從左邊拋出『最終的眞理』時，杜林決沒有提高人類的知識，而相反地散播了對科學的極端的不信任，因爲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恐怕還差不多是處在人類歷史的起端，而應該糾正我們錯誤的後代遠比我們現在所能糾正其錯誤（而且時常對他們採取輕蔑態度）的先代，將一定要多得多。』[三]

分析了人類認識發展底進步過程，恩格斯指出科學和實踐如何提供愈來愈完全的、愈深刻的關於實際底客觀知識，因而粉碎了關於『經過最後審判的最終眞理』之形而上學的和唯心論的幻想。這就證明認識底沒有限制，也沒有什麼認識底界限，它們也不能稱爲什麼『物自體』或絕對的知識。

例如，細胞底發現——科學上的偉大的成就，推進了生物界底更深刻的認識，——迫使『必得完全修正一切從來在生物學上所堅固確立的終極的絕對眞理，而且其中的一大部份，竟不能不永遠的摒棄。』[四]

恩格斯揭穿了杜林派關於『經過審判的眞理』的議論底階級性質，他指出說，這些議論對於杜林和其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以『永久』眞理和『永久的』人類生產底原則來增强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資本主義制度是必要的。

這是不是說辯證唯物論從認識歷史出發，推翻了人類知識中、科學中存在着絕對的、永久的、連續的眞理呢？絕不是的。形而上學者在有限的和無限的，個別的和一般的，連續的和非連續的之間劃了一條鴻溝，宣佈只有永久的、無限的、一般的、不變的、與客觀現實（客觀現實是由有限的、個別的、變化的物構成的）脫離的東西才是眞理知識，特別是哲學知識底對象。與形而上學者相反，辯證唯物論推翻了這些矛盾底絕對的對立，辯證唯物論教導我們，當認識個別的、有限的，非連續的東西時，我們同時要認識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一般的、無限的、永久的東西。推翻了不變的、一勞永逸的眞理，推翻了形而上學的絕對和相對的對立，於是，辯證唯物論就指出了認識絕對眞理的道路。

在總結新的科學材料的基礎上發展了這些原則，列寧研究了客觀眞理、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底學說。

恩格斯曾不得不進行反對杜林的鬥爭，因爲杜林把『最後的眞理』，『經過最後審判的眞理』拿來耍戲法。若干年後，列寧也曾不得不進行反對馬哈主義者的鬥爭，因爲他們完全否認絕對的眞理。鬥爭是向着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展開。但是不論在那種場合，這都是反對不可知論的鬥爭，對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底辯證法不理解必然走到不可知論去。

在發展辯證唯物論哲學時，恩格斯總結了現代自然科學底材料，闡明了它的辯證唯物論的內容，因此便奠定了辯證唯物論——它的全部的基本原則。『自然界，——恩格斯寫道，——是辯證法底試金石，而現代的自然科學對於這個試驗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日益增多的材料，因此證明在自然界裡歸根結蒂一切都是辯證法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完成着。』[五]

自然科學家除了個別的例外，都不理解辯證法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自然科學底研究結果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是矛盾的，這種思維方法一直統治着自然科學家，而這個矛盾，如恩格斯所說，在理論的自然科學中引起了無窮的糾紛。因此很難估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完成的這件工作底偉大的意義，這就是他對當時自然科學的發現作了深刻的辯證唯物論的解釋。恩格斯對當時科學中的任何一個領域都加以考察。他總結了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達爾文主義中的最重要的思想，他利用了古生物學、地質學、胎生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底材料，他從辯證法上，從自然界本身的相互聯系上考察了當時對自然研究底一切成果，並且作出了當時可算是包羅萬象的辯證唯物論的自然觀，他並且豫言唯物論將隨同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必然會改變面貌。

恩格斯指出說，在自然科學底新的材料底基礎上造成一種可能：把自然當作統一的聯

[一]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五五頁，三聯中文版。

[二]同前第五四頁。

[三]同前第一〇一頁。

[四]同前第一〇四頁。

[五]同前第一三頁。

系的整體構成系統的描寫。例如，由於這樣的發現，如細胞底發現，能力轉換律，達爾文底學說以及其它的自然科學底巨大的成就揭露了不僅自然界在其各個的領域內，而且在整個自然界內的這些領域之間都是有聯系的。而這就意味着自然哲學壽終正寢。」說明自然界底這樣總的圖景以前是自然哲學底任務，自然哲學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做到這點，就是拿理想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它還不知道的現象之現實的聯系和拿臆構來補充不足的事實，只是在想像中來充實現實的空白。』㈠恩格斯指出說，現在當從辯證法的觀點充分地觀察自然研究底結果而作出了在當時是綜合的自然圖景的時候，一切復活自然哲學的試圖『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退步。』㈡

恩格斯認爲自己的任務是在於在自然界本身找出辯證法的規律，並從自然界中導出這些規律。恩格斯英明地執行了這個任務，他對自然科學有偉大的貢獻，他把它從一切孤立的、站在自然以外和自然之上的自然哲學解放出來，並且以唯一科學的唯物辯證的方法來武裝它。

自然哲學隨着自然科學底發展，越來越變成它的桎梏，這種哲學底反動特點以特別尖銳的形式正好表現在杜林底『著作』裡。這個投機家完全抄襲了黑格爾底自然哲學，並且假惺惺地罵他一頓，以便掩飾剽竊行爲，當他帶着這個寶貝出場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建的眞正科學的世界觀已經存在和廣泛傳播開了，當時自然科學帶來的日新又日新的證據，證明這個世界觀底眞理性。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復活自然哲學已經變成反科學的公開的戰爭，杜林是用那些企圖詆譭蔑科學的最反動的傢伙所使用的最卑劣的手段來作戰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完全粉碎了杜林主義及其自然哲學，他指出說，爲了成功地認識自然界底規律，自然科學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同辯證唯物論的結合是有必要的。

在『反杜林論』中，對辯證法底主要規律作出了深刻的解說。首先恩格斯發展了辯證法底最重要的原則：一切現象和過程都有內在的矛盾，運動內部就有各種形式的矛盾，從簡單的，機械的運動開始，到最高級的運動形式——思維終結。

機械運動底內在矛盾就在於運動着的物體在同一瞬間是在某一點上，而同時又不在那個點上。

在有機的生命中，發展底內在矛盾表現在『生物在每一特定的瞬間是這樣子而又是別的樣子。』㈢

同樣地思維也是內在的矛盾過程，舉例以明之：認識按其可能性是無限的，在每一個自己的具體顯現形式上是有限的。

辯證法的矛盾貫穿於科學底一切領域。要求得－1的平方根就是說要找出這樣的一個數，這個數自乘底結果便得出－1。但是一切的數，正數和負數，自乘底結果都得出正數。這是一個矛盾。然而，恩格斯指出說，『如果禁止應用$\sqrt{-1}$，那末初等的和高等的數學將怎麼辦呢？』㈣

恩格斯所舉的例子說明了任何現象中的矛盾的方面和傾向的統一。

物和現象所具有的辯證法反映在思想上，而思想也如客觀世界一樣，服從於辯證法底規律。恩格斯直接寫到主觀的辯證法，辯證法的思維是統治自然的客觀辯證法底反映。

與此相聯，恩格斯提出和解決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關係問題。他說，形式的邏輯，或者如他對它的另一稱呼，普通的邏輯與辯證法之間的關係，類似數學中的常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這個對比說明了辯證法並不取消形式邏輯，正如高等數學並不使初等數學成爲不必要的和多餘的東西一樣。恩格斯不僅不推翻形式邏輯，而且賦予它以嚴重的意義。

同時，恩格斯指出形式邏輯底『狹仄的圈子』，並指出辯證法是更高得多的認識方法，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底狹仄的圈子，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廣泛的世界觀底萌芽。』㈤

我們的思維不能透入任何的領域，思維，如形式邏輯所要求，應當取消矛盾，這是主觀本身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帶來的，而排拒這種邏輯上的矛盾乃是正確認識底必要的條件。

恩格斯指出說，當我們考察事物時，把它『看作各自孤立的，彼此並列的或前後相繼的，我們自然在其中就遇不到什麼矛盾。這裡我們看到一定的屬性，這些屬性一部份是共同的，一部份是相異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但在這後一場合，它們是分配於各自相異的事物之間，所以自己內部便不包含任何的矛盾。』㈥

但是，恩格斯指出，當我們是從事物底發生和消滅，在它們的轉變和過渡——在它們的運動和變化中去考察事物時，事情就完全不同了。『這裡我們立刻碰到矛盾。』㈦

在一切這些現象裡面，我們碰到較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在思維上的正確反映已超出形式邏輯底範圍。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闡明的第二條辯證法底原則，由量轉爲質和由質變爲量的原則。

『在物理學中，——恩格斯寫道，——每一個變化都是量轉變爲質，即某物體所固有的數量變化或某物體所承受的某種形式的運動數量成份改變的結果。……物理學中所謂Canstants（常數、定量）大部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底數量增減（數變）引起該物底狀態底質變，因而也就是說，量轉變爲質。』㈧

㈠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四章。
㈡同前書
㈢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中文版。
㈣同前第一四七、二四八頁。
㈤同前第一六五頁。
㈥同前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㈦同前第一四六頁。
㈧『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七頁——五二八頁。

化學也證明這條規律，在那裡，質上有差別的物體是由簡單的數量上的原素底增加而形成。例如，在普通的石蠟底序列裡，每一個新的項目都是用增加一個炭素原子和兩個氫素原子（CH_2）到先前項目底分子式上去的方法來形成的。

論到社會生活，恩格斯舉出這個事實來作例子，許多人底合作，把許多個別的力量結合爲一個力量，便造成了新的力量，這個力量同組成它的個別力量底總和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這個例子證明不僅量變爲質，並且新質底產生也帶來了量變，因爲在這裡產生的質上新的力量同時又是量上生長着的力量。證明量變爲質的任何例子，往往又證明相反的由質到量的轉變。

恩格斯所解說的辯證法底第三條原則——這條原則他保留了黑格爾底術語，稱之爲『否定之否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一些例子來說明『否定之否定』。假使大麥的種籽落在適宜的土壤裡，那末在温度和濕度的影響之下便會發生變化：它發芽了。種籽便消滅了，否定了。在它的原位置上出現了從它裡而生長起來的植物，出現了種籽底否定。植物開花、結實，最後重新又得到大麥的種籽，而只是在後者成熟時，麥桿才枯死，植物又被否定。這個否定之否定底結果，我們又重新有了開始時的大麥的種籽，但不是一顆而是十顆，二十顆，三十顆（而在我們的時代，由於蘇聯農業生物學底成就，一顆麥種可以變成四百顆以上）。種籽本身可以在質上發生了變化。

恩格斯引用馬克思『資本論』裡對財產形式發展底分析，來作爲社會歷史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例證。原始公社的財產讓位於生產手段底私有。但是這後者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而消滅，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生產手段底社會的、社會主義的所有。原始公社的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存在着外表的、形式的類似：在那裡，沒有生產手段底私有，而在這裡也沒有它。而在實質上却有深刻的差別：原始公社的所有造成了生產發展底障礙，而生產手段底社會主義的所有却第一次把生產從桎梏中解放出來，爲它的發展開拓了無限的地盤。恰恰在這個例證上，杜林試圖誹謗馬克思主義，說，似乎馬克思主義證明共產主義底必不可避免是靠着否定之否定這條原則底幫助。其實否定之否定絕沒有在共產主義底建立上起證據底作用。否定之否定這條原則本身爲以下的結論所證實，作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底規律和傾向底結果的科學的共產主義達到了那個結論。杜林由於缺乏更好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武器，便只好撒謊。

恩格斯指出，『否定之否定』是發展中廣泛起作用的規律。可是並非一切發展都通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的形式。『否定之否定』不是一般的、普遍的規律。

人所共知，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基本特點底古典的說明中，並沒有稱否定之否定是其特點之一。這是很好理解的。在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中所達到的辯證唯物論底高級發展階段說明有必要拒絕把『否定之否定』這條原則提出來作爲單獨的規律，因爲在辯證法底基本原則中它的完全的出現是偶然的，辯證法底基本原則是：老的消滅和新的生長，由一種質過渡到另外一種質，發展底逐漸的性質。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概括的和闡明的辯証法規律在列寧和斯大林底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的具體化和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被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的唯物辯證法底規律對於科學知識一切領域底發展，對於反對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學中的現代的反動的思潮的勝利鬥爭，有着最重要的意義。

（本節完，全文下期續完）

日本哲學會致全世界哲學家的信

當一九五〇年全體大會時，我們——日本哲學會會員，向全世界哲學家致以敬禮，宣告我們學會成立，並希望今後得到你們的合作。

日本哲學會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它是日本哲學家的全國性的組織，在國內外代表我們的哲學界。日本哲學會不但包括在國內每一所大學裡的哲學家，它還包括大學以外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所以這個學會的組成，是包含持有不同見解的會員，他們彼此交換意見，因而能對整個哲學研究工作的推動有所貢獻。第二次大戰後，像這類性質的團體的成立還是第一次，同時可以確定地說，它在日本哲學界也是初次的嘗試。

在宣告日本哲學會成立之時，我們向全世界所有的哲學家作如下的呼籲：

（1）我們希望你們諒解，過去幾年在法西斯的高壓下，大部分日本哲學家不得不保持着沉默，然而我們內心中是堅持着尊重人類利益至上的態度的。

（2）我們希望世界上所有哲學家期待我們在以交換研究結果，交換思想來提高人類文化的企圖上起相當的作用。

（3）我們對於世界已分爲兩大陣營，表示衷心的遺憾，渴望世界上所有的哲學家以所有的方法，利用所有機會進行合作，以確立富有健全人性的思想，以便促進人類的幸福，保衞世界和平。

今乘此函之便，我們日本哲學家藉貴學會的協助，向貴國哲學界人士報告我們在戰後的艱難情況下所完成的工作。同時，我們還企望由你們的協助來獲得貴國哲學方面的著作與消息，以及哲學界的動態。

日本哲學會會長　務台理作

日本哲學會會員（以日本字母爲序）

安倍能成　粟田賢三　池上鎌三　石原謙　出隆　伊藤吉五助　岩崎勉
桂壽一　金子武藏　古在由重　小松攝郎　下村寅太郎　高桑純夫　高橋里美
武市健人　田中美知太郎　淡野安太郎　野田又夫　服部英次郎　細谷恒夫
眞下信一　松本正夫　松村一人　三宅剛一　宮本和吉　務台理作　柳田謙十郎　山崎正一　山内得立　和辻哲郎

（孫槩先譯）

「實踐論」與新法學（座談記錄）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

第一次會議

時間：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地點：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

主席：謝覺哉

記錄：陳昌杭

何思敬：我把這個題目作爲學習中的一個問題來看，談的對不對，請在座的各位指敎。我認爲實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是了解毛澤東思想的鎖鑰，和一切科學的基本方法。實踐論的最終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離開具體歷史的一切左的或右的錯誤的認識。但是聯繫到建立新法學，究竟應怎樣辦呢？這是一個大問題，三言兩語解答不了這個問題。我今天只來談一談不成熟的意見。

大家知道，馬列主義在中國因有毛澤東思想之故，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都很成熟、很有經驗，但應用於法權問題則尙沒有生長成大樹。我認爲我們目前是先把蘇聯的法學拿來和中國國家與法權建設問題，結合結合試試看。我個人近來了解到：蘇聯的法學不僅總結了工人階級關於國家與法權鬥爭以來產生的經驗，並且的確對於古今、中外國家和法權的現象也都作了科學的總結。我覺得把它拿來連繫中國的實際是很好的。舉一個例子。蘇聯法學的對象是國家與法權，我現在只爲了在座談會上一時的方便只拿它的一部分即法權的定義來分析。（這定義是科學的結論，不要認爲這是從定義出發。）一般蘇聯法學根據長期的研究和維辛斯基底論證對法權的定義是：一、法權是一特殊的社會現象，二、法權是行爲規範的總和；三、法權反映統治階級的意志；四、法權規範是由國家政權來制定或批准爲法律；五、法權規範由國家以强制力保證其實行、適用和遵守；六、法權的目的是在保護、鞏固和發展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底法權也可以利用這個定義來試行規定一下，例如：它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它是一系列底行爲規範底總和，它代表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四個階級底意志、經國家制定或批准並以强制力來保證其遵守、實行，其目的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保護、鞏固和發展有利於四個階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以便使中國社會穩步走向社會主義，我認爲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法權的定義，大致可以這樣來定對不對，請指敎。這是一個例子。

如何連繫實踐論呢？首先要看看法權問題裡面有沒有實踐問題。我們知道法權是行爲規範，但行爲却是社會實踐，這樣，我們豈不是可以和實踐論連繫起來了？離開了今天的社會實踐而談法學，便會走上舊法學的老路，舊法學尤其規範學派完全脫離了廣大人民底社會實踐，這無須多說了。毛主席說人的社會實踐很多，如生產活動、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活動，以及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新法學的研究對象整個地講是國家與法權，因之當然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國家權力來制定爲法律並以國家强制力來保證其實現的社會實踐規範、法權規範。

研究法學，除了研究社會實踐底物質基礎和推動作用之外，還得研究國家問題。國家權力在那個階級手裡，這一問題決定着國家底本質、命運與作用。同時也決定法權規範究竟能幫助社會實踐起怎樣的作用。但只研究社會實踐、物質基礎或國家問題，使成爲其他的社會科學。因之新法學仍應研究法權規範及其法律化，以及這一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所起的積極的反作用。譬如懲治反革命條例公佈了，羣衆更積極地起來鎭壓反革命，同時生產的積極性也提高了，就是影響經濟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當然研究的方法，必須是馬列主義、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因之不能脫離社會實踐、國家、物質基礎底具體歷史。研究了、得出了結論之後，還要拿到社會實踐中檢查自己是否正確。這就是和實踐論結合。請各位指敎。

芮沐：法學是一個研究政權工作的學問。研究法學的人有這樣的一個重要而且神聖的任務，就是：實現人民的意志。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我認爲有兩點應該特別提出，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馬列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就是它的階級性……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研究法學的人第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他的階級立場。其次是如何把實際知識連繫到法學上去。我認爲法學研究的規模一定要廣些，必須和其他社會科學結合。馬克思曾經說過，他的本門學問是法律，但是他把它附屬於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法律關係不能從它的本身去了解，而只能從它所反映的生活物質條件去瞭解。上面所說是關於法學的認識的。法學的另外的一種作用，就是影響實際。因此我們可以說：法學一方面反映實際，一方面領導實際。

毛主席所說的感性到理性的認識，我們對於這一步工作有一種困難。就是了解事物現象的內在連繫的困難。另外還有一種法學所特有的困難，那就是理性認識以後立刻要求把這認識貫澈到行動中去，領導實際的困難。

傳統的資產階級的法學，以及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法

學，擺脫不了所謂「六法觀點」，任着不正確的概念支配我們的行動。這是一種錯誤。另一種錯誤表現在兩方面：一、經驗主義，只停留於實際中的感性認識；二、否認法律範疇，認爲用其他學問的範疇就可以應付法律問題，一九三八年維辛斯基曾經在真理報上著論指出，這種看法，是反馬列主義的。目前，我們的毛病是第一種的多些，而且這一種毛病也比較嚴重些。

重覆一遍：如何反映實際？如何領導實際？這是新法學的困難工作。法學主要是應該從革命工作的鬥爭中求取經驗，例如和大理事會的決議及其他法律文件，這是從世界和平陣營國際鬥爭的經驗得來的。國內的法律也是一樣，例如懲治反革命條例，就是革命過程中的具體鬥爭，它具有明確的目標。我們研究新法學必須有明確的階級立場、明確的工作目的，這樣了解毛主席的實踐論，才能對於我們的法學研究有所幫助。

最後，我們可以說我們以往所作的法學工作各方面都是不够的；一、在感性的認識上做得不够；二、提高到理性的認識更是不够；三、至於從理性知識再回到實踐——革命工作，尤其是不够了。

張志讓： 今天到會的有很多法學研究者，也有很多實際司法工作者；我希望我們也多講一點怎樣適用「實踐論」到司法工作上去的問題。我想關於這方面提出一點意見，分三個問題來講：一、實踐論和立法工作；二、實踐論與司法工作；三、實踐論與法學教育。

一、立法工作問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已經制定了不少法律，尤其以財經方面的佔多數。其他法院常用的法律也有一些，但還有幾種基本的法律未曾制定。制定這種法律的工作是否應該就着手來做？對於這個問題可有不同的看法。

一種看法是認爲制定這種法律並不需要什麼準備工作，「懂了法律的人」提起筆來就可以起草。這種看法是顯然不懂得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毛主席的實踐論指出：認識是從實踐開始，必須經過感性認識的階段再到理性認識的階段。到了理性認識的階段，我們就可以造成大體上相應於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我們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於那客觀過程的實踐；在這實踐中又可以檢驗我們的理論、計劃等等，並發展它們。要做某種立法工作，就必須要其所應有的認識已經到了可以決定這種計劃、方案的階段。上述提起筆來就可起草的看法顯然忽視了從實踐開始、綜合經驗及總結經驗的必要。人們要想這樣起草法律，將不外乎採用下列三種方法之一。一種方法是硬搬蘇聯的法律理論而不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或者就竟變相地抄襲蘇聯的法律。這就犯了教條主義的毛病。另一種方法是變相地抄襲六法全書。這是開倒車，當然比教條主義更壞。第三種方法是以六法全書做架子，任意擺弄蘇聯法律的個別規定來裝進去，以起草一部貌似新型的法律。這種方法也與上述兩種同樣地不與。

另一種看法認爲這種基本的法律包括的內容很廣，其所應解決的問題又很基本，而現在我們的經驗還不够，所以還應等待些時候，等到經驗充足了，然後再來着手做這種立法工作。這種看法的根本出發點是對的，所應研究的是：我們目前是否已經可以着手分階段地來進行這種立法工作，還是就連第一階段的準備工作都還嫌早？我個人認爲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着手分階段地來進行這種工作。我們老區的法院已經有了相當的經驗，比較新的解放區法院雖然經歷時期較短，然在這將近兩年的中間，也得到了不少經驗。所以法院的經驗雖不能算十分充足，但也不能說沒有相當的經驗。

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可以對於社會得到有關刑事、民事的各種感性認識。這種認識，其他方面都不像法院得到的那樣多，所以法院的經驗是極重要的。法院在審判上所得到的感性認識又視審判員寫判決書的程度或深或淺地表現在它的判決書上。我們在判決書上可以看到法院怎樣處理社會上發生的刑事、民事問題，它可以給立法工作者以很寶貴的參考材料；但立法工作者却不應該過於依賴它，因爲判決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更重要的是從它那裡可以比較集中地認識到社會裡各種有關的現象，其原因、結果和影響，並研究出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所以有計劃、有重點地調集各法院的判決書，加以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並總結法院的經驗，這是立法工作者的重要準備工作。

立法工作者所需要的感性認識並不限於法院的經驗。毛主席指出：認識依賴於社會實踐，而在社會實踐中主要是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還有一種重要的社會實踐就是階級鬥爭。當然社會實踐還包括政治的、科學的、藝術的及其他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活動。所以立法工作者應有的感性知識決不限於法院的經驗，物質生產的實踐、革命的實踐以及其他有關立法的感性知識都是必要的。我在前面說過，我們法院的經驗不算十分充足，也不算沒有相當的經驗。至於這裡所指的物質生產經驗、革命經驗以及其他有關的社會實踐經驗却都是很多的。我們要立法必須總結法院的經驗，還必須總結這些經驗。那麼就有人們要問：總結法院經驗已經不很容易，再要總結這些經驗，立法工作者能不能担起這個任務？

我的回答是：不能的，而且這些經驗的基本總結也不需要他們來做，因爲基本的總結早已有了，他們只須在這些基本總結之下再做一些直接有關的總結就够了。人民政協共同綱領、有關的法令和政策文件、毛主席的各種言論與指示和其他有全國指示性和權威性的言論與文件等都已經基本上總結了這些經驗。所以總結各種經驗的工作並不像初看時的那樣艱鉅。當然，立法工作者在這種基本總結下來做直接有關的總結也還不是他們所能獨任的；他們還必須要有富有革命實踐經驗的人、富有財經工作經驗的人以及富有其他有關社會實踐經驗的人來共同進行。

這是立法準備階段的主要工作。由於這準備工作的繁重，這個階段不能過短，但也不一定需要像初想的那樣長。假定刑法方面分爲兩部份，民法方面分爲若干部份來準備，每一部份的總結工作應該以幾個月爲期來做好它。做好了這一階段的工作，就進入第二階段，就是草擬草案的階段，起草須先作重點討論，再起初稿；起稿後再審查討論，審查討論後再修改或重新起稿。審查討論時也必須有各直接有關方面的實踐經驗豐富之人參加。這樣反覆地起

草、討論，討論、起草，然後擬出初步的草案。這種草案應送立法工作的上級機關審查指示，並送中央有關機關，和有重點地選送地方機關徵求意見。然後再行修改，再提出草案。上級機關再審查的結果可能發回再行修改。這樣最後提出的草案可以是一個「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律，是可以付之於實踐的。

有人要問：法律是一個何等重要的東西，如果只是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怎麼就可以作爲法律來實行？實踐論已經一般的指出：「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的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尙未充分暴露）」。法律當然與一般的計劃、方案又有不同，必須更愼重地，更求其切合實際地來制定。我所要指出的只是：完全切合實際需要的法律是很少有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爲立法不能制定完備的法律，就爽性不去立法，因爲這種法院常用的基本法律，有了一部不完備的，比沒有要好，有了之後做工作比沒有之時要做得好。我們不要因噎而廢食。可是立法不完全切合實際需要的這個毛病，却是立法工作者所必須注意防免的。在現階段的立法工作中，最重要的防免方法就是要使所立的法在固定性中帶有靈活性。我們要制定一種法律本來就是爲得要解決其範圍之內的許多問題，並將這許多問題解決的內容固定下來。可是雖然其中若干問題的解決內容是可以完全固定下來的，其中也有若干問題的解決內容是必須在固定性之中帶有伸縮性的。這種伸縮當然不應該是漫無限制的伸縮，而應該是在一定標準之下，一定原則之下的伸縮。這種靈活性在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實踐迅速發展的今天尤有必要。我們並不能說：這樣制定的法律就可以完全適合實際的需要；它仍舊還有缺點的。補救這種缺點的方法就是修改法律。法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時可以修改的；不過立法工作者在立法之時却不應該預先就準備着很快地就把它修改。

各地法院中有很多的表示過它們需要有法律，在工作報告中，在去年全國司法會議上和在司法會議前提出的書面意見中，及個人談話中都表示這種希望。目前審判員審判案件，除少數問題有法令可以依據外，大半是專憑政策和自己的經驗來進行。他們所憑的政策當然就是他們所瞭解的政策。政府照上述方法所制定的法律固然不免有缺點，然比之審判員個人所瞭解的政策當然會更正確些。審判員在沒有法律依據時，他還須多做一種工作，就是每審判一個案件就必須做一套立法工作者所做的工作——他必須總結他自己所有的經驗，經過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得到他自己對於解決案內各問題所應用的法律結論。這是一個鄭重的負担，是使他不能更快地辦理案件的重要原因；而且個人所得到的結論總比不上政府所制定的法律。法院以外的機關和人民當然也都需要法律。所以這種雖然不很完備的法律，在目前也是有勝於無，十分需要的。

以上是講立法工作。講到司法工作問題，目前審判員辦事多半是靠他對於政策的瞭解和他個人經驗及法院經驗的運用（許多法院還經常總結它們的經驗）。審判員這樣做久了，就會認爲專靠經驗已經足夠，法律的概念、判斷和推理，法學的理論，是可以省去的，或者竟是有害的。而實際上他們在審判案件的時候却經常在那裡做概念、判斷和推理階段的工夫。所以在目前法院常用的法律還很缺乏的時期，法律知識和法學理論的學習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有了法律，要能眞正瞭解這種法律，正確地去執行它，這種學習還是同樣重要的。所以目前必須鄭重提倡法院工作者注重這種學習。舊法學理論當然是有害的，而我國的新法學理論還沒有建立；我們不能等待新法學理論建立起來了再來學習，我們必須一面學習、研究，一面就幫助着來建立它。

最後，我還想講一點法律教育的問題。現在法律教育工作者一般地都感覺到教材不足。一方面缺乏實際材料，一方面缺乏馬列主義法學理論的研究；當然更缺乏兩者的結合。第一種的缺乏是感性知識的不足，第二種缺乏是對馬列主義理性知識的不足。我認爲感性知識和馬列主義法學的理性知識兩者可以同時充實，而且一面就把它們隨時結合；也可以對它們作重心的分工研究，這就是你注重理論，我注重實際材料（當然並不是完全不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再來共同研究，共同結合。人與人可以這樣分工、合作，學校與機關、團體也可以這樣分工、合作，機關、團體相互間也可以，學校與學校相互間也可以。個人、學校、機關、團體在沒有另一方面合作的時候，暫時先注重一方面的研究，也未嘗不可以；因爲我們要結合兩種知識，必須先已有了兩種知識，在兩種知識都缺乏的時候，任何一種知識的充實都是以後結合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不能因爲一個個人、學校、機關或團體在某一時期注重研究理論，就當它是教條主義；因爲它在某一時期注重充實感性材料，就當它是經驗主義。

總之，無論就立法、司法或法律教育而言，都不應過久地停留在求取感性知識的階段，也不能一躍就達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我們必須一面充實感性知識，一面學習馬列主義及其法學理論，隨時結合；並分工合作，共同結合。

龐藎青： 今天還這個題目來談的目的，是因爲在目前法律與法學工作方面，包括着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和法學教育工作在內，在思想上還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工作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何才能統一起來，基本上是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只要我們對於毛主席的實踐論有了深切的了解，用實踐論來改造我們的學習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便會把各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統一起來，把當前的法律與法學工作提高一步。

在法律與法學工作方面，有兩種違背實踐論的偏向，一種是教條主義的偏向，一種是經驗主義的偏向。

在法律與法學工作方面的教條主義的偏向，主要表現在觀察問題或解決問題時，只重概念，從概念、定義和書本上的知識出發，不從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或基本上不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不去調查或很少調查實際的情況；不把法律與法學的建立，放置在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的研究和掌握的基礎上，而是從主觀願望和主觀的知識出發，這樣自然就會脫離實際，走到教條主義。

另一種是經驗主義的偏向 。這主要表現在否認法律與法學的專門性。認爲只要懂得政策就够了。法律是政策的條文化，但法律並不等於政策。又有認爲法學不過是國家理論的一部份，懂得了國家理論，也就懂得了法學。但法學雖然是在國家理論的總的原則之下，但絕不能說法學理論，就等於國家理論。法律與法學有其一定的範疇、內容和形式。忽略了法學的專門知識，不認眞的研究法學，認爲蘇聯的法學，只是蘇聯社會的反映，對於我們中國法律和法學的建立沒有多大的用處。這種想法和作法，可能推遲我們法學的建立，也可以說是一種經驗主義的偏向。另外，就是只重經驗，不重理論，即或在工作中獲得了許多經驗，但不能把這些感性知識和經驗，提高到理性的階段。這自然更是經驗主義的一種形式。

怎樣才是法律工作和法學研究的正確方向呢？根據辯證唯物論和實踐論的原則，我們的法律和法學的建立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要廣泛的研究政法方法的工作情況、動態和資料，總結政法方面及有關法制的經驗，以感性的知識爲研究的重心，把感性的知識提高到理性的階段，這樣去了解其內部的聯系，發現和掌握客觀的規律。但片斷的經驗怎樣才能科學的總結？感性的知識怎樣才能提高到理性的階段呢？這必須有馬列主義的理論武器，其中包括着馬列主義的法律理論武器，假若缺乏這些理論武器，縱然有豐富的經驗，和大量的材料，也很難把這些經驗和材料加以科學的總結，和提高到理性的階段。

蘇聯的法律和法學，不但是蘇聯法制工作的總結，而且它的法學是人類有法律以來的最高發展和最高成就，它對於我們新法學的建立，是有其一定的指導作用的。我們應該好好地學習它，來提高我們。但蘇聯的法學雖好，若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硬搬過來，也不免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

我們所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會議的制度，和蘇聯的蘇維埃制，都是實行民主集中制。但根據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經驗和民主建政的經驗，我們產生了一種新的協同的辦法。我們的選舉辦法，有各種形式，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也不同於蘇聯的。是根據當前各地的客觀情況和選民的主觀情況制定出來的，它是從實踐中來的，是實踐經驗的總結，絕不是抄襲任何外國的。我們的政協三大文件，無論從內容或形式，都有其特點，都是幾十年革命鬥爭革命實踐的結晶，既不是抄襲蘇聯，也不是抄襲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但總的理論指導都是馬列主義。

閻希賢：

我來談談實踐論如何同司法工作相結合。請法學老前輩們指教。我們的經驗主要的是鎮壓反革命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實踐。今天的司法工作，經驗主義要比教條主義佔勢力，主要的毛病在經驗主義。從幹部的來源上看，有三類：一種是從山溝裡來的老幹部，以前的經驗不合適了，一種是舊人員，他們有的是舊法院的反動的經驗，其次有少數的大學裡來的學生幹部，有一點點教條主義，但主要的是第一種。

現在司法工作沒有系統的法律，是司法工作者很大的困難，大多由一些人考慮、討論、調查、和旁的機關接洽，這樣來估計式地作判斷。但是僅憑調查還是不够的，尙停留在感性階段，有時感性材料可能就錯了，也可能發生片面或表面觀，因之感性階段是不能正確的判決的，即使調查的感性材料正確了，也還需要分析、判斷、推理、提高到理論水平、政策法律水平以後才能作判決。因此我們司法工作者，今天需要理論、即需要法律，是很急迫的。

另外，我認爲判決的正確與否還得看執行的結果如何，執行得通不通，羣衆的反映好不好，以這種實踐證明該判決是否正確。所以我主張執行和審判不應分開，或者由審判員指揮一些執行員，來執行判決。這樣可以用實踐來檢查判決是否正確。使理論實踐統一，循環發展步步提高。

法學工作者早就應該把握住實踐論的方法。但現在來把握，也不算遲。

謝覺哉：

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據我所知：第一是從實際出發，他了解實際的方法是親自到那兒去了解。要了解工廠就去工廠找工人談，要了解農村，就到農村找農民談，要了解戰爭就親自上前線。他早年爲要了解湖南各地情況，曾親自遊歷過湖南十多個縣。其次，毛主席讀書很多，但絕不受書的束縛。他說古人把讀書叫做「攻」書，把書當敵人一樣來「攻」，攻爛它，才能了解它，書才爲我所有。但到處理問題的時候，就要把書丟開，着重分析事件，得出辦法，而不是說書上怎樣，我也怎樣。第三，凡事經過研究，得出結論，可以照着做了，但仍不認爲是一成不變。從實際出發作成的方案，再回到實際中去考驗。他說：原定的方案「毫無改變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

理論同實踐結合以後使產生適宜的新的東西。新法學也是一樣。

法律是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統治階級，爲了保存自己，克服敵人的工具。法律條文都是經過實踐產生的，先有實踐而後有法律。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法律不完備，並不奇怪，因爲新民主主義統治開始不久，實踐還不够。因此，今天寫法律須要機動靈活。如過去頒佈過一些條例辦法，但最後往往說讓地方視具體情況擬定實施辦法，否則，容易限制人民的創造。又如我們規定專區不算一級，但最近有些民族雜居地區選舉了專員，成立了專區聯合政府，它實際需要，難道不承認它嗎？

直接知識和間接知識問題。人的壽命有限，知識大部來自間接方面。但如一點直接知識都沒有，便不容易了解間接知識。比如殺猪，一隻也不殺，就不知殺猪是怎麼回事，但也不必大猪、小猪、黑猪、花猪都要殺一遍，才知道殺猪，殺一隻或幾隻猪就够了。

現在一部份人在大學裡教書，另一部份人在做政法工作，應該多交流情況，教書的人，要參加些實際工作，作實際工作的人也要學習理論，這樣配合起來，才能趕上客觀需要。

「……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座談會記錄（第二部分）——

時間：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地點：北京南河沿金鈎胡同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
主席：艾思奇
紀錄：李方濟、王太慶、楊憲邦、晏成書

艾思奇：今天我們繼續討論「實踐論」。北大哲學系的先生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現在將這篇文章分發給各位，並且請鄭昕先生代表北大報告。

鄭　昕：（報告內容見本刊四卷一期）

湯用彤：關於第一段新舊哲學的區別，我們曾經討論過三四次，這只是初步的意見，意思雖很簡單，詳細說出來卻非常困難。這一段文字的寫法，我們自己也不滿意，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以便修正。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是用新哲學批判舊哲學的重要關鍵。請大家多加批評。

馮友蘭：說「新哲學正確地提出問題，舊哲學錯誤地提出問題。」這是對的。但新舊哲學的問題總有聯繫，否則無法比較，無法批判和清算。

湯用彤：這一點我們曾經爭論很久，新舊哲學的問題誠然有相同的，但也有不同的，我們是強調它們不同的地方。

任　華：問題是有相同的地方，不過資產階級的哲學受階級性的限制，問題的提法有錯誤。近代西洋哲學中，不僅唯理論，經驗論也一樣，可以說都多多少少從個人出發，其主要表現在把自我、意識、觀念與客觀存在割裂。據我的理解，近代西洋哲學的認識論，不論唯理論與經驗論，都是問認識如何可能，由於他們先就把自我、意識與客觀世界分離，在它們中間劃了一道鴻溝，所以得不到正確適當的解答。

沈有鼎：在這點上，實用主義與辯証唯物論表面上有相同的地方，杜威也說舊哲學的提法不對，自然，這只是說法相同，實質上是不相同的。

湯用彤：任先生的問題我們也曾討論過。一個問題可以從三方面看，就是：問題的提法——問題本身與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為問題的提法影響問題本身，提法不同，所以本身也不完全相同。問題的提法和問題本身既不同；因之，問題的解決也不會相同。

鄭　昕：我們的提綱從表面看來，似乎過去的哲學都是錯的，可以一筆抹煞。資產階級的哲學的確有進步的地方，但因我們着重在批判，着重講新舊哲學的不同，所以資產階級哲學的進步性略去不談。

任　華：問題的提法與問題本身當然有關係。新舊哲學問題的不同，如馬克思所說，在於一個是解釋世界，一個是改造世界。

馮友蘭：問題的提法儘管不同，哲學上總有幾個眞正的問題，如心物問題、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知行問題等都是。基本問題雖然相同，但因為立場、觀點、方法不同，所以提法也有不同，有些人就把問題歪曲了。但，無論如何，總有幾個眞正的問題存在着，否則，說歪曲便無標準了。

湯用彤：照馮先生的說法，如果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在什麼地方，是不是有一個超階級的標準？

沈有鼎：說「實踐論」所討論的知行問題，不是中國哲學中所討論的「知行問題」，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基本問題不同；另一種解釋是基本問題相同，而問題的提法不同。兩種解釋應加以分別，以免混淆。

馮友蘭：正確的標準是無產階級才能提出的。辯證唯物論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哲學，一方面也是眞理。如文章中所說，「無產階級的哲學必然是眞理」。新舊哲學的不同，在階級立場不同，因為階級立場不同，所以對問題有不同的提法，可能提出假問題，可能提出錯誤的問題，也可能正確地提出問題。

王太慶：問題是人類共有的，提法則確有不同。我們強調階級立場，而不強調問題本身。

任　華：不能籠統地說「無產階級沒有義務解決過去的問題。」恐怕無產階級是有義務來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的，因為歷史不能割斷。問題是在人類歷史中摸索出來的，不能說以往的問題完全錯誤。

湯用彤：說「沒有義務解決從前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強調。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主要的不在解決從前遺留下來的問題」。

王維誠：是否有這樣一個情形：問題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從整個哲學看來，問題有普遍性；從個別的哲學看來，問題有特殊性。忽視特殊性，就沒有普遍性。認識論中各派各有其特殊的看法，但是是存在着基本的問題的。

許寶騤：我想問題還是有共同的。毛主席的「實踐論」是論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其中批判了唯理論與經驗論關於認識與實踐這一問題的解答。可見「實踐論」認為問題是共同的，只是唯理論與經驗論解答錯誤。我們所批判的，着重在問題的

解答或結論。

鄧艾民： 問題的提法與解答是有關連的，不能絕對分開。問題的提出，就包含了一套理論和它的解答在內，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強調問題的不同。除了具體的標準外，是否還有一個抽象、懸空的標準在那裡？這裡顯出了兩種不同的看法。

王太慶： 歷史當然不能割斷，歷史主義是我們的基本了解。我們所强調的，還是新舊哲學的區別。新哲學是舊哲學的辯證發展，是舊哲學的革新，而不是舊哲學的繼續。

楊獻珍： 新哲學對舊哲學確實是個嶄新的，根本的革命。新哲學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總結了過去的思想，將歷史上存在着的問題加以解決。關於新哲學是舊哲學的根本否定這一點，我們應該提高到日丹諾夫在「關於西方哲學史的發言」中所表示的態度。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於舊哲學，我們還是要予以適當的估計。例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有其進步性，不過，唯物辯證法與唯心辯證法不同，這一點我們應該如此提出。對於中國哲學中各種知行學說也是一樣，我們也應該予以一定的歷史估價。

艾思奇： 剛才的討論，限於歷史方面的問題，這只是文章的第一節，時間已經不早，各位請就其他問題發表意見。剛才的問題，當然也還可以談談。

金岳霖： 我贊成今天這篇文章的提法，以表明新哲學與舊哲學完全不同。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這問題不應把它當做思想中的問題，而是把它當做生活中的、社會上的問題。現在的思想，雖否定過去的思想，但並不否定過去的問題。「實踐論」所討論的知行，雖與以前所謂的知行不同，但是我們還是承認它解決了從前的問題。我們並不以為有一個抽象的標準在什麼地方。

我們學習「實踐論」，強調實踐，這是對的。不過，我個人感覺不能因此忘掉了理性與認識。「實踐論」上說：「認識與實踐的責任現在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的頭上。」可見「實踐論」也很着重認識。毛主席有許多文章談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這些都是教我們搞清楚形勢，掌握住情況，來作為行動的根據。總之，對革命經驗來說，認識也是很重要的。上次的文章和今天的文章似乎給人一個感覺，忽略了認識。

林志鈞： 從實踐中，可以認識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抓住規律性，就是哲學，抓不住規律性，就是空話。這規律性在文章中最好多發揮一點。中國哲學中，對規律性很少提到，即或講規律，也是主觀的規律。

沈有鼎： 「新舊哲學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句話，可能引起誤會，應該刪去。其次，「舊哲學錯誤地提出問題」這句話也可能引起誤解，可能使人想到維也納學派及杜威，因為他們也曾這樣批評過以前的哲學，自然，他們說這話的意思是不同的。

鄧艾民： 這篇文章的文字，的確有一些地方需要斟酌，但基本精神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只講階級性就完了。我們要看出階級性如何貫注在各種問題的提法與解決中。此外，我還感覺，除了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以外，並沒有一個抽象的孤立的問題。

任繼愈：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有一個孤立的問題在那裏，我想像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的。提出問題就是為了要解決它，舊哲學因受種種限制，所以是錯誤地提出問題，錯誤地解決問題。關於新舊哲學沒有必然聯繫這一點，我們這麼說，乃是從某一方面去看，我們並沒有肯定二者毫無聯繫。

楊獻珍： 我覺得金先生的看法是值得我們考慮的。毛主席提出實踐這個問題，正是馬列主義哲學最基本的問題。舊哲學之不能解決問題，在於它們顛倒了，不知認識源於實踐，而專從自己的思想意識出發。馬列主義又提出規律性的問題。客觀世界的規律性是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認識的。這樣從實踐中得來，掌握了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作用很大，它可以回過來指導實踐，改造世界。

楊憲邦： 如果不注意問題從何產生，如何發展，任務是什麼，那麼，我們對於問題的提出，是不會得到正確的看法的。每一個問題的提出，都是為的完成一個一定的任務，都是要解決一個實際的矛盾。有矛盾存在，就有問題發生。所以，問題的存在，是由具體的客觀存在來決定的，客觀存在逐步向高級階段發展，問題的提法和解決方法也逐步向高級階段發展。離開了具體的矛盾，離開了問題的具體的歷史階段和任務，是不能談問題的。例如，康德也有認識問題，可是，康德的問題是講認識可能的條件，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問題，是講認識的發生與發展。因為任務不同，所以問題也不同。相同的只是「認識」這個概念。概念不是原來就存在着的，而是隨着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

艾思奇： 我們這兩次所討論的文章內容，基本上都是好的，都是有系統地講了一些重要問題。將來經過修改，發表出來，對於一般學習「實踐論」的人，都會有幫助（這兩篇文章，已分別發表於本刊三卷六期與四卷一期——編者）。不過，這兩篇文章都沒有把毛主席的「實踐論」的各方面完全加以發揮，所以有人感覺有些遺漏，這是因為我們着重在歷史上的批判的原故，因而對於當前革命運動中一部分人的錯誤，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沒有能談到。不過，這也沒有關係，因為如果每篇文章能各得一體，集合各方面的發揮，整個「實踐論」的內容，也可以表現出來。

文章的第一段是必要的，對於新舊哲學的不同加以解釋，作為解釋以後各段的基礎，這是很自然的。今天大家對於這一段都很感興趣，發言熱烈。我個人也有點意見。新舊哲學的不同，我認為主要的有兩點：一、新哲學是科學，它正確地揭發了主客關係和發展規律，而舊哲學在這方面沒有正確的，完整的，系統的揭發，雖不能說是沒有一點發現，但只是片面地，片斷地談了一些。毛主席的「實踐論」，文章雖短，可是很清楚地、不容辯駁地解答了主客關係與發展規律。正是因為正確地、有系統地揭露了、認識了客觀的規律，所以能正確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成為改造社會的武器。而舊哲學因為對於自然和社會沒有正確的、有系統的認識，所以在這方面無能為力。這一點值得強調，文章中可以更具體地加以說明。二、辯證唯物論是與人民結合的。辯證唯物論的特色，是實踐性和階級性。它與廣大人民的實踐結合，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不是只與少數個人、剝削階級的需要

結合，爲少數剝削者效勞。這兩點是新哲學與過去一切哲學都不相同的地方，過去的哲學只是對少數人民負責，而不是對廣大人民負責，因此也不是爲人民服務的。最腐敗的哲學，是純粹個人主義的哲學。從人民的實踐經驗出發，提高到理論，然後又回過來指導人民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這是辯證唯物論對於舊哲學的革新處。如果提出了這一點，其他的枝節問題，我想都可以解決。至於是否新舊哲學有共同的問題，我想可以肯定地答覆是有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心與物的問題。不過，圍繞着這基本的問題，可以有一些不相同的問題。有人反對這樣提，或說西洋哲學有心物問題，而中國沒有，這是不正確的。新舊哲學的關係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關係，是革新，因而也是提高。每一時期進步的哲學，都比以前的階段提高一步。自然，其中也偶而有後退的現象，譬如，馬哈主義就比康德思想退步。不過這種哲學乃是代表沒落時期資產階級的哲學。看問題應該從發展來看。王維誠先生把哲學分爲普遍的與特殊的，這句話有點問題，値得討論。

其次，關於文字，我也有一點小小的意見。「在一般的認識過程中，有兩個必要的步驟」，這裡所謂「兩個必要步驟」指的就是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我覺得不如明說，以免誤解。因此，這句話我想可以改爲「在實踐的基礎上，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舊哲學都是爲剝削階級服務的」這句話恐怕也需要注一下，因爲舊哲學不一概是唯心論的，也有唯物論的，因而，舊哲學也不完全是爲剝削者服務的。文章中關於費爾巴哈的批判很深刻，批判舊哲學所了解的實踐是抽象的也很好。不過何以說是抽象的，最好加以說明。舊哲學的實踐因爲只是道德的、倫理的行動，而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所以是超時空的、超階級的，這一點如果發揮得更詳細一點，就更明確了。說黑格爾的「行」只是沉思，這一點恐怕需要補充，因爲黑格爾的「行」除沉思而外，也還包括其他的活動，不過這些活動不是具體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而已。

第六段，對於實用主義的批判最具現實意義。實用主義從五四以來在中國知識份子中間影響很大，我們加以批判是非常需要的。如不脫離實用主義的影響，就不能與勞動人民結合。實用主義中心的內容，在反對根本的改變，主張點滴的改良。從前胡適與李大釗的論爭焦點，就在這裡。李大釗主張勞動人民起來推翻舊政權，胡適則提出好人政府，主張進行一點一滴的上層建築的改造，使知識份子滿足於改良主義，阻止他們與工農接近，這就是實用主義的反動本質。它底科學面貌是僞裝的 。對於一種哲學，我們要分清楚它的語言與實質。語言的科學僞裝改變不了反動的本質。實踐與實效是不相同的。實效考驗是個人的、主觀的，牧師可以宣傳其迷信教義，得到一些人的盲從，雖有實效，決不能算是眞理。「實效說爲資產階級的技術服務」，最好改爲「爲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技術服務」，因爲我們現在還有民族資產階級；並且，也不僅是爲其技術服務，而是爲其整個剝削行爲服務。又，「實用主義基本上是唯心論的」，應該改爲「完全是唯心論的」。這一段材料很好，希望能多加發揮。

關於結論，我看得還不仔細，將來可以多想一想。不過，「感情上還是留戀自己研究多年的哲學」這句話恐怕不太妥。因爲感情與認識是有關聯的，最好改爲「實際上還沒有脫離舊哲學的影響」，比較科學一點。

我的意見是否正確，還請大家提意見。

邰爽秋： 唯物論與唯心論兩大陣營的對壘，基本上是心物問題，結論中卻說，「以實踐作爲標準，分爲兩個營壘」，恐怕會引起讀者的誤會。

文章的題目是「從過去哲學的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文章最後的結語是「讓我們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來改造我們的學習」，題目與結語似乎不一致。結語很好，因爲實際上，我們是從實踐論的學習來批判舊哲學；而按照題目，先後恰好倒置，不知是否可以將題目變動一下？整篇文章，對新舊哲學的區別講的不少，但是對於毛主席的特殊貢獻在什麼地方，在那些方面發展了馬列主義都沒有說明，對於毛主席的話發揮得不夠多。

金岳霖： 上次艾思奇同志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因爲時間匆促，不及詳談，今天是否可以談一下？

艾思奇： 這個問題我正在想，將來或者寫成文章發展，現在還不能多談。簡單地說，雖然我們可以肯定基本原則在馬恩列斯的著作中都已經有了，但只有在毛主席的著作裡，這些原則才得到充分的發揮。誠然，毛主席並沒有提出新的原則，但是他以新的實踐，新的人民鬥爭經驗充實了馬恩列斯的基本理論。例如，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分別與聯繫這一點就是。毛主席之所以提出這一點來，是因爲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教條主義者不知道低級認識的必要，經驗主義者不知道理性認識的必要，這兩種思想都是片面的，都曾使革命蒙受損失，因爲這種實際情況，所以毛主席感覺有明確地提出來的必要，並且反覆地加以說明。馬恩列斯雖也批判過教條主義與庸俗的經驗主義，不過沒有着意發揮；毛主席則把理論與革命的指導結合起來談，有系統地，完整地概括了革命的經驗，因此，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在「實踐論」中得到了完整的綜合。上次我們還提到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的問題，於是有人寫信給我，說這些話列寧已經談過。不知道相對眞理絕對眞理與左右傾機會主義結合起來討論，就是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的地方。我們可以說，「實踐論」中每一點都是馬恩列斯所談過的，但是認識論與政治上錯誤的概括總結這一點，是以前沒有談到的，這就是發展了馬列主義。

王駿聲： 辯證唯物論講科學的預見，但是毛主席說，在封建主義的時代，不能知道資產階級社會的情形，這一點如何解釋？

艾思奇： 預見是有限制的，譬如馬克思只能見到共產主義的大方向，而不能預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情形。

鄭　昕： 今天諸位先生提出的意見都很寶貴，我們將根據這些意見來修正我們的文章。諸位如果還有其他意見，今天來不及談，希望能以書面提出，寄到北大。

艾思奇： 今天的討論到此爲止，現在散會。

（本稿未經由原發言人一一校閱，紀錄文字如有舛誤，由紀錄者負責。）

學術問答

【問】「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有什麽不同？「治外法權」是不是包括「領事裁判權」？

（北京　郭平凡提）

【答】「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所有國家在國際公法下一律平等享受的權利；後者則是帝國主義國家以特別條約規定强迫加諸弱小國家的片面的、不平等的限制。但是，在普通用語上，這兩個名辭却往往被混爲一談。

嚴格地講，「治外法權」應當專指一國元首、外交官、軍隊、或軍艦上人員在另一國領土內不受當地國法權管轄的意思。這些人都有國家代表的性質。基於國家獨立平等的原則，一個國家不得對一個友好國家或其代表行使管轄權。因此，當地國不同意他們入境則已，如果同意了他們入境，就必須承認他們享受管轄的豁免。除了代表性以外，外交官由於他們職務的需要，軍艦和軍隊由於它們維持內部紀律的需要，尤其必須不受當地國法權的干涉。總之，這些人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國際公法承認他們構成領土法權的例外。這種例外，對於所有國家是一律適用的，因此雖然對當地國而言，主權受了限制，但這並不意味着對主權的破壞。這種治外法權原則是被所有的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在內——所一致承認的。

治外法權只是禁止當地國對於享受特權的人行使管轄權，並不是承認這些人可以任意破壞當地國法律。他們應當自動遵守當地國法律，如有違犯，經本國的同意，當地國可以加以管轄，或由當地國通過外交途徑，請其本國予以處分。遇有享受特權的人有危害當地國國家利益的行爲，在緊急情形下，當地國爲自衞計，有權加以制止，甚至加以臨時拘禁及驅逐出境。

「領事裁判權」是指一國普通人民在另一國的領土內不受當地國法權管轄，而受其本國法權管轄的意思。通常這種管轄權由領事行使，故稱「領事裁判權」，但亦有專設法庭者，如一九〇六年美國在華設立的法庭即是。通常領事裁判權的適用，限於外國人爲被告的案件，但一八六八年「上海洋涇濱設官會審章程」却規定只要當事一方是外國人，甚且當事一方爲外國人所僱用的華人時，外國領事便有參加審判之權。光緒末年，凡在上海租界內的華人刑事案件，縱不牽涉外國人，也由領事派員會審。這是領事裁判權最苛刻的例子。

領事裁判權制度對當地國主權構成嚴重的破壞，是帝國主義奴役半殖民地人民的卑汚手段。在領事裁判權制度下，外國人可以對當地國的法律任意破壞，對當地國人民任意欺凌，而不受懲罰。理論上，他們的領事應當依照本國法律加以制裁，但實際上他們是串通一氣的。理論上，當地國人民官司打敗了是可以上訴的，但是誰又能去倫敦或華盛頓上訴呢？在這種情形下，享受領事裁判權的國家的國民在當地國形成了逍遙法外的特權階級。

歐洲在中古時期，也有過外僑依本國法律治罪的習慣，但自從領土主權的觀念興起後，這習慣便歸消滅。最早的領事裁判權條約是一五二八年法土條約。這是基督教國家對回教國家歧視的具體表現。到了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就把這種不平等的制度推廣到近東和遠東，作爲統治半殖民地的枷鎖。中國第一個規定領事裁判權的條約是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該約第十三條規定，華人控訴英人，或英人控訴華人，均須向英領事投訴，如領事不能勸息，「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既得實情，即爲秉公定斷，免滋訟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按即領事）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依照這項規定，遇有中英混合案件，無論英人是否被告，均由中央雙方會審，但英人之處罰則由英領事依照英國法律決定之。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的中美望廈條約把這種領事裁判權制度又推進了一步（有些歷史書藉，例如劉大年著「美國侵華簡史」，以及某些以劉書爲根據的文件，認爲領事裁判權是由美國首開其端，實不正確）。依該約，混合民事案件仍採會審辦法（第二十四條）；關於混合刑事案件，美國人爲被告時，美國領事有權單獨「捉拿審訊」，不須和中國官員會審（第二十一條）；條約中並規定，遇有美國人與第三國人發生爭執時，「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第二十五條）。後面兩條的規定，比中英條約又毒辣得多了。

中國人民受領事裁判權的壓迫，已有整整一百年。一九一七年中國因對德奧宣戰，廢止了德奧兩國的領事裁判權。蘇聯於十月革命後即自動廢止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並在一九二四年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予以規定。此後，中國人民不斷奮鬥，要求廢止列強的領事裁判權，但無結果。直到一九四三年，經中國人民六年抗日戰爭之後，美英帝國主義才被迫放棄這項特權。但是，由於蔣介石匪幫的出賣，整個中國幾乎成爲美帝的殖民地，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名亡而實存，直到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後方才根本肅清。世界上其他受領事裁判權壓迫的國家已經先後掙脫了它的束縛，今日這個制度可說已經成爲歷史上的名辭。

「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是這樣兩個迴然不同的概念，有如上述，但是不幸由於名辭的混用，使得兩者的區別模糊不清。「治外法權」有時被人用作最廣義的解釋，包括「領事裁判權」在內。因此有些書籍和文件中談到「領事裁判權」時，卻用「治外法權」來表示它。例如一九四三年中英及中美條約都是這樣。在英文中也發生同樣混亂現像。Consular Jurisdiction 是「領事裁判權」，那是沒有問題的。但Exterritoriality和Extraterritoriality兩辭的意義就非常含混。有人把兩字都作「治外法權」的狹義解釋（即指外交官等的特權），也有人作廣義解釋（即包括領事裁判權在內）。但也有人認爲Exterritoriality 應專指狹義的「治外法權」，而Extraterritoriality應專指「領事裁判權」。從字面上看，這種區別似乎是正確的。雖然這並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我們必須肯定這區別是必要的，因爲「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制度：一個是國際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一個是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殘迹，決不能容許其混淆不清。帝國主義者把這兩個名辭混攪在一起，迷糊人們的視聽，不是沒有用意的。因此我們把它們區別開來，是十分必要的。

（陳體強）

【問】中國私有制起源於何時？當時的生產關係怎樣？

（濟寧　郭景濂提）

【答】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由生產手段的所屬的性質決定的。而中國生產手段私有制的起源於何時雖不可知。但最早的明確而具體的史料，只有曶鼎及其同時代的幾件古器。曶鼎銘文第二段敘述曶以「匹馬束絲」向限買五名奴隸，成交後，限變卦；曶又改用金屬一百寽，說妥後限又變卦，終至涉訟。銘文第三段敘述匡季願以田七田，衆一夫，臣五人去賠償他搶劫曶的十秭稻的損失，不願出三十秭禾的罰項。這兩段銘文，一以奴隸交換絲與馬，所表現的都是物與物的交換關係。這種交換關係的兩方面，對於奴隸、田、馬、絲、禾及稻都是私有主，這是確定無疑的。但從交換的物品上看，有生產手段，有生產者，也有生產品。就是說匡季、曶、限都是既佔有生產手段又佔有生產者的奴隸主。那麼，這是否能說中國當時社會的主要生產關係已經和西方古羅馬奴隸佔有制時代的生產關係一樣了呢？這似乎還有考慮的餘地，因爲在這一交換中還存在着另外一個內容：即奴隸的價值驚人的低賤。有人說，奴隸價值低賤是因爲奴隸的數量多。這只說明了後代商品經濟時代的部分道理。因爲在曶鼎時代，如果當時主要的生產工具——農具已經是鐵製的，或者有了鐵犂或鐵鋤，而不是石器和木器，奴隸的勞動力，對於森林的採伐和田野農業的開闢，都是極爲需要的（可惜還沒有），則奴隸的價值決不至於如此之低賤。因爲奴隸價值的高低，是由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的，即由他用某種生產工具能生產多少剩餘價值決定的，偶然的因素不是決定的條件。在這裡，奴隸的價值低賤，所說明的只能是當時生產工具的原始性。所以，在同一銘文裡，不僅奴隸的價值低，同時作爲生產手段的「田」的價值也低得驚人。

其次一個問題，即曶鼎的時代性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定爲周孝王時代。如果這一考定無誤，那麼，我們可以說曶鼎的時代就是中國私有制開始形成的時代，或稍前，但也不會太早。

周孝王時代約當西周的中葉，即紀元前十世紀前後。上述的推論是否與當時的生產方式相符呢？回答是肯定的。就西周的主要農具說，一爲耒，即一根彎曲，前端叉銳而有歧出的木棒，長度約一米達。這種農具主要流行於殷人生活的區域。次爲耜，即一根直木棒，前端扁平，或加尖形石片，長度約同耒，其流行的地方爲周人生活的區域。其三爲耡，是由耒與耜發展改造而來的新農具，即木棒前端用籐索或皮筋條縛一塊尖形石片，可以捶擊的姿式發掘土塊。但這種新農具，當時似乎還不很普遍。用這些原始的農具，所能有的生產形式，只能是周初的詩上所描寫的：「十千維耦」（詩噫嘻），「千耦其耘」（詩載芟）及「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詩臣工）。總之：集體耕作。這裡的生產者：耦耕者和衆人，當然都是奴隸。不過，這裡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即這些奴隸還不是西方古羅馬勞動奴隸制的奴隸。因爲，如魯公伯禽受封時所得的「殷民六族」，衛康叔的「殷民七族」，唐叔虞的「懷姓九宗」式的奴隸，一般的叫作「民」

一。這個民，即大盂鼎上「受民受疆土」，尚書康誥上「誕受天命，越厥邦厥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義」，洛誥上「誕保文武受民……」及周公說的「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的民。這種民是由天命及「在帝左右」的先王授給他們的。所以，這種民，雖然可以假天命或先王的意旨或方案來屠殺，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殺無赦」，但他們却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意志，不等於會說話的牲畜。康誥上說：「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義民！」因此，奴隸主對他們必須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義」。因此，這種民的身份也頗不同於我們後代一般所謂的奴隸。他們除了作爲奴隸主「永享」的關係之外，還有着家屬的成份。禮記中庸謂：「子，庶民也」。孟子引詩「庶民子來」。而子義爲滋，爲孳，即從主體孳生出來的。所以周制：天子諸侯宗統與君統合而爲一，禮喪服庶人爲國君，與曾孫爲祖父母之服相同，都是齊衰三月。由此可知，西周的奴隸，還是家長奴隸制，即奴隸還是氏族的成員，而非古羅馬的勞動奴隸制。

家長奴隸制的特徵是奴隸還不是整個經濟的基礎。奴隸只是一種補助力量，是主人的助手。主人自己也參加生產。對奴隸的剝削，還帶着有限的性質。所以曶鼎銘文上，匡季搶了曶的稻，是匡季親自率領着奴隸幹的。尚書無逸篇周公說他父親主「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詩噫嘻說到成王：「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都是家長親自率領着奴隸從事生產工作。

因此，西周時代大抵是我國私有財產制起源的時期。它的經濟基礎是由殷末到周初社會第一次大分工（遊牧部落與農業部落的分工），以及當時生產力已經發展到有可能獲得一些可供搾取的剩餘生產物，從而，交換的發展，使社會產生出不平等的現象，即有了富人和窮人的存在了。

這只是奴隸佔有制的初期階段。

（尚　鉞）

【問】生物爲什麼要有雌雄之別？（不要用染色體的差別來說明雌雄之別，請用進化觀點來處理這問題）

（永安　黃旣濟提）

【答】生物爲什麼要有雌雄之別呢？這等於問：動植物爲什麼要有「有性生殖」呢？這是個進化學上的問題。

從生物的進化來說，最早的生命是構造比較簡單的生活物質，叫做「原生質」。在進化的洪流中，原生質內部起了分化而形成「細胞」。這時的生殖作用是很簡單的，即由一塊原生質或一個細胞，分裂成爲兩個。這是「無性生殖」。現在低等的生物，如細菌、變形虫、草履虫等，還都是這樣進行繁殖的。它們都沒有雌雄之別。

以後單細胞生物進化到多細胞生物，如苔蘚植物、水母、蚯蚓等。它們就有了「有性生殖」了。即是有了精子和卵子結合的繁殖現象了。雖然如此，生物體的雌雄之分，在這一階段上，尚是分不清的，因爲它們多是「雌雄同體」。即是同一生物體能够產生精子和卵子，如蚯蚓就是這樣的。但同一生物體的精子和卵子常不自己發生授精作用。

再進一步的有性生殖就有雌雄之別的生物體（雌雄異體）了。例如高等的動物都是這樣。人類也是如此。不過，不管是高等動物也好，人類也好，在發育的早期，本質上是雌雄同體的。這就是有時母雞會變公雞、人類中偶然有「半陰陽」的理由了。

但是生物的生殖爲什麼由「無性」進化到「有性」呢？這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用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1、草履虫的一般生殖方法是無性的。它長到相當大小，便由一個分裂成爲二個。簡單之至。通常一個草履虫可用這方法生殖好幾百代。然後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它不能再進行一般的分裂生殖，活動力減低，好像生了病似的。這時，如果沒有機會「接合」，它便慢慢停止游泳，而終於永遠停止呼吸了。如果有機會接合，結果便完全兩樣。所謂接合，就是兩隻草履虫的身體併排在一起，交換它們的細胞核。細胞核交換之後，它們便分開了，各自走上新生的路：又可活潑尋食，又可進行一般的無性生殖了。

2、有些動物如蚜虫，在環境適宜時，進行「單雌生殖」；在生活條件不好時，進行有性生殖。單雌生殖也叫做「處女生殖」，就是蚜虫卵子不必授精，發育成爲新生物體。可是到了秋天，正常的有性生殖來了。蚜虫的精子和卵子結合成爲授精卵。這授精卵與衆不同，常可以安然渡過冬天。

3、有性生殖——尤其是不同遺傳性的雜交，其所生的後代，變異性很大，適應力較強；無性生殖的後代，變異性小，適應力也弱些。

以上的例子最少說明了：由於不同生物體的原生質的結合（有性生殖），生命力可以增強，變異性可以提高，而且不同生物體的優點，也有機會可以表現在同一後代裡。這於生物的生存和發展，是極有貢獻的。所以在進化史上，有性生殖逐漸成爲高級的生殖方法，這不是偶然的。

（方宗熙）

關於呂著「中國民族簡史」中的幾個問題

馬學良

書評

「中國民族簡史」是呂振羽先生在一九四七年的著作，一九五〇年又經作者增訂過，由三聯書店發行，這本書把中國境內現有的少數民族的歷史，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並且痛斥過去大民族主義對少數民族的毒害。使讀者對於國內少數民族過去所受的痛苦，及今後應當如何幫助他們在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共同担負建設新中國的任務，可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但這樣多的兄弟民族，非一人之功所能全部正確的介紹出來，所以呂先生很虛心的期望着讀者和「特別從事少數民族工作的同志們予以指正」。(增版序言)我讀完這本書，願以讀者的身份，根據個人過去親自調查過的幾個少數民族，想提出幾點和書中不同的意見，向呂先生請敎！

首先，關於中國人種的來源，呂先生以爲有蒙古人種和馬來人種兩個主要來源。因此，書中把苗族，藏族，彝族，(即書中所稱的羅羅族)僰族都屬於馬來人種。他的根源是「地下發現，文獻記載，民俗資料」。但可惜「地下發掘，還沒有系統的科學的進行過」(原書十一頁)現在呂先生所根據的地下材料，只是零碎出土的一點石器，如廣西武鳴舊石器遺物，貴州發現的舊石器等，就是這點材料，還不能確定是否馬來種的文化遺存，所以，呂先生也懷疑的說「可能是馬來種的文化遺存」。這第一個考證的重要條件不能肯定，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就是文獻記載；可是偏巧在文獻中這幾個民族在古代活動的範圍，如關於苗族的紀載即有「三苗之居，左洞庭而右彭澤」，以及苗族關於舜禹黃河的傳說，活動的範圍都是自北而南。因此，呂先生就拋開信史來推測「在數十萬年的過程中，馬來種也有較早便去到今長江與黃河流域同夏商各北方民族發生接觸的可能；一方面那些傳說，也有被早期南下的北方民族帶去的可能。」(原書十二頁)這種想當然的看法，也不能當作苗族是馬來人種的立論根據。

最後還是回到數萬年後，由今日苗族的現實生活來看，那就是民俗資料。呂先生似乎也很重視這第三部份材料，他說：「較可靠的，當從今日苗族的民俗來研究」(原書十二頁)，他舉出苗族今日的風俗習慣如椎髻，服裝，火灶，以及房屋構造樣式等，都與馬來系諸族相似，樂器也是同型的；並且還從體質方面看，也與馬來人有更多相似之點。恕我對於馬來人的風俗習慣知道的很少，在體質方面我也未曾作過體質測量，所以不敢贊一詞；可是，只根據這一點相似的情況，就斷定苗族是馬來人種，很難令人心折；尤其在文化風俗方面，由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在族系互異的民族中間的文化相似點，可能是出於共同的心理，如很多民族文字的起源多由於象形；或者是由文化的傳播，如埃及文化對於希臘文化，阿拉伯文化對於中世歐洲文化的影響，這都可能使幾個不同來源的民族有相似或相同的風俗習慣。

此外，呂先生還想從文字方面作證明，他說：「我所見貴州苗族僧侶所用的象形文字，與甲文周金比較，很難看出其相同的脈絡」(原書十三頁)我不知道呂先生所見的苗族象形文字是什麼樣？據我所知，西南少數民族中只有麼些的文字是象形，彝族的文字早先可能也是象形文字，可是演變到現在，已經看不出象形的意味了，擺彝文是拼音文字，更不會是象形。如此說來，只有麼些文是象形，而在貴州却並沒有麼些族。過去紀載苗族有文字的人，據我所知，一個是法人多隆，他受本國政府的委派，曾在貴州調查過苗族，出重資收集苗文，土人有牟厚利之徒，就寫了一些草體漢字，把多隆騙了一下，這文字還影印在多隆的調查報告中；還有一個也是法國人叫李埃達，他誤把彝文當作苗文。倒是英國人比較聰明，他不但不受本地人的騙，反過來他自己杜撰了一套拉丁字母摻雜一些線條式的拼音符號，頗似苗族婦女衣飾上所刺繡的花紋，這倒合於民族形式，以此欺騙苗族說，這就是他們祖先留下來的文字；並且編了一個神話說，苗族始祖蚩尤

本居黃河流域，五千年前被黃帝戰敗，彝族南移，當時族中書籍，不便携帶，又恐遷移後就把文字忘掉，因此下令族中婦女將文字繡於衣角裙邊上，所以苗文才得保存下來，今日的苗文，便是把苗族婦女衣裙上的花紋圖案加以整理而成的。這完全是爭取苗族樂於學習他們的文字，便於宣傳教義，這就是清末英國傳教士相應理（S.Pollord）所玩的把戲，這種文字就叫作 Pollordscript。我不知道呂先生所見的苗族象形文字，是否就是這種洋把戲，若然，那却不是苗族的土產，更不能同我們的金甲文作比較。所以從文字方面也不能得到佐證；可是呂先生就這樣的下了「因此，一方面，可以確說苗族是馬來系的一個民族」的斷語。（原書十三頁）

論證藏族是馬來種來源，呂先生除了舉出藏族體質上的一些特徵如鼻平，口寬，鬚稀，唇薄，眼小角斜，顴骨突出，但最後却說「體質似漢人」惟有「平均驅幹稍短，這都是和馬來種較接近」（原書一二八頁）另外的證據，就是根據藏族的圖騰制傳說，藏族爲海狗圖騰羣團，他們曾經住過海邊，這海邊可能就是南洋的海邊，因此藏族爲馬來人種的一支，姑不論這個傳說的可靠性到如何程度，但一談到海邊，怎樣知道它就是南洋的海邊呢？何況還有西藏在太古時代是內海的推測，那麼傳說中的海邊，也許就在西藏本土，還有在少數民族的語言中，往往把湖沼稱作海，因爲它們一向僻處在山地，不曾見過海，常把本土所有的湖沼叫作海，那麼傳說中的海邊，也可能就是它們的內湖，從一般的神話傳說，多由當地取材來看，南洋海邊的可靠性似乎不太大。

彝族和僰族也是馬來種的論證，呂先生是由過去人根據語言的分類，因爲彝族屬於「藏緬語系民族，這可證他們初係從南方來，屬於馬來人種的系統」（原書一五四頁）僰族因爲和苗族同屬於「蒙克穆語系，苗族起源於馬來人種，可證他們亦係南來的馬來人種之一支」（原書一七六頁）既然根據語言的系屬來分類，那麼彝族所屬的藏緬語系，和苗僰所屬的蒙克穆語系，都沒有馬來語的份兒，他們又何以和馬來拉上關係呢？

考證一個民族的來源，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少數民族，他們過去很少有自己文字紀錄下來的史料。過去統治階級利用大漢族主義想同化各少數民族，因此那些御用學者，就牽强附會的考證他們都是漢族的宗支，藉此博得主子的歡心，這當然是別有用意的。但現在想撥雲霧見天日，更應當從各方面搜集可靠的材料，尤其是自己原來有文字紀載的少數民族史料，如蒙藏回彝等，都或多或少的還保存着他們的歷史紀載，我們利用他們本有的史料，較過去統治階級所杜撰的史料，就有更大的可靠性。如彝文經中有一部紀載他們的歷史世系，曾經提到古時他們的祖先曾經在成都峨嵋山附近住過，並且叙述歷代祖先的業績，呂先生也曾提到彝族「據傳說他們曾住過嘉陵江流域，沿江石洞即其遺跡」（原書一五四頁）這很可與彝族自己的史料相印證。我們再看現在彝族的地理分佈，可能由成都附近向南遷移到今之大小凉山，再向南分佈至貴州雲南，我們都知道大小凉山是彝族的大本營，越向南人口越少，因此過去有些外國學者曾說彝族是自西方遷移來的高加索種，不管這些外國學者的另有用心，只從彝族分佈的情形來看，不像是自南而北，所以呂先生的馬來種來源，還是要仔細的研究才能下斷語的。

其次，正如呂先生所說的民俗資料和傳說，也是考證民族來源的好資料，如呂先生引證苗族自述「清乾隆嘉慶間，湘黔川三省苗民大暴動，有『打到黃河去』的口號」，並引「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一句俗諺，從這口號和俗諺，也可以看出苗族千百年相傳他們的老家是在黃河流域，從歷史紀載和俗諺，也足可透露出苗族是發源於北方的。此外，我還可舉一個民俗來作例證：西南苗彝民族，人死後必須延巫爲死者指引陰路，他們迷信人死後靈魂應仍回到發源地的老祖先那裡去，他們相信他們的祖先是發源於北方，所以巫師指陰路時所唸的經是指引死者往北去的；並且彝族還有陰路經典，我曾按照他們的經過路線研究，是向西北行的。這些民俗資料，都可供我們參考的。

除了上述的資料外，我認爲語言也是考證民族親屬的重要材料，過去根據語言作民族的分類，大體還沒有多大錯誤，這種分類是根據各民族間語言的相似。所謂相似，並不是說只根據隻語片字的偶同，就斷定他們是同屬，而是根據一套一套的語音語法的相似或相同比較研究出來的。何以說根據語言的分類比較重要性大呢？斯大林在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中說：「語言是與上層建築根本不同的。語言不是一個社會內部這一種或那一種，舊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又說：「上層建築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產物，因此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至於語言，相反的，它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在這許多時代中，它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所以，語言的生命是比任何一個

基礎，任何一個上層基礎的生命都是長久得無比」。因此，我們以上所舉的考證資料，是屬於上層建築，可能隨時代而消失改變，唯有語言是各時代累積的產物，它有長久性而且是不容易消失改變的。唯其如此，我們從語言上考證散居各處的民族的親屬關係，是比較有把握的。我們根據這個理論，再來看呂先生所說的藏彝苗傜同屬馬來來源，是否在語言上有共相似點，我們知道藏彝苗傜四族的語言特徵是有聲調的，而馬來語恰好就不具有這聲調的特徵。這已够說明他們在語言上是不屬於同系的來源。

該書第四節中，述及中國人種的其他成份中說：『雲南的黑人族，又很可能是內格羅族的孑遺』（原書十三頁）恕我孤陋寡聞，我曾在雲南調查過少數民族，還沒有聽到黑人族的名稱，前人的調查記載，也沒見過有黑人族的名稱，我只知道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貴族統治階級，白彝是被擄的漢娃，經過若干代升格轉變來的。但呂先生文中有「不過『白骨頭』（按即白彝）和那些身爲奴隸的『黑骨頭』（按即黑彝）都沒有崇奉這種宗教的權利」（原書一五六頁）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彝族階級很嚴，黑彝一向是居於奴隸主的地位，並沒有作奴隸的黑彝，唯有白彝才是替奴隸主生產的奴隸。

還有，該書的特點，就是駁斥過去中外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少數民族歪曲事實的說法。如過去少數民族被排擠到高山上居住，過着貧苦的生活，而統治階級還在發出他們「只適宜生存於涼爽的高山上」或「只有山地方合適」的謬論。（原書一六一頁）世界上那有喜住荒山而厭棄阡陌平原的民族呢？所以，這種駁斥是正確的。但在一五五頁中談到彝族經常向其鄰近的漢苗各族住戶實行武裝偷襲，擄掠人口，常遭其迫害。尤其談到被擄的人口，彝族施以殘酷的毒辣手段，迫使作奴隸或殘殺，呂先生卻沒有解釋這種原因，也是根據過去中外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記載的離間民族感情的論調，所謂前人撒土，後人迷眼，呂先生似乎也被他們迷了眼，我認爲是不妥當的。我在彝區中住過幾年，起初也受過前人宣傳的毒，抱有戒心；相處已久，覺得他們只有豪爽和俠義，唯一的特性，就是他們不甘心受貪官污吏軍閥地主們的剝削壓迫，所以彝族反暴鬥爭的光輝史實也特別多，過去統治階級對他們也最感頭痛，認爲他們「野蠻不馴」，「犯上作亂」，所以常時派兵去殺捕彝民，這樣就更造成了漢彝民族的大仇恨，因此，彝民也不時的成羣結隊，到漢人區來搶殺報復，難道這筆罪惡的血債，還能完全記在彝族的身上麼？

我們過去的史實，應當重新估價，尤其敘述少數民族的歷史，更應當批判的接受前人的史料和記載。譬如過去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同化政策，希望他們馴順就範，誰要是不老老實實的作奴才供他們剝削宰割，誰就是生野。因此，過去史書上所記載的「野蠻民族」，「生番」「生苗」等侮辱名詞，就是從這個觀點來的，難道我們還不明白麼？

最後，關於本書的校印方面，不免還有些錯字，恕我不便在此一一提出來改正，不過在第三頁中所引「論聯合政府」中關於少數民族問題有「他們的語言，文學……」中，「文學」是「文字」之訛，雖祇一字之差，可能影響政策，希望再版時改正。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

新書介紹

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

梁純夫譯

編者按：這本書是爲紀念美共主席福斯特的七十壽辰而於今年二月在美國出版的。全書共七百多頁，分三部，合訂一册，定價美金五元，紐約新世紀出版社發行。這是第一本用馬列主義觀點論述和分析整個西半球政治經濟發展全貌的巨著。它把美國的發展置於全美洲的背景中來闡述，同時也把全美洲的發展配合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來闡述。在普遍開展和深入抗美援朝運動的今天，這本書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及其前途，是有很大幫助的。這裡我們先把全書的章目介紹給讀者。

第一部：殖民地時期

第一章 新世界的發現

發現期。內陸的探索。一個富饒而美麗的新世界。

第二章 美洲的印第安民族

印第安民族和他們的社會體制。亞芝特克人。印加人。亞芝特克和印加的社會

組織。
第三章　西半球的征服
越過西印度。墨西哥的征服。秘魯、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的征服。巴西的佔領。美國和加拿大的征服。征服的革命意義。
第四章　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組織
專制政府。土地霸佔。農業和工業。商業上的約束。
第五章　奴隸勞工
奴役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暴動。黑奴蓄養。奴隸買賣。奴隸制的野蠻。猛烈的奴隸暴動。白人工資奴隸。殖民地的勞工狀況。
第六章　殖民地的教會
教會的財富。改教——教育——宗教裁判。教會保障人剝削人。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傳佈。
第七章　佔領殖民地的國際鬥爭
殖民國家的互相敵視。走私工業。海盜掠劫。殖民地戰爭。殖民期末的土地分割。革命前夕。
第八章　美洲半球的革命
革命全貌。英國殖民地的革命。革命的過程。革命中的階級力量。海地的革命。
第九章　美洲半球的革命（續）
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的開始。革命戰爭。巴西的革命。加拿大的動亂。
第十章　革命所成就的是什麼
資產階級革命——它的限度。民族獨立。君權的廢止。政治民主。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土地的分配。工業的解放。蓄奴與勞役。婦女的地位。羣衆教育問題。資本家階級的加强。

第二部：從獨立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十一章　二十二個國家的建立
新世界的民族與國家。西班牙殖民地體系的崩潰。巴西國家的成長。加拿大的合一。美國的統一。美洲國家間的發展。
第十二章　美洲國家間的戰爭
戰爭在美洲歷史上的巨大作用。戰爭的幾種類型。一八二五——二八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的戰爭。一八三九——五一年烏拉圭第二次戰爭。一八四六——四八年美墨戰爭。一八六四——七〇年巴拉圭戰爭。一八七九——八三年太平洋戰爭。一九二八——三八年格蘭·查科戰爭。美洲國家間的其它領土爭執。
第十三章　美國的領土擴張
美國早期的擴張主義。路易斯安那的購買。佛羅里達與奧勒岡。墨西哥的分割。擴張一覽。擊潰印第安人的抵抗。印第安人被逐過密士失必河。西部印第安人的絕滅。
第十四章　美國和加拿大工業與帝國主義的成長
內戰以前工業的發展。運輸的演進。內戰後的經濟發展。美國帝國主義的誕生。西班牙——古巴——美國的戰爭。草莽經濟。加拿大的工業化。加拿大工業的成長。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遲滯
拉丁美洲工業狀況。大土地私有的作祟。帝國主義經濟在拉丁美洲的滲入。帝國主義投資的型式。帝國主義經濟政策的跛形影響。大地產主義與帝國主義。
第十六章　泛美主義
早期的泛美主義。英國、美國和神聖同盟。門羅主義的宣布。這一政策的搖擺前進。泛美聯盟的形成。委內瑞拉和巴拿馬。黷武的美式帝國主義。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
第十七章　蓄奴制的廢除
蓄奴制衰落與廢止的原因。在前法國、西班牙和英國殖民地的廢止。美國奴隸制的廢止。鬥爭的尖銳化。墾殖家的反叛。內戰中的黑人。內戰中的工人。一八六一——六五年的革命。重建時期。巴西黑人的解放。
第十八章　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獨裁者
西班牙美洲的早期獨裁者。第二羣獨裁者。目前時期的獨裁者。軍事獨裁的意義。巴西統治階級的統治方法。美國的資本家獨裁制。
第十九章　墨西哥的革命
胡亞勒士的改革運動。地亞士政權。革命與反革命。革命計劃的構成。查拍達與維拉。爲計劃的完成而戰鬥。有組織勞工的作用。卡爾丹納斯政權。美國在墨西哥的干涉。革命的評價。共產黨的作用。
第二十章　美國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鬥爭
人民的偉大鬥爭。羣衆領袖的評價。早期的工人鬥爭。職工會運動的建立。全國勞工同盟。勞動協會。美國勞工聯合會。社會主義運動。
第二十一章　一世紀的民主鬥爭
鬥爭的一般特性。土地、蓄奴制和勞役制。生活和工作的條件。民主權利。教育權利。婦女的進步。宗教自由。鬥爭的總結。

第三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美國人民

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戮。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經濟影響。美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反勞工攻勢。職工會教育聯盟。美國帝國主義的推進。

第二十三章　俄國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

革命。反蘇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美洲各地共產黨的成立。各地共產黨的行動。共產黨的方案。各地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共產黨的勢力。

第二十四章　西半球的工團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

工團主義的趨勢。美洲工團主義的勞工組織。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衰落。拉丁美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秘魯的人民美洲改革同盟運動。加拿大的C·C·F。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工會官僚主義。共產主義者、工團主義者與社會民－主義者。

第二十五章　經濟大危機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美國的經濟危機。危機的世界規模的擴展。蘇聯免受危機的影響。拉丁美洲和美國的工人鬥爭。共產黨的領導。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法西斯主義在美洲。

第二十六章　人民陣線、新政與睦鄰政策

拉丁美洲的人民陣線。美國的「新政」。加拿大的「新政」。「新政」與法西斯主義。羅斯福的作用。睦鄰政策。全美洲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潮。

第二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的性質。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意義。戰爭過程。大戰中的美國。加拿大的作戰努力。大戰中的拉丁美洲。大戰的損失。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革命後果

資本主義制度的沒落。美國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世界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普遍開展。戰後拉丁美洲的鬥爭。戰後美國和加拿大的鬥爭。兩個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第二十九章　美國霸佔西半球

美式帝國主義的計劃。經濟攻勢。軍事攻勢。政治攻勢。對阿根廷的進攻。對加拿大的進一步併吞。西半球的腹地。潛在的革命形勢。

第三十章　華爾街對世界霸權的征逐

美式帝國主義的動力。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美國帝國主義的盟友。華爾街世界攻勢的失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戰爭的威脅。

第三十一章　美洲的富饒與貧窮

利潤與牟利者。拉丁美洲的悲劇。貧困、飢餓和多病的拉丁美洲大衆。美國的財富集中。工人的被剝削和貧窮。黑人——雙重的被剝削者。少數民族的貧窮化。加拿大的兩極。

第三十二章　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

拉丁美洲職工會的起源。工人的鬥爭。罷工中的屠殺。初期的全美洲勞工組織。泛美勞工聯盟。C·S·L·A·。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的成立。工人階級的工會主義。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的成就與計劃。破壞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與共產黨的企圖。

第三十三章　美國和加拿大的職工會運動

貢濮斯主義。美國勞工聯合會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政策。美國勞聯與經濟大危機。共產黨的作用。基本工業的合併。有組織工人與黑人。獨立勞動階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華爾街的勞工帝國主義者。分裂產業職工大會。分裂世界工聯。加拿大的職工會運動。美國控制加拿大職工會的意義。

第三十四章　西半球的民族問題

美洲三大倫理集團的統計。民族合一的趨勢。民族的穩定與發展。美國和加拿大的少數民族。黑人民族的發展。印第安民族的趨勢。白沙文主義。新世界的文化發展。

第三十五章　今日西半球的迫切問題

民族獨立問題。土地的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工業化。生活水準的改善。民族自決問題。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威脅。美洲人民力量的民族的和國際的統一。

第三十六章　美洲與將來

世界形勢概觀。美洲資本主義的暗淡前途。世界資本主義回春的不可能。杜魯門的徒勞的「統制經濟」。「第三種勢力」的叛賣。社會主義是基本的答案。社會主義對拉丁美洲的意義。蘇聯的勝利的社會主義。爲社會主義戰鬥。

參考書　地圖與說明　索引

——譯者附識：這份目錄是根據最近收到的打字樣本譯出來的，因爲還沒有看到原書的內容，有些字句可能譯得不甚貼切甚至可能譯錯，得看到原書後再設法改正。請讀者們原諒！

蘇聯出版新書論述新中國的成立和勝利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最近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一書。著者爲庫茲尼佐夫。該書叙述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文化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以及中國今天在國際上的地位。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中國人民大學的教研室工作

成仿吾

教研室是本校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基本組織，直接進行一門或數門有密切聯系的學科的教學方法的與科學研究的工作。這是我們關於教研室的規定。

這是一個組織，或有組織的集體。担任一門或幾門同種類的課程的教師們組織起來，共同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建設新的國家要培養新的幹部，要有新式的高等教育機關，要有新式的教學組織。這個組織不能夠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而應該是集體的。

蘇聯先進的教育科學創造了一套這樣的組織，一個完整的機構，我們把他翻譯爲教研室。他把教師們按課程組織起來直接進行有關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這些工作大體上可分爲以下幾方面：

(一)組織教研室工作人員的教學工作（講課、習明納爾、實習、實驗、輔導、生產實習等）並保証教學質量。

(二)教學方法上的工作（製訂講授大綱、習明納爾計劃、實驗計劃、習題和答案選集等）。

(三)編寫教材（講義、參考書、圖表等）。

(四)科學研究工作（專題科學研究）。

(五)與企業和政府機關的協作。

(六)提高教師思想理論水平的工作。

(七)培養研究生的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現在共有四十一個教研室，除全校性的共同課教研室（如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國革命理論教研室等七個）由教務部領導外，其餘分別由各系領導，教研室主任由系主任呈請校長委任。教研室有一定格式的工作計劃。每一個教研室的工作計劃須於每學期初經教研室會議通過，經系主任簽字同意後請校長批准。

「教研室工作計劃」包括以下的主要項目：

(一)教研室會議日程表（包括要討論的問題，報告者姓名與日期三欄）。

(二)教師們在教研室會議上的報告（分報告內容、報告者姓名與日期三欄）。

(三)教學方法的工作（分項目、執行人與完成期限三欄）。

(四)編寫教材及圖表的工作（分項目、執行人、教研室計論期限與初稿完成期限四欄）。

(五)科學研究工作計劃（分題目、執行人與完成期限三欄）。

(六)教師的科學水平與政治思想水平提高的工作（分項目、執行人與完成期限三欄）。

(七)教研室與企業或政府機關的聯系與協作。

(八)培養研究生的工作。

教研室主任根據這樣的計劃組織與領導全教研室的集體活動，並督促與幫助每個成員的具體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根據蘇聯經驗，並在蘇聯教授們直接指導與幫助下，展開了教研室的工作，一年以來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教學工作方面，教研室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了工作，完成了教學任務，達到了一定的教學質量，學生的收獲很大。在科學研究工作方面，從去年九月以來，普遍開始了專題研究的工作，也已經打下了研究工作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培養與提高了近三百個教師，使這些絕大部分年青的教育工作者在很短的時期內得到了重大的成就。四百多個研究生與外來研究人員也有了滿意的收獲。每個教研室都表現了刻苦鑽研的精神與良好的勞動紀律。

我們一年來的體驗証明了，教研室這樣的組織是新式高等教育的强有力的武器，它使我們能夠發揮高度的集體的力量，完成非常困難的任務。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須要普遍地採用這樣新的組織，以新的工作質量爲國家建設服務。

（「人民教育」二卷六期）

本社啓事

本社上海辦事處自本年四月一日起結束，所有該處經辦未了事務，統由本社繼續辦理；惟訂購書刊，則請就近向各地新華書店洽辦爲荷。

蘇聯科學如何與實際結合起來

蘇・托布契也夫

蘇聯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的有力源泉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競賽的新的形式，這種新的形式是產生在廣泛的愛國主義運動中——是在爲着鞏固科學活動與工業、運輸以及農業勞動者的創造合作的運動中。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和發展在鞏固的科學基礎上的國家。蘇聯科學有它在主義上和基本上的特質。這是進步的科學最主要的一點——爲人民的利益而服務。這種科學是和生活、實際、生產緊密地結合着，分不開的。這就是進步的蘇聯科學的重大特質和主要象徵。

在蘇聯國家內，科學與生產的緊密結合是由列寧着手開始的。他要求：「我們的科學不要停滯在呆板的字母上或是時髦的語句上，……而是要科學在實際上有血有肉，要它完全變成爲在現在的生活方式中的一部分。」

在歷次的斯大林五年計劃中，生產技術的重大使命，是在普遍地提高蘇聯全部的科學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幾年中，科學院爲了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建設，在組織上進行了重大的改組。一九二九年一月，曾經增聘了許多位院士。這些重新當選的院士和通訊研究員都是和社會主義建設有着不可分離關係的人物，是不少的技術與經濟計劃的製訂者。

斯大林同志所號召的「青年向科學進軍」，已經是大規模地實行了，它在我們國內所完成的文化革命中，是意味着最重要的階段。它在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上，以及在加强科學與生產的合作上，都有最大的影響。

絕對地轉向加强科學與生產的聯系，這一件事促使蘇聯科學院改爲直接由蘇聯人民委員會會議管轄，並於一九三四特院址遷在莫斯科。這是全部科學院更加接近實際的開端。

所有歷史的經驗，證實科學若是脫離了實際，將不可避免地衰敗、落後、相反地，若是和實際取得了緊密的聯系，就可以使科學在勇敢的革新者的學術途徑上，展開進步。……最明顯的例子，可以來證實這點思想的根據，就是我們卓越的科學家米丘林和李森科對達爾文學說有創造性的推進。

當然，還有許多別的顯著的典型，有關我們的祖國在科學的事實上，隨合着理論與實踐。衆所週知，受到榮譽稱號的院士伊凡・米海依洛維赤・古勃金(И.М.Губкин)瓦西里・蕾必爾託維支・威廉士(В. Р. Вильямс)阿立克珊・尼克拉維赤・巴赫（А. Н. Бах），以及其他的蘇聯科學家，都是以自己的工作來充實蘇聯的科學，並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

科學創造緊密聯系實際利益的最明顯例子，就是在我們的農業方面。著名的俄國科學家佛・杜古柴也夫，他自己一生奉獻於研究土壤和土壤的肥沃工作。他是護林和造林工作的創始者之一。

斯大林時代的科學以其創造的範圍來說，是在歷史上還從未會有過的科學，是大胆的進取和最偉大的、有目的的實驗。

在我們國內實行的，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集體農場計劃，使科學在國家與經濟的生活上成爲一種必需的、不可替代的要素。科學家在鞏固祖國的防禦力量上亦盡了非常寶貴的貢獻。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反抗希特勒德國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時候，蘇聯科學創造了新型的戰鬥武器，新的機械運用，發現了新的生產原料的資源。

蘇聯科學工作者和它的大本營——蘇聯科學院——在每一步前進的途徑上，都深信着斯大林關於科學與實際統一的效果的指示，以及實踐在實現推廣科學中的作用的指示。

蘇聯的科學家每天都在盡力協助工業與農業，加速我們的國家更接近地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促進完成斯大林戰後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任務。

優秀的蘇聯數學家集中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對技術上有很大的意義的。

蘇聯的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地質物理學家，都有顯著的成就。他們研究原子核放射的特性。在光學技術方面最廣大應用的是日光燈，這是由我們國內優秀的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С.И.Вавилов）院士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所研究出來的。

結晶學研究所利用最普遍的科學問題的理論，來解決國民經濟上的問題。在蘇聯研究所的科學家的領導之下，建立了一些新的工業部門：生產電壓結晶（英文名Piezo-eletric Crystar——譯者），酒石酸鉀鈉（英文名Rochelle Salt, or Potassium Sodium tartrate)小棒形的鋼玉與紅寶石，以及各種特殊的結晶物。研究所同樣地還創造幾種極堅牢的玻璃，這些玻璃是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內廣泛地應用着。

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伊・特席林斯基（И. Д. зелинский）院士是近代有機化學最優秀代表人物中的一個。是著名的防毒面具發明家。最近他與他自己的一些學生在從事研究提高汽油品質的工作。

許多的有機化學家研究成功用新的方法來分析石油。這種新的分析方法在實際上有重大的意義，並已廣泛地在科學研究工作上和工業上應用。

亞・尼・涅斯米揚諾夫 （А. Н. Несмеянов）院士和他的共同工作者從事對於有機金屬化合物有系統的綜合問題的重要研究，是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有極大的意

義。

伊·柴爾涅耶夫（И. И. Черняев）院士和他許多的共同工作者在從銅——鎳工業上篩選並提煉貴重的金屬，已經得到了很完美的結果。

力學研究所所造就的成績，對國民經濟——礦山業、冶金業、石油業、自動機器製造業、電信機械業等各方面，都極有價值。

石油研究所貢獻物資工業界實施新的方法來加強石油的採取。

在金屬研究所研究成功新的耐熱很高的合金。礦冶研究所爲了完給若干礦區浮游選礦的成績，提出了設計機器和強化礦井的新的方法。自動學和遠程電力機械學研究所爲了測量石油隙口通徑的深淺，和測量隙口的拋物線，以及加強螺旋的鑽孔，完成了製造新的器械。

科學院的低溫研究所和石油工業部的科學局會同進行着減低煤氣管幹線鋪設的深處的巨大工作。由於與實際密切的合作，這個深度已減少了許多。

李森科院士完成了有效的、新的栽植樹木的方法。科學院的生物研究機構亦參加了這個重要的工作。

生物學家在維他命研究上的收穫，使新藥製造上，人工養魚上以及其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成就。

科學工作者和生產工作者的創造性的合作，是逐漸地更趨密切和更有組織，產生了新的社會主義勞動形式，更進一步地沖破了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界限，開始使斯達哈諾夫運動可以在它任何能發展的情況下就發生了。

許多的實例證明，在蘇聯技術的發展上能達到更有效的成就，完全是靠了科學家、工程師和先進的勞動工人共同一致的力量。

許多的科學機構與學術團體和企業界簽訂了社會主義公約。在公約中規定了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工作者之間的社會主義的互助和合作的責任。

在理論與實踐有組織的統一下，科學與生產相互之間變爲組成先進的蘇聯科學中最重要的特點之一。科學工作者與生產勞動者的合作是技術進步的定律。

蘇聯科學家在自己的面前，有眞實學者的模範——斯大林同志，科學的共產主義的最偉大的理論家，指示了關於結合理論創造發展和革命實踐的天才的規範，在人類歷史上舖設了新的道路。

（張國光譯，「科學通報」二卷三、四期）

「實踐論」與文藝創作

何其芳

中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者，雖說許多都是很久以來就信仰馬列主義，曾經系統地研究過馬列主義的社會科學和哲學的人却很少。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的缺點。極可慶幸的是整個文藝運動的根本方向問題，在八年以前，就已經爲毛澤東同志所解決了，這使我們的文藝運動在中國革命還未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就基本上走入了正軌。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和成績的獲得，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具體問題。在今後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我們是應該認眞研究這些問題，並求得解決的。

在文藝創作方面，最近一兩年來有這樣一個大家公認的中心問題：雖說我們也有一些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但一般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却不高，而且許多作者苦於不能提高。特別是思想性的問題，作者們感到的苦惱更多。

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創造家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的結果。……文藝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和人的一般認識一樣，也是來源於實踐而又服務於實踐的。它的創作過程是一種反覆的、複雜的認識過程。一個創作家在他的實踐中，在他的生活中，獲得了許多感覺和印象。對於這些感覺和印象，他是在隨時加以思考、判斷和推理，即是說隨時在進行着從感性認識發展當理性認識的深化運動的。經過了長期的實踐，作品的主題就從他的豐富的感性認識以及與之緊緊相連的初步的理性認識中自然地形成，並帶着一種使他非寫成作品不可的吸引力量。這時候，才算是一個作品懷了胎。

一個作品，它裏面的形象所表達出來的全部意義（包括它的作者原來所意識到的和未必意識到的），那就是它的思想性。它藉以表達這些意識的全部形象（包括人物、事件、場面等等）以及用來把這種種形象組織起來和表現出來的作品的結構、語言，那就是它的藝術性。對於人的豐富的社會實踐能夠作出高度的概括與深入的發掘，能夠反映一個社會、一個運動，或其較重要的局部內容的眞實面貌與內在規律，能夠創造出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或者能夠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因而對於我們認識世界的確有所增加，有所豐富，並很有助於我們改造世界，這樣的作品的思想性就高。反之它的思想性就低。裡面的形象生動鮮明，有血有肉，很自然合理，結構和語言也優美，因而能夠圓滿地表現它的思想內容，並產生一種吸引並打動很多讀者的魅力，這樣的作品的藝術性就高。反之它的藝術性就低。

大體上說來，作品的思想性，仍然是作者的理性認識的產物。對於創作家，這就是說，不但對於今天的革命實踐和人民生活必須有直接經驗，而且還要有很充分很大量的直接經驗。這是我們的作品的思想性的基礎。托爾斯泰曾經在一封信裡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一個眞正的藝術家應該懂得人類所已經知道和還沒有知道的種種事物。要懂得人類所已經知道的，就必須達到「自己這時代的最高的教育水準」。要懂得人類所還沒有知道的，就只有從自己的實踐，從人民羣衆的生活中去獲取。

當然，十分豐富與合於實際的感覺材料，雖然是作品

的思想性的基礎，但有了基礎並不等於具備了一切條件，解決了一切問題。認識還有待於深化。

作品的思想性要高，作家在取得了豐富的生活經驗之後，還必須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高度的概括和集中。在體驗生活的時候，在創作的時候，馬列主義的理論都能够指導我們，使我們的感性認識容易科學地改造爲「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

一個創作家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必須學習各種主要政策，輕視這種學習是錯誤的。

提高我們的作品的思想性的途徑就是這樣：首先是長期地深入地參加比較下層的實際工作，這樣來獲得十分豐富的感覺材料；其次是認眞學習馬列主義的一般理論和文藝理論，學習各種重要政策，這樣來加强我們觀察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最後還有一個關鍵，就是還要充分發揮我們的思想器官的作用，經常地反覆地進行思考，這樣才可能把我們的生活經驗很好地重新組織起來，並且賦予它們一種崇高的思想的光輝。

關於文藝作品的藝術性，雖說作者們的苦惱少一些，但這方面也是存在着問題的。

在這些問題裡面，形象是主要的問題。作品中的形象更是直接來源於感性認識，來源於感覺和印象。感性認識對於創作家的特別重要，不僅在於從感性認識上升爲理性認識，以至形成主題後，還要回轉過來利用它們來創造作品中的形象，而且在於許多對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沒有什麼意義的感覺材料，比如人物和環境的外部特徵，事件發展的瑣細情節之類，也是創作家創造形象的必要的原料。這就要求創作家對於他所要寫的人物的日常生活也要很熟悉，也要多作反覆的觀察和體驗。作品的結構和語言，同形象一樣，它們的最根本的來源也仍然是人的生活。因此，提高我們的作品的藝術性的正確有效的途經，也首先是長期地廣泛地體驗生活。

這種情形自然是有的，有了長期的比較下層的生活經歷，但仍然不會用形象去把那些經歷表現出來。這裡就還有一個用創作家的眼睛去觀察事物的問題，又還有一個文藝的表現方法或技巧的問題。正確地學習古今中外的文學遺產是很必要的，它既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觀察能力，又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表現能力。

文藝作品的藝術性的根本來源是感性認識，古代的和外國的名著可以作我們的借鑑。然而它既不是現成的書本的抄襲，又不是生活中的感覺和印象的簡單複寫，却同思想性一樣，也是經過了反覆的整理和改造的東西，因此，思考作用在這裡同樣重要。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明確地具體地告訴我們，文藝作品的源泉是人民生活。在這以後，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比較成功的反映工農兵及其幹部的作品。然而，我們有些作者在爲了提高他們的作品的水平而努力的時候，却又不大能够明確地了解如何提高他們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以至成爲他們的工作中的阻礙。在這種情形下來學習「實踐論」，我們就可以從馬列主義的認識論來更進一步地研究這些問題，就可以更清楚地懂得文藝作品的思想性的源泉是人民生活，文藝作品的藝術性的源泉也是人民生活，而且它們是經過怎樣的提高與改造的過程，才從自然形態的東西變爲加工形態的東西，就可以使我們今後的努力走上更正確更有效的道路。

（「人民文學」三卷五期）

學　術　簡　訊

科學院將編印「中國近代科學論著叢刊」

中國科學院爲鼓勵科學研究工作，發揚愛國主義，近將編印「中國近代科學論著叢刊」，分爲中文、外文兩種，將近代中國科學家的重要論著，分門別類，彙編各種叢刊。近正進行準備，不久即可正式開始編撰工作。

印度進步報刊討論郭沫若文章

郭沫若在「人民中國」所發表的「文學與藝術的統一戰線」一文，在印度進步的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大多數進步文學刊物如「新文學」、「先導」，及政治性月刊「新黎明」等，都刊載了該文的譯文。全印進步作家協會總書記，著名文學評論家夏爾瑪博士，古晉塔敎授在全印進步作家協會機關報「新文學」上撰寫專文解釋該文的寶貴敎訓，夏爾瑪博士並闡述怎樣將該文的觀點應用到印度方面，許多其他著名刊物如「天鵝」、「浪潮」、「信仰時代」等，都闢有專欄，討論這一問題。

編　後　記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在中國文化革命史上，它是一個轉折點。從一九一九年到今天，已是整整三十二年了，爲了紀念這一個偉大的節日，我們特別組織了幾篇文稿，從各個角度，來說明「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由於讀者的紛紛要求，我們在這一期裡，又繼續發表了幾篇「學習實踐論」的文章。

范文瀾先生的「關於中國歷史簡編」一文，特別値得細讀。關於中國古代史問題，我們歡迎在本刊展開討論。

本期新闢了「新書介紹」一欄，主要是供教學參考的。

從本期起，「學術簡訊」一欄，改作補白，這樣，也許可使版面活潑一些。

在下一期，我們想就「學習實踐論的心得」爲題，試闢「讀書會」一欄，歡迎讀者踴躍投稿。來稿要力求簡潔，每篇字數以五百字左右爲宜。

爲什麼要擁護締結和平公約

秋　楠　著

這是一本配合當前擁護締結和平公約簽名運動，提供給各地宣教工作者和一般讀者作參考資料的小冊子。書分五節，由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決議說起，闡明帝國主義陰謀挑撥新戰爭，分析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是阻止戰爭的手段，然後說明簽名運動的偉大作用，並解答了羣衆思想上存在着的幾個問題，最後指出這個運動應如何與抗美援朝及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愛國運動相結合。全書二萬言，定價一五〇〇元。

世界知識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周刊

本刊爲國內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時事周刊，以普及國際知識爲目的。它幫助讀者了解當前的國際形勢，加强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宣傳教育。

本刊文字力求通俗，盡量發揮題材的多樣性，每期除論文外還有生動的通訊和札記，並且多插圖表和漫畫，內容生動活潑。

訂閱處：

全國各地郵局、新華書店

美國人民保衛和平的道路

施芝禪譯　3000元

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梵蒂岡

田文韋著　2000元

美國重新武裝日本問題講話

思　慕著　1200元

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簡史

劉貫一著　4200元

馬歇爾計劃下的法國經濟

孟鞠如譯　7000元

世界知識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二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新建設 月刊

第四卷・第二期

負責人　費　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　達　*沈志遠
*吳　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　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　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　弘　*鄭　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本期增加篇幅，定價四千五百元
（訂戶概不加價）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四千五百元